

黑色文库 第三集



成中和 著

凄风苦雨四十年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三集

凄风苦雨四十年

成中和 著



劳改基金会



成中和近照



亲情的慰藉—成中和与女儿



重生后的父子



爷孙乐



享受自由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爆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过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政策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

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渐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2年9月于华盛顿

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错乱史（序）

廖天琪

提到二十世纪人类史上灾难性的大事，一般总是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排在最前头，特别是纳粹法西斯的罪行，至今还受到西方社会的追踪和指控。再就是斯大林暴君对苏联人民的奴役，也被认为是最黑暗和严酷的。非主流文化和地域的人们，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看史论事方式，并不认同。对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的灾难之最，除了早期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的内战之外，要数南京大屠杀和八年抗战了。然而比日本侵华战争更为残忍、覆盖面更广，并且带有令人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的荒谬性的，该算是中共治国半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它为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它难以理解，因为这是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的太平时代，所发生的大面积的虐杀、饿杀自己同胞的政府行为；它难以被接受，因为罪魁祸首至今还高高在上，手中还握着权力（对反抗者实行恐怖和高压）和诱人的圈套（为“爱国贼”设下的圈套是名利）。

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六四”的伤痕；“六四”复冲淡了所谓“十年浩劫”的梦魇；而“十年浩劫”的文革，又将“反右”和共党夺权建国之初的一路斑斑血迹，稀释得苍白模糊。其实中共治国的基本“痞子精神”，早就被毛泽东从井冈山一路带进了京城，并且立即“无法无天”地实施起来了。本来一个新政权主政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揽人心，“大赦天下”，但中共却反其道而行，大开杀戒。1951年4月30日毛泽

东亲手所写的“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语”中的一段，明白地将“杀戮”定为国策：

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转，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

毛泽东“按比例杀人”的手谕显示，对他这个土皇帝而言，人命不过是一些数字而已，大笔一挥，千万人头落地。其他那些中央要员或是慑于毛的霸气，或是以大局为重，不敢有异议。毛泽东一言九鼎，又何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何况庐山会议之后，一切异音异动都销声匿迹，中共内部定于一尊，由着一个狂人将他的妄想拿几亿人来做实验。具有“创造性天才”的毛泽东还有一项超过苏联老大哥的高招。斯大林的集中营主要是消灭人的肉体，中共用来关“阶级敌人”的劳改营，只消灭人的思维和意志，保留肉体，将之“废物利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

反革命是废物，可是，抓到手以后却成为一笔财产，对我们很有用处。大多数反革命分子可以转变，劳动改造，搞国营农场。

《凄风苦雨四十年》的作者成中和就是这样一名“反革命”。他悲惨的一生，佐证了毛泽东和中共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灾难，其残酷和绝灭人性，远超过了纳粹和苏维埃。二十四岁的成中和

于抗战期间，投笔从戎，进了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参加救亡。以后又曾在内战时期参与傅作义主持的华北剿匪总部，职位是少校参谋。1949年他见大势已去，就从军旅退出，并在上海开设了一个家庭式的儿童服装社。1954年他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逮捕，按惩治反革命条例七条三款判刑十年。1956年5月送解安徽，在劳改工厂合肥新生棉织厂接受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早期，几十万“民愤”较大的地主富农和一些“东霸天”一类的黑道人物被杀之后，按毛所谓的“可杀可不杀”的数百万人，皆投入监狱。这里面包括以往政权的党政军官员、民间武装组织和帮会的首脑人物、宗教界的神职人士和信徒、和尚尼姑以及会道门的成员，另外文化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被列为“历史反革命”，加上历次运动中浮现出来的“现行反革命”，“人的资源”真可谓丰富雄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明里来，暗里去。抓人时明火执仗理直气壮，但在大批运送到各定点时，就销声匿迹地偷偷进行了。

上海提篮桥监狱乃是劳改犯人的集中调拨站，各次运动总有十万廿万的犯人调往各地。每次调出都在午夜街上无行人时进行。监狱集中百辆大卡车将犯人运送到郊区小站，转乘铁皮车厢。这种车厢无窗，只有一扇大铁门，里面放两只大木桶，作为便桶，不到目的地不开门，日夜行驶。

读到这段描写，不禁令人想到当年欧洲各地犹太人，也是在黑夜间像牲口一样，被装在铁皮车厢中，偷偷运送到集中营的。那时纳粹的集中营进门处，挂着“劳动让你获得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标语。无独有偶，大陆各地劳改队门口挂着的牌

子，上面写着“劳动使你获得新生”。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极权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何其相似也，简直就是孪生的难兄难弟。

成中和描写的狱中人物形形色色，从旧社会的高官、知识分子到寻常百姓和乡里黎民，任何人被投进监狱的大熔炉之后，由于饥饿和超强劳动，加上精神上的折磨和随时怕被人密告的恐惧，就都成为一具具行尸走肉了。稍有个性的人，只有死路一条。监狱里的领导没有任何法治观念，随意地操纵着犯人的生死大权。比如有些犯人抗议伙食太差，绝食抗议，竟然就在监狱中被当场枪杀。

少数人不耐此种虐待，采取绝食，并将垃圾饭倾倒在马桶里，以示反抗，监狱竟然以极端手段，大开杀戒。55年10月的一个上午，突然看守警走来收封，滴滴嘎嘎，一路传来锁门声…接着劳役犯又走来关闭所有窗户，随后监内所有喇叭响了！监狱长操着绍兴口音讲话，宣布开奖惩大会，宣读授奖受惩名单。其中有提前释放的一名，减刑的几名。然后宣读判决书：闹监绝食者，坚持反动立场…为了维护革命秩序，必须给予严惩，处以绝刑，立即执行。逐一一点名，绑赴刑场。

喇叭里传来一阵口号，打倒…枪毙…反革命…罪恶极大等等，随之一阵震动玻璃窗的密集枪声，就结束了这场杀人场面。有时，监狱并不召开杀人会，直接行刑，小刑场传来枪声，人们就知道又杀人了。大凡密决都在小刑场执行。

大跃进时，各地的干部进行谎报高产，说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毛泽东思想的光照耀耀，一亩田能收到二十三万斤稻，人民敲锣打鼓，大扭秧歌。自欺欺人的谎话刚让百姓浸淫在一种狂喜的状态中，紧接着严峻的现实就将全国推入大饥荒时代，即中

共官方口径中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监狱外路有饿殍，监狱内死者枕藉。作者一进监狱，他一家老小就被扫地出门，赶到偏远的甘肃去落户。在频于饿死的边缘，11岁的女儿妞妞带着8岁和5岁的弟弟从甘肃乘火车投靠上海的奶奶，小女孩亲眼目睹了下面的情景：

每到一站人潮汹涌，与山丹车站一样。站台附近有尸体，站站如此，小站犹可，大站更多，有的甚至叠在一起。靠近铁道路轨的看得很清楚，有的仰着睁眼张口，有的扑着，半边脸和嘴尽是泥土，形状恐怖，惨不忍睹。

作者对饥饿的滋味有如下的描述：

1958年元月开始，羁押号的囚粮减为每日三两，每餐给一两五钱米。可以想象，一两五钱米煮成粥顶多只有三号搪瓷杯的一平杯稀粥，监狱将这一两五钱米，加上大量的水熬成米汤，索性不给小菜，只是用碱催化了米，加上盐煮成每人五千克的米汤。一日两次向肚里灌，肚子越灌越大，也越灌越饿，身体越灌越瘦，瘦成皮包骨…饥饿之苦，尤甚于刀割火烙，刺心挖肝般痛在内里，以致疲于呼吸，直到昏迷休克。这无形的饥饿之刃，长时期一片片、一丝丝割着整个身体，那痛楚绝非血肉之躯所能忍受。

监狱里的人只要还有一丝气，总有人打小报告，争取表现好，踏在别人的尸身上，作着提前释放的美梦。就在这几乎饿死的关口上，成中和被一名同犯诬告“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改判

死刑。饥饿与刑具加上病痛，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的罪行中有一条是指苏联赫鲁晓夫为战争贩子。59年7月中苏分歧公开化，因此对他重新量刑，改为加刑十年，合并原判，共为廿年。他被解送安徽白湖农场劳改，一去就是十六年。

白湖位于安徽省东部长江以北的一个小县“庐江”，距长江约百里之遥，山之中是一处天然形成的湖泊。当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下令利用劳改劳教人员，将这块方圆卅六万亩，茫茫一片的天然湖，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米粮仓。数十万冤魂苦囚于是乎人人一双手、一把锹、一副担，用最原始的工具，成年累月，日以继夜地挑灯夜战，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必须完成工作指标，不完成不给饭吃。数万名无偿劳动的奴隶们，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将辽阔的湖面，开辟成三十六万亩良田，并挖分成环湖大堤及两条并列的穿湖大堤。除了饿死累死的之外，很多人是“病死”的：

这些病号大多数是营养不良的虚弱病，更多的是肠胃病，因为吃了田里的生小鱼、活蚌蚶、青蛙、水蛇以及生菜野草等引发鼓胀病，丝虫、勾虫、蛔虫在腹中衍生引起的脚肿、消瘦、胃溃疡、肠穿孔、肺结核等症。因医疗设备差，药物缺乏，往往送到门诊时已不治身亡。那时大队门诊室有个小伙子专以独轮车推运死尸到青山掩埋，一车两具尸体。青山有挖成的坑，推到坑头只须将车竖起，把尸体卸入坑内，不等掩土，别的大队也有尸体运到，一坑数具同时掩埋。在当年的饥饿高潮时期，青山的运尸车络绎不绝，谁知青山脚下埋下几多苦鬼。那里的成群野狗，就是赖此为生的。一块二寸宽的小木牌写着死者的姓名，不消一、二个月，日晒夜露，木牌上的字已是模糊不清，最后被水冲泥盖，大多

不知去向，有的变成腐朽碎片和堆堆白骨夹在一起，末了也就只是个乱葬岗子。

劳改营里的死亡方式种类繁多，还有“因公殉职”的：

隆冬时，欧队副带领一队去清理河底淤泥。清晨先用木板铺在冻硬了的淤泥上，然后逐段将冻结的淤泥挑运到大堤上加高堤岸。在这个过程中，冻结的淤泥经阳光曝晒就渐渐解冻。为了抢夺成绩，队长让大家工作到天黑才招呼收工。全队从木板上鱼贯走到对岸，然后选了十八个壮年劳改犯将木板一块块集中到工作堤上堆好，接着用爬滚的方法在淤泥上爬滚到回去的岸上。不料当日化冻较快，待十八人收了木板，淤泥已不能负荷人体，竭力爬到中途，十八人逐淹没于泥潭之中。

“因公殉职”的囚犯得不到表扬，甚至连家属都不通知。在劳改营中，死了人等于死条狗，埋在乱葬岗子，白骨伴青山，无声无息。

很多人在狱中受不了折磨而自杀，书中所描写的四个含冤人先后于一个月之间因恐惧、病痛和绝望，自缢而死，读了令人掩卷叹息。在黑夜笼罩整个中华大地的年代，很多人受不了政治上的压力和恐惧而发狂。狱中的精神病患者受到牲畜不如的残酷待遇。有一个疯子，每日每夜在监房里号叫“毛主席要吃我的脑子”，这种精神病真是独具中国特色。另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倪小鬼”，能神出鬼没，制造一些无法用常理解说的魔道和奇术，但是从十四岁进监、关到十九岁的小巫依然逃不出共产党这大巫的魔爪，竟然活活饿死狱中。

成中和在狱中从壮年到老年，度过了廿载春秋。到了刑满之日他内心激动，然而监方却没有任何动静。他去请示，也得不到回答。还是女儿一封来信激起了涟漪，劳改场部给了他十五天的“探亲假”，使他终于在 22 年之后重新见到他九十岁的母亲。老太太在饥荒年代哺育了他的三个被自己母亲遗弃的孩子，现在孤独地住在镇江老家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跳蚤虫蚁为伍了数十年。当老母亲双手捧住她的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已过花甲之年的囚犯儿子的脸时，她的泪水也濡湿了读者的眼睛。

成中和的炼狱生活并未在 1974 年 6 月刑满时结束，他继续不明不白地在没有铁丝网的监狱 - 场外 - 接受管制劳动。1975 年 12 月农场宣布“中央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实行宽释”。其实他已经牢底坐穿了，本应是自由人，何来宽释一说？

“宽释”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久，“上面”又收回成命，据说是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反对。成中和跟其他一些原国民党人员因而仍被留放在各地的国营林场，又再度过了十年的农村管制生活。应验了共产政权下“一旦为奴，终身为奴”的定律。

作者本姓季，成中和是笔名。季先生本是一位性格温文、本分又谦和的人，就如寻常同事邻居中的一位有教养的长者，可他的一生竟然如此惊心动魄、凄惨绝伦。三十年的奴隶生活如过眼烟云，临到晚年也不能在自己的故乡生活，和家人一道安度晚年。他于 1985 年被女儿接到澳门，后又辗转来到美国。一个人生活在他乡异地，一晃又是十来年。虽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自由人，毕竟有些不能落叶归根的遗憾。真是“四十年来家国”，凄风苦雨不堪回首。

读毕他的自传，心中只有一个巨大的问号，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为自己谱写了一部民族的精神错乱史，到底谁为炎黄子孙打造了这当代的人间炼狱？这个炼狱还会继续吞噬我们及我们

的儿孙辈吗？作者不愿用自己的本名发表，他的女儿在美国也已经居住了将近二十年，却仍然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名，这个事实不是提供了我们一些答案的线索么？¹

共和国人民的生命轻如鸿毛。

中国百姓的生活有不能承受之重。

是为序。

2002年9月11日于华盛顿

¹ 本书中除了作者成中和、作者的女儿如柳、女教师黎美宪三个名字是以假代真之外，其他人名皆为真名。

前 言

我家祖上世代务农，由祖父一代始转为经商。“八一三”日军突侵袭淞沪，将我卷入了军戎，1937年11月投入黄埔军校十五期受训。毕业后，在大西北黄河前线随部队担任河防。

1945年8月13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驻守在陕西韩城—潼关一线的卅四集团军的所属十六军奉命东渡进驻北平。当该军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经永济、运城时，一路受到共军袭击，运城至石家庄的铁道，以及邯郸至石家庄的铁轨四百里，全部遭共军民兵拆除破坏，因此部队唯有徒步，行动缓慢。

10月，我军甫抵石家庄，即奉大本营命令，火速增援邯郸十一战区孙连仲长官。不料我十六军急行一日，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被共军俘掳，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率部投降。消息震惊了全军，证实共军已发动攻势。重庆谈判乃共党的政治手段，其意是乘日本投降之际，抢先占领华北。待我军到达保定、北平，始知离城数十里已驻有共军，并成立了地方政府，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由此不禁忆及，在日军占据山西时期，晋东南山区的八路军乘我军交战之际，竟然配合日军钳制我军，俘我官兵夺我军械，以壮大八路军。当时日伪遗留下的衰废困况及民间苦怨尚未平息，人心失衡，仰望安抚。此际，共党施展预谋，夺取地盘，收买人心。军事上，他们有苏联提供的日军缴出的七十万关东军全部武器，装备了共军北上的民兵，并接手苏军遗交的整个东北。政治上运用潜伏于各地的地下组织，展开全面攻势，以扩大党组织方式，在华北的军政重地北平招揽社会和学术界名人，例如清华园教授吴晗，就是该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他派遣余心清打入十一战区长官部新闻处，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收买了长官部第一处处长谢士炎，科长陈

融生，成为插在孙连仲长官心中的利剑，使孙连仲在 1947 年 8 月的徐蚌战役中失掉两个军，放弃了石家庄，因而保定绥署被撤销，并入张镇绥署。后于 1948 年元月由傅作义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在北平复兴门外公主坟。在吴晗的主导下，北平的高等学府几乎全部左倾，名教授费孝通、周而复、夏衍、钱端川、张东孙、张奚若皆成为共党的吹鼓手，不遗余力抨击时政，直指南京政府腐败无能，起到了民心动荡，响往共产的效果。在吴晗的策动下，大学生纷纷走出校门，集结在长安街，举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横幅，挥舞着“打倒蒋介石”的小旗，高呼打倒刮民党，捣毁了北平市参议会，以黑油写上狐群狗党会。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复兴门外剿总聚集，示威喊话，要求傅总停止内战。这些行动扰乱了华北局势，人心惶惶，助长了共军的气焰。加上一些名流士绅，如前北平市长刘瑶章、城防司令候镜如在一旁示意表态，傅总终于被逼于 1948 年 11 月接受了所谓和谈，实质是投降，成为千古罪人。

被解体的剿总官兵在解除武装的形势下，成了没有主帅的战俘，单独的个体躲避不了共军整体大势的冲击。不久整个大陆变色，我个人也难逃浩劫，在这动荡的数十年里，幸而没有灭顶。在生死线上，我体验到“苦难明是非，屈辱知恩仇”的真谛。

泽东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倒一切剥削者及帝国主义反动派，倡导繁荣经济，劳资两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是个以工农为主体，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共产党许诺将建立一个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四十年过去了，被称为大救星的毛万岁也过去了，而他所说的和所做的恰恰相反，他留下了什么呢？

前几年轰动中外的自传性作品，应该是李志绥先生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李医生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里一中南海经历了廿二年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写出了中南海里鲜为人知

的内幕，刻画了毛谈笑风生极具吸引力的正面形象，亦描绘了他阴险奸诈、目空一切的专横独裁作风。他那具有农民习气的帝王性格，纵任了自己放浪不羁的性恶习。这些被密封着的惊人真相一旦曝光，世人终于认清了毛那善于玩弄权术的形象。他是一个除了自己，对任何人都不放心的怪物。

李医生仰慕毛泽东，相信共产党，特地从澳大利亚回到大陆。1954年起进入中南海，享受高级的生活待遇，直到1976年9月9日毛去世，总共度过了廿二年天堂的生活。

我与李医生是同代人，他进天堂，我入地狱。同样也是廿二年，我在地狱捱过了牛马不如的劳改生活。最高层制订了政策，镇反、土改、三五反、工商业改造、肃反、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农村公社化）、文革等政治运动都在最下层的奴隶身上碾过。民间和劳改炼狱是中共政治决策的实验场，与天堂遥遥相对，显现了共产主义时代中华民族的灾难史。李医生是共产主义天堂中的体验者，而我则是共产主义地狱中的被炼人，是千千万万受煎熬中的一个。李医生写下了中南海的歌舞升平和勾心斗角，我则倾吐人间地狱里的饿殍遍野及血泪横流的实况，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廿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多、军队多、党员多、贪污多、核武多、穷人多、杀人多、饿殍多、冤鬼多、囚犯多，唯有自由民主少的历史。

成中和撰于1994年

目 录

5 /	出版缘起.....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9 /	序 — 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错乱史	廖天琪
19 /	前言.....	成中和
27 /	凄风苦雨四十年.....	成中和
179 /	白湖劳改农场平面图	成中和
183 /	失色的世界.....	如 柳
197 /	新的生命篇章.....	如 柳

附录

205 /	作者简历	
207 /	相逢何必曾相识	胡美玉

凄风苦雨四十年

陷入牢笼

1954年6月25日凌晨七时，是我从人间降到地狱的纪念日。回忆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那么清清楚楚。我依规律六时半起床，上厕、洗梳，然后准备推小儿子去三角花园转一圈回来。正欲出门时，突然两个汉子闯进门来，其中一个掏出手枪对准我说“你叫季XX吗？现在逮捕你。”他们出示了一张小纸片，在我眼前晃一下，说这是逮捕证。同时另一个人飞步跨到我身后将我双手反铐。我只觉得周身发冷。这时，屋里的工人都嘎然停车，呆呆地望着我，寂然无声。接着，那两人各推我一肩走向对面的公安分局。当时我穿拖鞋，要求换双鞋，未被允许，因此，我是穿着拖鞋进入监狱的。

进入分局的新收间，那里的警察命我向壁，开了背铐，并按了手模，填了入监登记表。我意识到自己已是中共政权的阶下囚了！面对凶狠的狱卒面孔，感到一阵死亡似的惊恐。待到了牢房的铁栅前，涌来一阵难以克止的悲哀。一个铁笼似的小间里已经坐了个人，一股臭气迎面扑来。铁门一响，我被推入笼中。坐在里面的犯人将屁股向里移了一下，腾出一股之隙，让我坐下。这时我有撕心裂肺的痛楚，口渴得像火在嘴里燃烧。坐着的犯人向我打量了一下，说：“你新来，对不起，只好睡在下面了！下面是水泥地，很潮湿。”我们交谈起来，原来他是以赌博为生的赌徒，行话叫“郎中”。这类人做一种特制的赌具可以“稳赢”。他被关押进来半年了，因交代不彻底，所以关在单人间（囚语叫独木间）。一小时后我被调到“大号子”。大号子里有十三人，适才调出四人，所以我得以入内。里面有个组长，他已蹲了一年，五十开外的年纪，圆圆的脸，体形肥胖，是个慈祥相的中年汉，谈吐不俗，原是本区的区党部书记，属于留用人员，在区工商科当

一名职员，53 年入监，判刑十年。分局看守所示意要他开导新收犯坦白交代。

此君饶有风趣，以纯粹的上海白话、乐观的态度劝解新来者消除愁苦，用他的话说：“丢开一切，做一个真正的化外人，不是吗？我们都剃成光头了！不是和尚是什么呢？否则你将活不下去。”他环顾四周，低声语我：“900 号，看来你与我同类，现在既入空门，就当放下尘俗，超脱此身，不妨学着贫僧，坐禅吃斋，以了此生，也许有道成之日，羽化而登仙。”

我的监号是 900，进监不准呼名道姓，咸以号码代名。正说话间，家人送来了衣被用品及糕饼食物。我胸如火燎，只觉口渴，不思进食，正是口干舌苦到极点，就将送来的食物分给同号的难友。约有一周，只想饮水，少进食物。对每日两餐的囚饭，见而生厌，难以下喉。

看守所的饭是用最坏的糙米做的，由劳役犯用大箩筐送到门口。一股霉腐气，粗饭碗，一双竹筷，再给一撮豆芽或青菜，人各一份。饭后发一次开水。早晨有一盆共同用的洗脸水，这间铁栅牢房内有九人，我们只能侧身而卧，据说最多容十三人，如增至十三人，只得坐待天明了！

入狱后的忧虑，加上未能正常进食，身体转弱，引发了风湿热，高烧不退。这时提审开始，当时提审人将我反铐，发觉我体温甚高，但并未放松提审。一进审讯室，即行恐吓，将手枪向桌上一放，手指着一叠纸，恶狠狠地说：“这是你的材料，你要彻底交待。”我心里明白，这些所谓的材料，无非是在我被捕后的一周内，依照我的社会关系，向各人威胁一番后所搜集到的几张照片和一些有关亲友写的废话而已。承审人从厚厚的一叠纸里抽出一张照片在我眼前晃了晃，问我这是什么。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在军校学生时期与同学沈伦的合影，领口还带着军校学生的圆领

章，是张有纪念意义的相片。那个承审的小个子竟以此为罪证，要我从实交代。就这样的事也要我写在纸上，因为在军校受教育即是罪行。于是，我就按照他的提问，顺着他的要求答。我被关在黑铁牢里已历一周，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而且正在高烧中，一见强光头晕眼花，头好像被电击似地剧痛。在他的逼问下，我言不由衷，随口应答，自己也弄不清前前后后所说的复杂内容。长窗外的马路和对面大楼下的街景还能偶尔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

所谓交代，乃要我重写自己的经历，承审人再根据我的经历来定罪。法律在他手里，我唯有大小由之，反正命只有一条。就这样提审一次，案子就算结束。问话时他问我为什么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为什么你家里有那么多黄色唱片云云。我实在无从答起，只得说我自幼学英文，从未接触俄文。至于唱片，我不知道什么是黄色，周璇、吴莺音的歌曲以及一些音乐唱片，是一般人所喜爱的，我不知道违法。

当时我高烧不退，号子里的组长告诉了看守，结果我那个分局长邻居站在号子外面对我说：“我们准备将你送到市监狱去治病，你要安心，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搞清楚，三五年是要判的，没有大问题。”这番颇有人情味的安慰话，是办案者的阴柔手段，使得被专政的对象有一种对权力的感激心理，认为是从宽处理。

在看守所的两周中，放过二次风。号子外面有一堵不高的围墙，望过去可以看到我的家，相隔一条马路，约一百公尺。透过玻璃见里面人影晃晃，但分不清是谁。可惜仅是一瞬间放风时掠过，家人并不知道一街之隔的我，在牢笼里受着煎熬。以后就解往提篮桥市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望着家。这一别就是廿二年，当我作为白发老翁再回来此地时，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了，妻离子散，天地变色。

一辆小吉普车载着我这个带着手铐的囚犯急驶提篮桥监狱。押送我的警察，一边一个将我夹在中间。一路鸣着警报器飞驰过街，沿路绿灯，直入市监三道大铁门，到达新收间。大监狱的森严戒备，使人见而生畏。新收间的交接更是细密，检查行李，遍搜全身，然后编号入册，转送关押监房。二号监的主管领我入监，开了铐的双手可以背起行李，病体虚弱，艰难地支撑着摇摇晃晃的身子，跟着狱警慢慢移步。一排排五层的钢筋水泥楼房，排列有序。进得二监大门，由值班警登记，置于三楼 36 号囚室，给我的编号“5283”，从此我的名字消失，仅剩一个号码。

监房每层分两排，背对背设 92 室，每排 46 室，每室三面是密不通风的厚壁，一面是由八根钢圈组成的栅门，用一个大弹簧锁住。每室可容三人（英国制度），可现在至少四人，多则七人。小室的排列似动物园的兽笼，长 7.5 尺，宽仅五尺，高可一丈。栅门外是走廊和窗户，中间夹以围着铁丝网的天井，直通上下楼层面。若想越狱，必须持有十三道门的钥匙并通过三道警卫线，比登天还难。

整个监狱有十栋监房，每栋可容 2000 人以上，一个大伙房，一所七层的医院，二所工场（服装、洗染）。另有女监，规模之大，警戒之严，堪称东方第一。它的号房（囚室）多得吓人，若以一个人每天换一囚室计，须十三年时间方可住遍。

54 年 7 月 9 日，我被囚于二监三楼 36 室，从此三年与世隔绝，直到被转移到下一个劳改单位。

犯人一月一次可跟家人通信，用监狱印的明信片写，正面可写一百八十三个字，反面印着规定送入的物品名称，只准用中文正楷填写。监犯不准有绳索和金属用品，所以犯人没有裤带、鞋带。24 小时内放风一次，约半小时。方法为每层的半边楼为一个单元，由主管狱警开了封，排队到楼下空地跑步，约 20 分钟回室

收封。放风不定时，大多在早晨。每日黎明起身，由主管来开封，晚九时收封就寝。不准白日躺卧，四个人可轮流在室内做运动，每日坐的时间占九成，因此不到二个月，屁股就生了老茧。室内有一只木制马桶，每晨将马桶拎在门口，劳役犯将马桶拎到楼下倒在大粪车里，然后集中洗净再送到各室。这个工作消耗大量体力，都由每层楼面的八个劳役犯承担。劳役犯每天要倒 92 只马桶，发放 92 盆洗脸水，供应三百多人的两餐饭盒、二遍开水。饭的供应是由大伙房用蒸汽将数万人的饭菜蒸熟，在二小时内发放完毕。

在宽松时期，规定每日两顿干饭，饭分大号、1—4 号五种等量，以马口铁制成的椭圆形饭盒装，大号 2.5 斤、1 号 2 斤、2 号 1.5 斤、3 号 1 斤、4 号 0.5 斤。饭上面铺一份菜，菜有五种，蚕豆、黄豆牛肉丁、青菜、猪肉、豆芽，轮番更换。在节约运动时，改为一稀一干、稀饭分普稀和满稀，干饭改为菜饭，成份是卷心菜、胡萝卜，菜多过饭，稀饭里面掺麦皮，看上去像可口甜粥。

上午 8—9 时开饭，各监房的劳役犯如临大敌似地集结在大伙房门口准备打饭。饭盒用一个木制的长方板架放置，每个板架可放卅对饭盒，重约 200 来斤，由伙房犯人，两人抬一架放在各监劳役犯肩背上，背着快步扛回各监。如果在五楼，他们就要低着头担起这 200 多斤的板架，背上五楼。所以每次开饭，所有的劳役犯都大汗淋漓，紧张得像一场田径赛。监内的劳役犯都是彪形大汉，很像打手。这些人都是主管的耳目，其中有一个组长专管饭帐，每天要向各室登记二次，沿着走廊喊问各人吃几号饭。我初入监时正在病中，吃了半年的四号饭。

家里每月送一次接济包，一包肉松，十只咸蛋，十只苹果、一包草纸。直到 55 年 9 月监狱宣布，允许反革命犯每月与家人见一次面，每次十分钟，才有机会见到家人。犯人和家属隔着铁丝网远远地站着，说话时要提嗓门，说几声你好我好，没说几句就要

含着泪道再见了。有次，九岁的女儿也来看我，喊了声爸爸就哭了起来。停止接见的哨音响了，她不肯走，哭着要爸爸，我心酸得几次回头看她，也忍不住泪下，悲伤得久久不能平息。

突然的恐怖

55年，中共全面实行粮油配给制，全国按工种、年龄定量，长期实行节约粮食的制度。粮食短缺，监狱亦然，囚粮被减少到最低限度。每人每天只给四两米，还掺杂一些麦皮蔬菜，饭里掺红萝卜、卷心菜。供应已不用饭盒，用大木桶，劳役犯两人将木桶抬到楼面，按等级分给各人。每顿饭实际上卷心菜多过米，吃了根本不能果腹。稀饭则是麦皮加菜，乍看很似可口麦片粥，可是一入口苦涩得难以下咽。然而肚饥难忍，只得当药吞下。未几肚里咕噜作响，随即忍不住直泻，于是一室之中轮流不断上马桶，不到二小时腹已空空如也。肛门经不起麦皮的磨擦，竟至破裂，末了成为痔疮。就这样，整个大监狱的囚犯都陷于痛苦中。

下午的一餐干饭，初时见到红白相间的二馒头饭，尚能引起食欲。不数日，就觉得一股酸淡苦味，令人见之生厌。少数人不耐此种虐待，采取绝食方式抗议，并将垃圾饭倾倒在马桶里，以示不满。监狱对此竟然以极端手段，大开杀戒。

55年10月的一个上午十时许，看守警突然走来收封，嘀嘀嘎嘎，一路传来的锁门声，震惊了所有的号子。这声音只有每晚八时收封时，才会上下五层同时发出。接着劳役犯又走来关闭所有窗户，随后监内所有喇叭响了。那个一只手的监狱长操着绍兴口音讲话，要开奖惩大会，宣布授奖受惩名单。其中有提前释放的一名，减刑的几名，然后宣读判决书：“闹监绝食者，坚持反动立场，以绝食威胁政府，将宝中之宝的粮食倒在马桶里。今日犯人的口粮已经超过一般农民，还不满足，证明这些人敌视政府，顽抗到底的反动本质，为了维护革命秩序，必须给予严惩，处以

绝刑，立即执行。”然后逐一点名，绑赴刑场。喇叭里传来一阵口号，打倒…枪毙…反革命…罪大恶极等等，随之一阵震动玻璃窗的密集枪声，就结束了这场杀人场面。独手监长点名受死刑的，有二监地下号子的一名，大家都听到下面狱警开锁拉人和接下来的脚镣声，几条无辜的生命就此被杀害。有时，监狱并不召开杀人会，直接行刑，小刑场传来枪声，人们就知道又杀人了。大凡密决都在小刑场执行。这个刑场其实是监狱里的一块紧靠围墙的空地，监狱为了杀人方便，始存此地。因此，关久了的老犯人一见上午收封，就知必有大祸，顿时紧张起来，恐怖得面色灰白。整个监狱寂静无声，像是一座死牢。

难 友

隔壁号子蹲着一位三朝元老，名叫潘毓桂，据说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是满洲人。汪伪时期曾任天津市长，抗战胜利后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关押至今，被中共定为“未决犯”。其时，清朝的末代皇帝关在苏联，主仆同为罪犯。现在溥仪已经转来中国，多么深刻的变化！

这所监狱也有它改朝换代的惨痛史，传说监狱是英国人建造的，这块土地原是淞沪闻人朱葆三所有。当时英国要买这块地，朱葆三知道买地是建监狱，因而向英国人提出条件，将地送给英国人，要求必须宽待中国犯人，给犯人较好的生活待遇，健全的医疗设备，充分的营养食物。所以提篮桥监狱的囚犯伙食、医疗卫生，炊事设施，无不齐全周到。

中共接收监狱后，初期尚能按照传统，每日的囚饭按以往标准供给，饭尽管吃饱，菜则是猪牛肉、蛋品、鱼、黄豆、蚕豆、蔬菜，加上充分的猪油。这是 54 年以前的正常情况。有些从外地调回监狱治病，或审查案件的犯人都说提篮桥的生活比外地的劳改

场所好。外地的劳改场苦不堪言，上海监狱的犯人等于在休养。可是到了 55 年实施节约运动后，就完全改变了伙食供应，代之以无油、粗菜、糙米、麦皮食物给犯人充饥，这种食物只有在中国农村的猪食中才见得到。

据潘毓桂叙述，国民党政府对他判决后，他就在这里服刑，他属于老年犯，得到优待。一个人住两个号子，一间睡觉，一间看书弈棋。上面还搭起一个阁，放置书报杂物，还备个煤油炉，可以自己烧菜。整个监狱只有一千来人，白天号子不上锁，任意与邻号往来串门，弈棋聊天。逢年过节，或自己生日，就几个人凑在一起，叫看守“跑条子”（即送信给家里），向各自的家人要几样菜。五六人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席酒筵，相聚享受一番，煞似隐士享穴居之乐，乃世人不能理解的快事，言来喜笑颜开，众人都乐此不疲。潘老其时已七十有五，颇健谈，特别是在并号学习时尤现谈风。他常常爱述及名妓赛金花的颇富传奇性的一生，大家都听得入神。潘老十四岁那年，正值赛金花在天津一带挂牌。他曾随当时要员周游勾栏院，得识芳颜，对赛金花的一生道来甚详。后来这枝名花败落潦倒，死于北平居仁里寓所。死前穷得与老婢几乎断炊。死讯传来，潘老慨然解囊，掷金 600，着老婢打理殡葬，并亲自撰文铭碑以志纪念，一代丽人得以永眠于德胜门外塚地。

监房内的冷漠凄凉，乃人间极处。自由人突然遭禁，虽无法将恐惧、愤怒的心情形之于外，但内在的压抑和无言的痛苦，难以描绘。在生理上是炙心的口渴，舌头像被火烤那样干裂，脑子好似爆裂开来，心好像浸在盐水里那样令人焦虑不安，所以总想借助特别的事儿来消除愁苦。于是号子里的人，避开政治，海阔天空地胡聊一气，以舒解胸中的郁结。

号子里的人事不断更动，随着狱警的意向，犯人进进出出地流动。有次调入一中央日报的老记者顾亦武，那时是三人囚室，正值 55 年政治较为平静，监内清谈起来。后来只剩我和老顾两人，他原来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从未到过西北，可对辽阔荒凉的大西北了若指掌，对那里的名胜古迹，比我这个曾身临其境的人，知识更详，说来活龙活现。他口下的秦穆古墓、杨贵妃坟、华清池、阿房宫，言来像是那里居民。讲到西北的特产，风俗民情，似是位西秦隐士，其实他皆阅自书中。

他亦是一位对赛金花作过实地采访的人，曾走访赛金花的出身地姑苏鸭蛋桥畔，也亲访了北平居仁里，和那位名噪一时，红遍京津的名妓长谈竟日。无奈当年的绝色已是满脸皱纹、两眼昏花、言语迟钝、腰曲背拱的老姬了，只有几张旧照能令人追忆其当红时的往昔。如果想一睹她与英国皇后的合照，访者要另付一份代价。她曾叙述见联军总司令华特西时，谎称是其妹的艳史。她虽受宠却不贪财，为北京人做了不少好事。采访者要按时付价，大凡来访者，至少要付出三、五银元，金花以此为生。时间长了，访客渐渐稀少，因此光景日见冷落，最后无人问津。当其病故时已是家徒四壁，身无长物了！

另一位给我印象很深的难友叫王相茂，未进监前，他是上海杨树浦一家西服店的东主，他在抗战初期是浙江省师管区司令邱清泉在奉化招收的新兵，迁都重庆时他仍在邱清泉部当兵，在陪都的警卫师。适逢委员长侍从为蒋夫人觅裁缝，王自幼学艺，即由邱师长保荐到委员长公馆做裁缝，前后达七年之久，因手艺精湛，颇受蒋夫人嘉许。夫人素来讲究衣着，衣料和款式大多来自美国，夫人及乃姐庆龄的服装皆出自王相茂之手。制成之后，不定穿上一次，有的竟是永远压在箱底。他提起委员长，总是称赞说他是位非常严肃而朴实的长者，每天黎明即起，早饭白粥咸菜，午、

晚餐四菜一汤。倒是馆内的这帮杂役、厨师、清洁工、裁缝、理发师、女佣等围坐一桌，吃喝费多过主人，王言及这些，不胜留恋。

抗战胜利后王相茂来到上海，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树浦开设西服店，又娶了个舟山老婆，满以为能安安逸逸过这下半生。不料共产党进入上海后，他的环境就日趋险恶。由于名声在外，周围都知道他是蒋家的伙计，公安局已暗中将他监视，54 年公安局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判刑七年。

王相茂患了肺结核，被监禁在八号监，这是病号监，分层隔离着各种不同病犯。与之相遇在二楼，同室数月，由于同病相邻，产生了感情，遂各吐肺腑，互表心意。那时他正被狱方指为监内的反动集团成员，处于交代审查中。

他的同伙中有位特殊人物，与我隔着两间号子，名叫吕维扬，身材高大，外形很像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其实，那时他才廿来岁，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被判十年徒刑。他有个邮电局长爸爸，和一位护士长妈妈，家里还有一位最疼爱他的老祖母。正当他在高中将毕业时，遇上中国的政权更迭，他的思想倾向自由民主，当共产政权成立后，出现了与他的思想不相容的情况，因此就开始研究中共的理论和现行制度，夜间在卧室独自收听台湾的广播并做笔记，在校秘密组织青年党，以他的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不料组织成立后竟被同学出卖，受到公安侦查，置于监视网内，然后拘留审查，停止他的学业，交由家庭管制，不准离开家庭。在半年的居家期间，他果然足不出户，却研读了更多理论书籍，广增了知识面，也收听了台湾的消息，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将收听到的记录整理成文，作为探讨蓝本。

管制期满，公安局对他考核时，发现他确是在攻读马列及其他哲学书籍，也写了笔记，不过全是批判时政的反面内容。再就是

台湾广播记录和研究自由民主政体的心得，皆属针对现政权的评论，因而引起公安方面的警惕，觉察到家庭管制及令他研读马列著作，恰好给他提供了反共因素，以共产主义的矛来攻击社会主义的盾。他所作的结论是“共产主义荒谬无物，推行的手段阴险毒辣，这个政体乃一彻底的专横暴戾体，对人类社会只有破坏，不会有善意的建设。眼前所为皆属扫除障碍，加强军备，并非利国益民，实则巩固政权，扩展势力，以便统制全盘。未来的社会利益，都统归于共产党，实际上都握在那些大小头目手里，打着国有和公有的旗号肆意横行，百姓则永远是现代的新型奴隶。共产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允许有民主自由，前面横贯着一条一党专政，残酷统治的绝路。”

公安局知道了吕维扬的现状时，即以危险分子看待，将他逮捕，判刑十年。这在吕君的家庭引发了一场灭门之灾的恐慌。他们对这个智慧过人，义勇可嘉的独生子，发疯似地拖住不放。当时举家嚎啕，尤其他的老祖母，哭成了疯婆，披头散发，时而坐地时而打滚，痛不欲生。这一切都是徒然的，即使一家人都愿替他死，也挽救不了这条好汉的厄运。

吕维扬生就刚毅性格，不被邪恶威逼所屈服。他在监内依然正气凛然，傲骨义胆。这种浩然气节，感召了不少人，大家都对他肃然起敬。这位青年被狱方视为要犯，暗中布置人来搜集他言论、罪证，撒下天罗地网，诱他入彀。从一些与他同过号子的犯人口里套取口舌，并授意三光公子（监奸）特意与他同号相栖，检举他的反动言论。

王相茂就是接近他颇久的人，狱方将他们调开，要他写检查，交代同号的思想言论，以搜集进一步迫害他的材料。王相茂是个十分崇敬吕维扬的人，无论狱方怎样威逼利诱，他也不说出吕维扬的真情。

吕君虽然年仅廿岁，却是天赋辩才，诚实持重，每日端坐在监室，从不轻易言笑，很能看顾难友。他家里每月的接济十分丰富，可他除了书籍外，大部分食物与同号难友共享。他有心血管病症，动作缓慢，每次被提审都缓步慢行，狱卒催他快走，他就转过身来，很礼貌地说：“你要快，那就请你先走吧！”他却一步一步慢慢走去，端庄沉着，狱卒对之无可奈何。

监房每层楼面的主管（狱吏）提问犯人，都在本楼面的两头窗下所设的一办公桌进行。号子里的众人见狱卒带走吕维扬不久，就听到狱吏的咆哮声，大家都明白狱吏无能和嘴笨，被吕君口若悬河的雄辩弄得恼羞成怒，现出蠢猪般的狼狈相来。例如，狱吏问：“你的反动言行是受谁的指使？”吕答：“是受了你的逼迫。”狱吏大怒，骂他胡说：“你这反动透顶的家伙竟敢反抗政府。”他却答：“千真万确，像你这样蛮横无理，我怎能不反动！”狱吏被驳得目瞪口呆，接着又嚎叫一番，气得挥拳拍桌。

监房调动频繁，狱吏皆是共党的极左分子，对犯人的监管采取高压、诱惑、恐吓来摧人意志，灭人良知，使犯人互相猜疑、检举。凡属反革命犯，尤其是以往的情报人员，必遭严刑逼害，摧残身心，折磨得死去活来。像吕维扬这样的自由思想者，也被列为危险分子，受到特种监管。吕虽是个意志坚强的青年，能刚正不阿，坚守初衷生存下去，但他能避开枪口转危为安吗？

批斗用刑

白玉珩身材高大，四方脸，沉默寡言，表情严肃。那时（1954年）有五十来岁，是上海圣方济英文中学的最后一任校长。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却被判十年徒刑，罪名是三青团团长、国民党骨干。与其他中学校长一样，他挨过群众批斗，甚而连自己的

儿女都被迫上台揭发老子的反动言论。女儿受逼站在斗争大会的台上，边讲边哭，最后泣不成声倒在台上昏了过去，这就是共产党标榜大义灭亲的故事。中国大陆的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许许多多名人学者，在共产体制下都遭受了批斗、监禁、甚而被迫害致死。这些人的家属又将如何熬过他们的苦难呢？

提到批斗，大家都会毛骨悚然，因为批斗的方法和形式实在多得难以想象。人们有时会想到古代所用的泡烙刑。这种刑罚特别残忍，一经受刑，顷刻就焦头烂额，成为浑身水泡的死尸。批斗的刑罚看来文明，而且执行的人开始也很理性，仿佛在介绍一桩十分有趣的游戏。主持人向观众发问：“你们说他老实不老实？”台下齐答：“不老实，要狠狠地斗。”主持人立刻取出五块砖块，叫被斗者双膝跪在两块砖上，双手平伸各托一块砖，头上顶着一块砖。这叫“石砖问罪”。受刑者开始以为咬咬牙硬撑过去就是了，一块砖能有多重？不料小小石砖真有摧魂夺魄之效，五分钟受刑者就觉得难以支撑，十分钟就汗流浹背，浑身发抖。再下去就涕泗满面，大声讨饶。不到半小时人就倒在地上，手脚抽搐起来。随后众人走来，拳打脚踢，皆曰装死，拖起来重来过，必要反复折磨。血肉之躯，怎经得双重的折腾？不仅肉体支持不了，而且精神也完全崩溃，这与泡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严刑使人立即昏厥，痛苦短暂。而慢慢蹂躏，则让精神难以抵挡。批斗当然不仅这些，其它种种不胜枚举。其中砖刑、绳刑、械刑、饥渴刑较为常见。凡此看来平易，不以其酷，实则更甚于古代酷刑。古刑乃外加压力，而现时的刑罚往往是受刑人自己为自己加刑，所以更是痛彻心脾。如爆炸伤命者，不知痛苦，刺指、悬吊之刑就难受得很了！目的在于逼供，不是立即处死。

监内见闻

八号监的底层，人们习惯称为水门汀号子，有一边关着十多个精神病犯。二楼的犯人有时因天雨在室内活动，环绕铁丝网围着的天井，在走廊兜圈子，可以看到下面恐怖的情形。那是 55 年的深秋，从铁窗吹来阵阵寒风，外面飘着毛毛细雨，我已经穿上一件有羊毛夹里的外套，可还是觉得寒气逼人。无意地垂首望了一下底层，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个中年疯囚一丝不挂地蹲着用手抓自己的粪便向嘴里送，我看过农村里的狗都吞食人屎，一个人这样吞大便，必然是精神有问题。他所在的号子里，墙上、地上都散满了黄黄的粪便，全身都有粪迹，地上还放着一个被砸扁了的饭盒，看了令人作呕。

这一排号子约有十六七个疯囚，其中半数是裸体，全都瘦削发蓬，污垢满身。有衣的疯囚也是奇形怪状。有一个头上扎了一根冲天小辫，像个戏台上的丑角。恰巧这时正逢清扫号子，只见七八个劳役犯匆匆走来，有二三个彪形大汉，光着上身，一人手持木杠，走近吃屎的疯囚铁栅门前，将木杠从铁栅空档里直捣疯囚，另一个劳役犯协助，将木杠抵住疯囚，逼他靠在壁上，动弹不得，第三个劳役犯打开铁栅门，用水管冲洗号子及疯囚的周身。待洗净粪便后，又将其余各号子的铁栅门打开，将所有疯囚像赶猪般地赶出号子，扫清稻草，堆在走廊。然后又冲洗号子及裸体的疯囚，裸体者被凉水冲激，冻得脸呈青紫，双手抱肩，依在墙边打哆嗦。待全部号子打扫完毕，即将众囚赶回去关上铁栅。这样折腾一番，活似动物园的的工人清洗兽笼。

监房的楼层之间都有设铁网的天井，从底层直达顶层，因此上下之间声息相通，二楼的人对底层疯囚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底层的一号囚室，每日清晨会发出一个说普通话的声音，有次在室

内活动就见到这喊话的人，其人白净面皮，长形脸庞，不像有神经症，却偏偏被囚在底层与疯囚同类。

疯囚都是一人独居，这人每天清晨就叫喊：“报告主管，我是陈国良，我要坦白交代，我是国防部上尉参谋，我没有罪，我母亲是满洲人，所以我是东北人，我的父亲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我的爸爸，我要坦白交代，报告主管，给我笔、给我纸，我要交代。”他翻来复去老是那几句话，周而复始，每天成了规律。这人从早到晚的喊话震荡着寂寞的监狱，使人也跟着他的叫喊在暗想，难道他真的是毛泽东的独生子？私生子？这个谜底没有人敢揭开，所以当时的听众都默默无声，相视苦笑而已。

在二监三楼东部中段号子里，可以透过楼面天井由二楼的窗口看到狱中的炊场和工场。每天黎明，大家依稀见到四监的劳动犯人，端着面盆，盆里装着大碗筷、毛巾、茶杯、牙刷，列队经过炊场，鱼贯进入工场（那时工场有二百多部缝纫机，专制毛料大衣出口）。有天我见曾与我同号子的张毓泉也在行列中。他原是前北京最老的政法训练所（朝阳大学学院的前身）毕业，是政法界的前辈，年近古稀，在浙江的某县当过十几年的法院院长，曾任上海特刑庭的法官，也曾在政法学院任教，为中共造就第一代司法人员，目前上海的刑法干部都是他的学生。他祖籍福建，有浓厚的乡音，住上海富民路大陆坊，每月都是他第八个女儿来见他，他叫她八妹，家景不坏，被判五年徒刑，如此从宽尚属罕见。他因谙熟统计而被调到缝纫工场劳动。

从窗口也能见到整个炊场的动作场面，每日清晨，由大卡车或三轮拖车送菜送米，然后伙房用巨大蒸气锅煮饭，用大铁铲挖饭倒在大木桶里，烧菜、出锅、按份装盒，然后分配到各监。偌大的监狱，常有三至五万犯人，开一次饭仅花两个小时（从饭菜出锅到收回饭盒），这不能不说它效率高。

炊场的上层是洗染工场，炊场就是利用工场排出的高温蒸气来工作。洗染工场承接医院的病人衣被及布厂的白布染色加工。又利用排出的余热，供暖水给淋浴室，使犯人得以每周有一次沐浴的机会。不过，因为狱中人数太多，每次沐浴的时限仅仅三分钟，这三分钟的时间能将一周留在身上的污垢洗净吗？其实徒有其名罢了！开始时不知就理，一进淋浴室见到放水就用肥皂，待肥皂黏满身时，水管已被关闭，只得由肥皂留在身上，出来穿上衣服走路，边走边懊恼不该用肥皂。这叫什么洗澡，不如不洗，身上还舒服些。

一监二监之间有专人小空地，空地靠行人道一头，圈了个小花圈，大家习惯叫它小花圈，空地另一头有口井，清晨以井水洗马桶，也用这水井的水给剃头的犯人洗头，监狱的规定每月剃一次头，未决犯可以留发，已决犯必须剃光，所以犯人可以乘剃头的机会一赏笼外风光。看到一监的十来个外籍犯，每天能享受到小花圈中散步之乐，别的囚犯不胜羡慕。别说是花圃，即使偶尔看到某个囚室有用彩色鲜艳的被单罩着内务包的，都会觉得眼界一新。间或有一只小麻雀从走廊的窗口飞入觅食，那唧唧喳喳的叫声，跳跃的姿势，也会勾起我无限感触。

5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已近就寝时间了，突然狱卒走来开封，整个监房都紧张起来，不知发生什么事。只听一声哨音，接着狱卒发话了：“大家听着，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今晚让你们看电影，现在宣布纪律：走出号子就要两个两个拉着手，顺序紧跟着走，不准争先恐后，不准留在号子里，不准说话，不准交头接耳、东张西望，要守秩序听指挥。”下楼走出监房，沿途满布手持长枪上了刺刀的哨兵，行不远就到了三监与四监的空地。迎面有横着的大铁栅栏，可大铁门敞开，进了门就是大院，大院尽头的墙壁挂着银幕，于是按次排列就地坐下。那戒备森严的场面，

早就驱散了我观剧的兴趣。影片是老掉牙的俄国古董，社会上没人要看的“列宁的故事”，像看皮影子那样乏味，只不过是一个矮矮的狂人在指手画脚叫喊一阵而已。好容易挨到散场，觉得浑身冰凉，黑暗中随着众人手拉手回到监房。昏暗的黄色灯光照射出一个个排列的小铁笼似的号子，既狭又矮，朦胧间觉得自己成了个动物，驯服地被推进了笼子里。心底里有一股像猛虎被关进笼子的怒气，虎可以大声怒吼，以发泄怒火，而我们则丝毫不能出声，被逼得心痛如绞。

凡在禁锢中的人，一切仰望，一切追求的欲念都得停息，像切断电源那样，木然静止，否则就会发痴发狂。于是我所信仰的神，就在我心底占有了至高的地位。忍耐和等待成了我灵魂活动的中心。我静观这一切，监狱的生活逐渐告诉我，一号监是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和数十个单独禁锢的外籍犯，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法国人等。他们的待遇优于中国人，吃馒头不限量，餐餐有肉食、随时有水饮，用水不限制，每天早晚放两次风，可以随意交谈。二号监是老弱犯，三号监是编队调出去的劳改犯，四号监是工场劳动犯人的宿舍，五、六号监是新收的未决犯，七号监是反省交代犯，从严管理，静坐不准靠，不准活动，不准交谈。八号监是病犯休养监，地下底层是精神病，二楼是高血压和心脏病犯，三楼是外科病犯，四楼是结核病犯，五楼是麻疯病犯。九号监是刑事犯。没有小号子，都是大间通铺，成百人在一起。十号监是医院，病房和门诊。炊场在监狱的中央。监狱围墙的北面另有一个园子，这是以前关押外国人的监房，如今改为女监，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囚在里面。女犯也有千人以上，同样编队外调劳改。

中共建国以来，每次运动都有大批新收罪犯。这些所谓的罪犯皆系以往政权的党政军官员，包括国民党、汪伪政权、军阀及地

方、民间武装组织、帮会等，宗教界的神父、牧师、传道者、信徒，以及会道门的成员，文化教育界的首脑要人、外国公司洋行的职员。连修女，尼姑都被列为反革命，地主富农资本家也都是清除的主要对象。上海提篮桥监狱乃是劳改犯人的集中调拨站，每次运动总有十万廿万的犯人调往各地。每次调出都在午夜街上无行人时进行。监狱集中百辆大卡车将犯人运送到郊区小站，转乘铁皮车厢。这种车厢无窗，只有一扇大铁门，里面放两只大木桶，作为便桶，不到目的地不开门，日夜行驶。犯人分给干粮和咸菜，一日发两次开水。每个车厢都挤得满满的，彼此背靠背地坐着，有时要坐三五天。夜间以手提的灯照明。冬天寒得透骨，夏日大汗淋漓。车内臭气熏人，如同载运猪牛。这些犯人一批批被运往全国各地垦荒、筑路、开矿修堤，做苦工。较之世界上其他的奴隶制和俘虏营更为悲惨。以安徽省而言，有治淮工程的两个支队，调动了数百万犯人，如双沟的切岭工程就用了卅万劳改犯，另有水库工程，梅山、佛子岭，响洪甸等，开垦白湖，普济圩、洪泽湖等工程，无不由千千万万劳改犯用血汗完成。老犯人刑满，被强迫留场就业，准许接来家属共同生活。这些人成为不折不扣的现代奴隶。

合肥监狱(新生棉织厂)

监狱对囚犯都要攫取和利用，剥夺了劳改犯的政治价值之后，就开始利用他们的人体价值。我后来也被推入这个行列。56年5月8日，我被监方宣布调往外地劳改。监方规定，凡调出的犯人，都要事先通知犯人家属，允许接见和送衣物食品。78岁的父亲接到狱方通知，赶来监狱接见，鬓眉皆白的老父拄着拐棍与我见了最后的一面。父子隔着铁丝网，哽咽着聊聊数语：“儿啊！知道

你远调，特地来看你，我怕今后不一定再能见面。”一语成签，这是父亲生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我以后再也没有看过他。老父并将厂里剪下来的布边，辫成了一根长绳，给我捆行李，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纪念物。

隔了一天，我们被押解坐上一辆中型吉普，连我十五人解离了提篮桥监狱，驶向北站。所幸我们人数少，坐普通乘客车，与百姓一起。我们被安置在靠厕所一端的座位上，前后有解差封守着，不准群众接近。劳改工厂的副经理和管教干事分给一人一份馒头和咸菜。下午抵达蚌埠车站，改乘合蚌线的客车驶往合肥。到达合肥车站，由省公安厅用市内的大巴士将我们十五人送到新生绵织厂。我这时才知道国内各地许多的工厂其实都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明明是监狱，但是门口挂上工厂的招牌。四周围着高高而又没有电网的围墙，大门有荷枪的士兵站岗，戒备森严，里面除了临门有所办公楼以外，全是一排排的平房。大巴士停在大院中央办公楼前，我们陆续取下行李听候分配，十五人都是裁缝，我和一个年轻的孙士勤是反革命犯，其余都是刑事犯。十五人中三人患有结核病，两个是手工裁缝，统统被分在被服车间劳动。

劳改工厂是中共用无偿劳动创造财富的一架大机器。这个省级劳改单位，规模庞大，如布厂，铁工厂，被服厂，以及分布在各地的劳改农场，水库工程，治淮工程等，由公安厅所辖的劳改局统一管理，使其逐步发展。布厂，发展为纺织厂；铁工厂，扩大为拖拉机厂；修配厂，扩充为机床厂；被服厂则专为全省的劳改犯制做囚衣，并在城市设有门市部营利。这些工厂和建筑工程，由无偿的劳改犯人承担制作，农场和畜牧场的劳改犯，是永远的奴隶。安徽省的劳改犯不下千万，这些劳改场形成一个恐怖的奴隶禁地，遍及全国各省各县，控制之严犹如军营，编为班组、中队、大队，犯人受虐之残酷，超出俘虏营。

新生棉织厂有三分之二的女犯，被服车间则有三分之一女犯，铁工厂，印刷厂也有少数女犯，文娱组和医务所半数的女犯。在工作区男女犯混合在一起，但生活区的宿舍则有严格的分界。

犯人的生活比监狱较为宽松，吃和住比农场、畜牧场，及各工程的劳改场要好些。当时的伙食标准约在七、八元之间，糙米加豆饼饭可尽吃，有时也供馒头。早餐稀饭、咸菜，中、晚六人一盆菜，萝卜、白菜、豆腐合在一起，每星期有一次荤菜，猪肉或鱼。1956年正逢中共对罪犯施行人道主义，实行劳动三八制，劳改犯可获得假定工资和技术津贴，有上诉权，对财政可以讨论。贴出告示后，罪犯之间一律以同学称呼，准许留发。工人可在生活区自由活动，有篮球、乒乓球、图书、扑克、象棋等文娱活动。在56年秋季，狱方组织一批男女劳改犯参观合肥市的建设，乘大卡车去游览逍遥津公园及包河公园的包公祠。接着又召开劳改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工厂车间的班组，评选积极分子。被评上积极分子，戴上红绸证，出席三天的积极分子大会，并给予奖励，如提前释放、减刑金钱和物质奖。大会期内通知积极分子的家属参加大会，受来宾待遇，准许夫妻同宿。凡是积极分子，三日内每餐四菜一汤，整只鸡、整尾鱼上桌，如逢喜庆盛宴。可是这一系列的人道主义过后，跟着就是57年的肃反运动，在监内叫做整顿监狱制度。

所谓的假定工资和技术津贴，乃先令各个工程评级，与社会上的工人评级一样，从一级到八级：一、二级是徒工，每月发给六角，例如社会上工厂的四级工每月的工资为五十元，而犯人的假定工资是3%，即每月得一元五角的假定工资。八级工以上才有技术津贴，每个车间能有几个八级工呢？也就是只有少数几个技术超群的犯人能领到5-10元的津贴。这仅有的几个人是工厂创造高额利润的尖子，好似戏院里的台柱，少了他，戏就唱不成了。

至于三八制，实际上八小时高强度工作之外，尚有中午 12 点至两点，晚上七点至九点十分难熬的四小时学习时间。由小组带领，团团围坐，先讨论工作和技术改进，作出合理建议后再学习时政，一切都作记录。每人的一言一语都由记录员记在本子上，会后送呈干事查改。如果某个犯人犯了错误，不论错误属于生产或言行，要立刻反省，轻则检查作交代，重则召开斗争会，斗得犯人精神崩溃，服服贴贴。斗争会上鼓励与会犯人大胆发言，提高认识，给挨斗者上纲上线。挨斗者，只准低头认罪，不准反驳狡辩，反驳就是不老实，会被加大火力连续批判，直到斗垮斗臭为止，并加刑期。

这就是监狱的一套整人的手段，表面看来好似温和文明，可是它的实质奸诈险恶，和风细雨一阵过后紧跟着就是秋风黄叶严冬来临。被服车间的女劳改犯夏萍是汤恩伯长官部二处的邮检员，被判十五年徒刑，她按照告示的规定，上诉了。我曾看过她的上诉状，只是重复写了她的履历，并未写出理由。另一个是被判无期徒刑刘大名，也上诉了。出人意料，这两人被厂方宣布提前释放，留厂当职工。即时迁入职工宿舍，在干部食堂入伙，月薪 30 元，大有一步登天之势，全厂对之瞩目。然而好景不长，1958 年初，除刘大名调外，夏萍又出现在女犯宿舍，在大饭场进餐了。其他一些上诉的犯人都被加了重刑。全国发动了大清洗，大批新收的犯人涌进监狱，大伙房改为三餐稀粥。球场乒乓室无人问津，文娱组的锣鼓也歇息了。唯有厕所出入的人数大增，积极分子的大会盛况已一去不复返。

劳改犯像猢猻，被玩猴的牵着翻跟斗，戴假脸，一根鞭子一面锣，玩得你屁滚尿流。稍有不驯，鞭子一响，只得抱着头蹶起屁股认输挨揍。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整人把戏，在新生棉织厂这所新型大监狱里，不知毁了多少英雄好汉和才艺能手。全国闻名的

一代影星石挥的胞兄，杨 XX 就关在这所监狱里。他是 55 年入监的，判刑十五年，被分派在文娱组。该组是监狱内部以犯人组成的一个京剧文娱小组，连编导在内约卅余人，女犯五人，杨是剧组编剧兼副导，这算是对他格外照顾了。他原是辋汽某团的团长，军校十期生。受乃弟石挥的影响，毅然留在大陆，从事文艺工作，编写了“关连长”和“我这一辈子”两部电影剧，由石挥主演。他死心塌地为中共效力，无奈过份天真，误以为共产党真的是自由民主为人民服务的进步政党，结果上当受骗。乃弟石挥因阿兄无故入狱，愤怒之下，出言冒犯了中共，被打成右派，被判劳教，押解白毛岭农场改造。59 年他越狱逃至广州，拟偷渡到香港，竟被便衣警察跟踪追捕，石挥被迫跳海，不幸溺毙在大海中。

文娱组另一知名女犯张雅彬，系上海名票，擅长程派青衣。省公安厅以查案名义，从淮总二支队把她调来。初来时厂方以客相待，大饭堂竟为她张贴海报，“今晚张雅彬演出《玉堂春》”。弄得全厂犯人莫明其妙，以为请来社会上的名角。由于她唱作俱佳，且扮相俏丽端庄，气质耀人，竟轰动省府权贵。第二晚，大饭堂所有窗户挂上布幔，生活区的空地上停满轿车。演时不准劳改犯入内，演出专场由省府高官欣赏。其后该剧在合肥江淮大戏院对民众演出，场场客满，风靡一时，她成了劳改队的偶像。但她的生活依旧在文娱组，每天清晨在饭堂的戏台上练功吊嗓子，一日三餐是在大众的饭场依次排队盛饭。她在这个充满着晦暗丑陋的囚群里，似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格外耀目。传说她是前上海市稽查处处长陶一珊的小妾，因而被判五年徒刑。半年后复调回淮总二支队。当时她曾与某医犯相爱，有过一段曲折的故事，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有一个被服车间女犯，是合肥尽人皆知的季司令女儿季业芝，乃父绰号季三狗子，曾是李宗仁部的中将。季业芝自称幼时

曾拜认李宗仁为干爹。她在中共占领合肥时曾散发反共传单，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当时年仅十八，是个肥胖型的少女，监狱中仅有的大姑娘。狱方因其父的名声，把她作为管教的典型。每逢什么奖惩大会，或什么运动开始，总要命她登台讲上一些拥护共党英明伟大，感激政府不杀之恩，小女子罪该万死等的肉麻话，以示范开导，鼓励其余。其时，乃父已故，家中尚有老母及兄嫂。以往颇有资产，合肥逍遥公园邻侧有季家花园，即乃父的遗产，已被收归公有并入逍遥津，因此家产已化为乌有。十年铁窗正值青春年华，她怎经得浪蝶勾引，因而两度失身。几次关押于禁室，也曾一度寻短见，吞大头针自杀。转辗廿年后，76年2月，我被中共宽释，集中在白湖农场场部。偶遇季于场部途中，她已是中年妇人了，携着她的十岁女儿在塘串河小镇居住，而我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彼此尚能辩认，云及身世，唏嘘不已。她十年前嫁给一个劳教期满的青年，因原籍天津，不能回归，只得双双留场就业，被分配在白湖农场东大圩职工大队，终此一生。

布厂有一个上海籍的女犯，原是上海某越剧团的演员，本名黄蕊芬，长相俊秀。判刑三年，因为她天赋美态，所以从布厂调到文娱组，改学京剧。其实她对京剧一窍不通，一个女犯能调在本行服刑，那是最理想的事，因此她在吊嗓练功上格外用心。无奈任凭怎么努力，那副天生不脆不柔的嗓门难入京剧行列，只能扮扮宫娥彩女跑跑龙套。有次文娱组试演越剧，布厂的女犯张美珍与黄蕊芬合演西厢记的一折《游园扑蝶》，黄扮莺莺，张扮红娘。这本是出红娘戏，一出场引得个满堂采，因为两人的扮相称得上得体，在犯人眼里，成了天仙。可是一开腔、一走台，顿时暗淡无光了。原来，这个张美珍压根儿未曾登过台，根本不是演戏的材料，一个俊俏活泼的红娘，被她演得哑然失色。张美珍经这一试，就被打回布厂去了，而黄蕊芬被留定在文娱组。

掌管文娱组的周干事，在干部中算得上时髦，中等身材，白净的瓜子脸形，带三分女性的修饰习惯。他总是将乌发梳得光溜溜的，清早就坐在舞台后面的小办公室里弹四弦琴，颇有些洋味儿。也许是他的职业所养成的习惯，他总是一本正经，给人以做作感。每晚灯下总有他叮叮咚咚的琴声，令人厌烦。

一曲寄相思，周干事早已垂涎黄蕊芬这朵囚中鲜花，远远对着女囚的宿舍小窗，改弹起靡靡之音，向佳人倾诉相思之情。文娱组的囚犯戏子皆窥透个中奥秘，这朵狱中奇苑从此进入了保护伞下。每到评比，正是周利用职权讨好芳心的时机。年终评比，她必会获得一份意外的奖品。这一套玩意怎能避得明眼人，在这严峻的场所，多少双忌妒的目光集中在抓别人辫子的立功焦点上。终于，在一次狱花与周干事幽室交欢时，被人告密，双双就擒。堂堂管教干事，立刻成了阶下囚。

在官官相护的桃色案中，奸淫一个女囚，只是罪恶表面的一层浮尘，无须大惊小怪。何况这政权的高层显贵，都有选美纳艳的特权，什么文工团、舞蹈学院、艺校、体校，无非都是掩面桃花，有着半个内宫的阴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公然占有下属的娇妻。周干事熬过了两年劳教。黄蕊芬先他刑满，名花岂能无主？劳教过的周干事，深悔旧梦难温，他饥不择食地与一个丑陋的刑满女医结了婚，并生儿育女，真的一对劳改鸳鸯，倒也悠游自得。

另一对狱中情侣，他们的命运就很乖戾了。男的是空降特务殷若平，小伙子英俊倜傥，善于写作，文笔敏捷流畅。为管教科杜科长赏识，从蚌埠调来就派在布厂“生产快报”（油印版）担任主编，并兼播音室的播音员且管理图书，是全狱中的幸运儿，称得上知名犯人。他为布厂女犯吴氏所钟情，吴虽长着一副不惹眼的脸蛋，却三围显突，有股少女的媚态。她情不自禁，以投稿为名，向狱报主编投送情书。她并以仅有的几元工资，藉还书之机，夹

在书里献给情郎。这些作为，难免泄露，被监探窥破，报告到了管教科，人证俱获，一双情侣抵赖不了。男的写反省，女的带上大镣，监督劳动。厂方以此警告全厂劳改犯，罪犯除了有劳动的自由外，没有任何自由，不准婚姻恋爱！不服从监规就是重新犯罪，要受法律制裁。不久这个空降特务被调离布厂，解往洪泽湖农场劳动。被判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一旦进入劳改农场，很难熬过田间劳动的苦役，一对有情人终被拆散。调走的消息传遍布厂，这个少女像疯了似地不顾监规，手里提着镣绳，狂奔到解送的大卡车跟前，哭成泪人似的向情人送别，其悲伤不亚于死了丈夫的新寡。

囚 怪

狱中的怪事，莫过于传遍全监的倪小鬼，这件事出现在 1956 年的秋天。泽湖劳改农场调来合肥新生棉织厂一批犯人，分配在公安厅直属基建队，归殷队长管辖。这批人与布厂、被服厂的劳改犯同一排宿舍，由一个大铁门出入。调来的第二天中午，饭场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犯，人们指着谈论他，说他是怪小鬼，有一套神奇的本能。更有人说他似神仙，如传说中的济颠活佛，疯疯颠颠没个正经样儿。穿得破破烂烂很邋遢，敞怀露胸，束一条纱带，拖着一双破鞋，走路歪歪斜斜，众说纷云，讲他会吹会变。所谓变就是魔术师那样空手能变出来东西来，至于吹，经他念念有词用口一吹就能使破碎的物体完好如初，不留痕迹。

此子倪姓名家宽，原籍安徽泗洪县下漕湾，乡土口音很重，似海州一带方言。他的一套法术曾轰动蚌埠、明光一带民间，因中共指其违法行医，被控“巫术治病，以幻术行骗，淫污少女”判

刑四年。可他的实质乃中国古代相传的如《聊斋志异》中所载狐鬼之术，并非虚幻，他的作为颇为离奇，绝非科学理论所能解答。

故事应从倪家宽的家乡说起。下漕湾是泗洪县的偏僻农村，一眼望去尽是茅屋草庐，见不到大户人家。他和母亲哥嫂及一个周岁大的小侄女住在村东的一座茅屋里。屋分三间，两边是卧房，中间是堂屋，屋向正南，三面用芦杆围起个小院，院的两侧，东面是厨房，两边是毛厕。那时倪家宽年方十三，突然患病死去，但尚有微温，家人将他置于堂屋，用门板搁起，待置棺埋葬。三日后他突然复苏坐起，其时四邻在暮色中只见倪家茅屋火光冲天，疑是火警，奔来救火，方知并非火警，而是死去的小鬼活了过来，无不称奇。他的一家不知有异，对着小鬼问吃问喝，欢天喜地热闹了一阵，以后也就平静如旧。

一天鱼贩挑着担子经过门前，阿嫂呼唤要买鱼，出门买了一尾回来，走进堂屋，只见一条大鱼在地上乱跳，诧异得却步痴望。而小鬼坐在一边笑着说：“阿嫂，拿这条也洗了煮吧！”阿嫂起先以为是小叔偷来的，但未见他外出，嗯了一声未便多问，可总揭一不开这闷葫芦。

又一日，一个小鸡贩挑着箩筐到村里叫卖鸡娃，阿嫂想买，走去问了价又折回来，嫌贵不买了。小鬼见状，便起身站在小院口，望着远去的鸡贩箩担，嘴里嘀咕一气，一手抓着衣兜回头走了进来。随即从衣兜里一只又一只接连掏出十多只小鸡娃，放在地上叽叽叫着乱跑。阿嫂见此愣得不知所措，小鬼提醒嫂子快拿木盆来将小鸡提到盆里。从此全家人知道小鬼有奇能，可他自己并不在意，既不夸耀，亦无异态，若无其事地默默无言。

冬日小鬼晨起倒在门前的草堆下晒太阳取暖，忽见邻家汉子从身傍过，口嚼花生，边走边吃，好不饕人，遂尾随之亦边走边吃。行了一段路，邻家汉子再探手口袋，已空空如也，心想怎的没吃

多少竟没了呢？回头看小鬼，手中大把花生，正连连嚼食，岂知小鬼嚼的正是邻人袋里的花生。

不久，小鬼的奇能由乃嫂悄悄传了开去。因此一些走乡闯镇的小贩不敢到下漕湾叫卖，唯恐自己的货物被小鬼无影无踪地夺了去，而这一方的农民亦因他的奇能迷信起来。那时邻村有个妇人难产，肚痛了整天整夜产不下来，没有命似地叫喊，收生婆没奈何，于是求助于小鬼，他竟满口应允，跟着到了产妇家。他见产妇已声嘶力竭，痛苦万分，就走近产妇，伸手抚在隆起的腹部徐徐向下推动，口中喃喃有词，顷刻之间，只听哗啦一声，婴儿已落在收生婆的手中，一切平静，母子平安。这件事轰动了乡村，传为奇闻，一下小鬼被尊为仙人。自此凡有疑难病痛者，咸来相求。他的名从此远近皆知，真的手到病除，竟被奉为神灵。

有个姓潘的乡绅，闻名特访倪家与倪母相商，愿带领小鬼，亲自教养。倪母见潘老爹乃头面人物，回顾自身丈夫早故，家贫如洗，闻此欣然应允。潘某原是个江湖人物，对小鬼如获至宝，遂带领他出入市镇，走闯江湖。其实，潘某领养是假，利用小鬼攫取财物是真。小鬼逐落入奸人之手，故每到一地便进入街市的粮食行、布庄、银店等大商店，凡小鬼目光所及，无不得心应手，大把钞票入到他的口袋。事实上他已入了黑行，是未曾叩头拜师的弟子，是未结帮的潘家班门徒。他的所为不同于组帮的团伙，他有一套行窥的特技，胜过四十年代驰名于齐鲁，活跃于平津的神偷燕子李三。倪小鬼无须出手，撬物就似照相一样，无形中入了腰包。

这个出生于穷乡僻壤的儿童，从未涉足城市，除了穿衣吃饭不知有家庭以外的人情事故，社会知识尚停留在启蒙阶段，所以任凭潘老爹摆布。他既不认字也不识数，纸币的使用、票面几多，更是茫然。只晓得每餐有鱼有肉，穿新衣，有鞋有袜，比在家过

年还要好。他随着老爹从蚌埠到南京，一路乘上从未见过的火车，进饭馆，住旅店，样样新奇得像在发梦。如此有年余，潘某已腰缠万金了。由于他并非上层士绅，行踪也限于他的知识和生活习惯，不敢过甚招摇，一路像贩卖行商，返回泽洪后即时遣散小鬼。当时赠倪母小牛一头，以助倪家耕耘。以农村状况而言，一头小牛非同小可，值得六七百元，辛苦一生亦未必挣得一头牛。乡里的细小事都会引起风波，何况倪小鬼已是名声在外。自从他周游了蚌埠京华之后，更是传说纷纷，因而引起乡里的治安人员的注意。有次，倪家宽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治病，发生了性行为，被民兵捆绑解送引法，判刑四年。那时他正十六岁，属于少年罪犯，被送往洪泽湖农场劳改。

在洪泽湖这段时间里，他也有着令人咋舌的奇事。据同时劳改的目击者说，当时鉴于他有癫痫症，他在农场并未参加田间劳作，每日与几个年老体弱犯在一起做理草打绳的手头活。未隔多久，倪母来到洪泽湖劳改农场探监。自从宝贝儿子被抓走后，她一直哭哭啼啼想和儿子见见面，这次总算打听到实情，所以带了些咸肉、鱼干和蒸馒头来看小鬼。监狱对倪家宽并不严格，允许倪母直接到工地接见，也允许将带来的衣服食物亲手交给小鬼。干部不作监视，由她自由会见，给了半日时间。一见面，倪母就抓住儿子的手哽咽着不放，一面向同在的犯人诉说开了：“我家小鬼原是死了又活来的，谁知活来就有占仙了！那时邻居见我家屋顶有火光，都赶来救火，不料却是我家儿子活过来了，从此他就会给人治病，这是菩萨教他的。阿弥陀佛，给好多人看病，我们都不收钱。人家都说我家伢子出奇，活来时屋上面有火光。得病的人拿了肉啊蛋啊糖啊什么来求，不是我们要的，可是大队说他是邪门治病骗钱，将我家的牛牵去归公了，又指我家伢子糟塌了人家的姑娘。呀！真是冤啊！我家小鬼给那姑娘治了病，是姑娘自愿

与我家伢子好的，已说定娶她做媳妇哩！这是给你们几个说真的，大队的治安组，不凭良心，硬指我家伢子强逼的。”说着就哭了。大伙儿劝她不要讲了，给干部知道会加重处分。倪母边说边拿篮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其中除了食物外，还有短衫裤。最特别的是双绣花女童鞋，倪母拿着这双小鞋对小鬼说：“你哥嫂都很挂着你，叫你安心好好守规矩，熬过四年回家。嫂子特地把这双你在南京为孙女买的花鞋捎来，要你念着她早日回家，这双鞋孙女早就穿不上了。”临别时，她千叮万嘱，要小鬼千万不要再搞名堂了。她含着泪走了，而小鬼若无其事地笑着送倪母远去。

劳改犯人的生活，像枯井里的蛙，整日禁锢在一堆堆稻草圈子里，做着毫无兴趣与草打交道的劳役工作。而仅隔百步之遥的对河，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冬修作堤，一河之隔竟似两个世界。对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肩挑手提的小贩向民工叫卖，有馄饨挂面、大饼、油条、烧鸡、卤肉。这一边则是十来个老弱囚犯卷缩在草堆下，显得格外清凄，中间有桥樑相通，可是警戒森严，岂容罪犯逾越。这种悬殊的景况，刺激着这怀有奇能的倪小鬼，做出了令人惊奇的事。

终日默默无言的倪家宽打从倪母接见之后，经常独自蹲在草堆下晒太阳，嘴里不断嚼着食物。大伙顾念他年幼，不予过问。但是算算他妈带来的食物，大部分已给了众人分享了，怎的过了这么久，他还未吃完？于是对他由怀疑到注意，发现他吃的都是香喷喷的卤肝、烧鸡，也有时将油条花生往嘴里送。热闹的河那边当然无人留意这些，可近在咫尺的伙伴，一眼就认出他吃的都是对河小贩担子里的东西。这些美味随风飘香，令人馋涎欲滴。其中有馋劲大发的老头，忍不住竟走向小鬼求食。小鬼很大方，有求必应，顺手撕一块鸡腿送进老伙计的嘴里，这一来，门便敞开了，引来众手齐伸，应接不暇了！也有只给几粒花生。众人明知

犯人压根没存过钱，即使有钱也过不了警戒线，他的东西哪里来的呢？不禁纷纷向小鬼提问，他却笑而不答，随即从怀里取出大块猪肝与大家分而食之，并说，你们吃呗！别让干部知道。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小鬼身上那件棉袄油光光的，原来那些鸡啊，肉啊都藏在没有内衣的怀里。大家都如同饿鬼一般，哪里还在乎什么干净的问题，争相着拿来就往口里塞。对着这出奇的事，众人默默地藏在心里，小鬼每次分给大家的香喷喷的食物东西，都是河那边食贩担子里的货，小鬼怎么搞来的呢？难道是飞过来的？但又无影无踪。

日长时久，河这边的几个劳改犯，经常有美味可餐，这在监狱中是非同小可的，一年能吃几次荤？如今佳肴不断，暗暗称幸。然而对河的小贩，不时叫苦，轮番遭失，明明数过的货，莫名其妙地少掉，有的未开市就不见了整只烧鸡，疑是行伙在捣鬼，但又毫无迹象，成了哑巴吃黄莲。

有一天，一个少妇提着个竹篮行在民工的大堤上，看来像民工的家属前来给丈夫送食的，穿得很整齐，模样也俊俏。在工地上出现这样的妇女，引起众人瞩目，亦触动了小鬼的邪念。他嘴唇动了一阵，不知嘀咕什么，对河的少妇正行走中，突然裤子掉了下来，下体毕露，惹得四周人哗然哄笑。少妇羞得急忙垂首弯腰提裤，边束边急步前行。不料走不几步，裤子又复脱落，如是数次。倪小鬼却站在隔岸埂上失声大笑，此时对岸的民工和小贩发觉乃小鬼的恶作剧，由惊奇转为愤怒，因为那少妇被捉弄得蹲在那里哭了。随之惊动了警戒的岗哨，又招来干部，齐对小鬼怒斥遏止。分明是小鬼施的法术，不容抵赖。在乱轰轰众怒之下，他被指为妖怪、邪魔。几个哨兵立即过来，将小鬼五花绑，押送大队，关进囚房，然后又带上大镣，从严监管。不久，他们乘处决一个抗拒犯之机，将他绑赴刑场，插上亡命牌陪斩。

刑场上，倪家宽脸色苍白，昂着头。另一汉子蓬头垢面，背上插着亡命牌，被两个士兵架着走。这人脸上无人色，瘫软得不能自主。这是个枪毙人的场面，周围有警戒，正面是高坡，坡下是块大空地。老百姓站在远处望着，一队队从工地、田间来的劳改犯，按序排列就地坐下。台上主持人讲完话，就宣布两人死刑，立即执行。只见两个被绑着的犯人被押跪在台侧的空地上，哨音一响，两个枪手就对准两个处决犯开枪。那汉子应声倒下，头部开花，血流如注，而倪小鬼依然跪着。枪手走去将他拉了起来，推他上了卡车，这时小鬼像个能活动的尸体，面色似石灰般地吓人。

倪小鬼像又一次死了获生，再也不敢向人施法弄术了，人也痴呆了许多。冬去春来，农场春耕开始，倪小鬼仍做着老行当。时将午膳，收工路上见一台拖拉机停在田里，机手拿着一根断成两截的螺丝，站在埂上急得抓头皮。恰好小鬼走到跟前，他伸手从司机手里取过两截的螺丝将它对接在一起，然后嘴里嘀咕一阵，向断裂处吹了口气，再以手指按一下，转身给司机。那司机接过来一看竟然跳起来拉着小鬼的手，连连道谢不放。原来那枚断钉已完好如初，见者惊夸不绝，立刻被众人传扬开了。司机仔细察看，没有裂痕，装上部件立即开动，乐得观者拍手叫好。这奇事传开不久，小鬼所在队的伙房，一口大锅锅底裂了一块，无法举炊，急忙间难以补复，于是队长召来倪小鬼要他即时修复，不可误了开饭，小鬼仍以一吹之术，立即补好了这口破锅，再次博得干部的信服。

陪斩后的倪家宽，经过一段从严监管的过程，收敛了施法，变得越发沉默。由于他的出生环境和未受过教育，形成了不受矩束的习性，经受了一次强大冲击被制服了。但他吹复了断螺丝，复原了破锅之后，他的名又响亮起来了，监狱对他有了进一步探讨

的兴趣，采取保留而不扩散的措施，因为这类神奇的法术为毛思想所禁忌。省公安厅将倪家宽从洪泽湖农场调到合肥新生棉织厂，不让他参加劳动，对他开始探讨。初到时，关于他的奇闻已传遍全厂，他到的那天，饭堂刚开完饭，众多犯人簇拥着他想一睹他的奇能。

来自农间的倪小鬼，乡土气十足，凭他那副平扁的脸庞，老婆婆外形的尊容就够人寻味了，如果他手持破蒲扇，头戴破僧帽，加上原有的那双履，肯定被误认为疯和尚济公再世。他在厂里一出现，众人就跟踪至饭堂的侧墙下，央求他变一个玩意儿，让大伙儿开开眼。眼下没有干部在，小鬼回顾四周，对跟着的人说几句“要我搞什么嗨”，随即在自己的破袄里头里撕下小团旧絮分捏成几个小球，嘴巴动了几下，对着棉球一吹，手里就飞出几只麻雀，吱吱几声展翅远去，引得大家拍手叫绝，哄笑不已。正在七嘴八舌时，来了个布厂犯人，名叫董毅，他手里捧着碎成几块的玻璃板，匆匆走向小鬼打躬作揖，求他作个法使之复原。小鬼望了望董毅，见是个肥头大耳胖乎乎的汉子，斯文有礼，是个正经人。接过来将玻璃拼在一起成了整块，嘴里嘀嘀咕咕一阵，然后对着碎板吹了口气，顷刻之间恢复原状。喜得董毅拍手叫好，露出山东人的本色，竖起大拇指说：“你真个活神仙！”不料 58 年监内整顿监规时，董毅因这句话挨斗，并加判为无期徒刑，解送白湖劳改农场挑大土。

这事传到监狱李厂长耳朵，次日早晨，他来到事务长办公室，欲亲睹倪小鬼的魔术。快到上班时，事务长站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从伙房走出来的倪小鬼说：“小鬼，你给我变个什么瞧瞧。”小鬼见发话的是个干部，就立停在伙房门口答道：“你摸摸口袋里是什么。”事务长低头一看自己的两边口袋，鼓了起来，伸手从口袋里取出两只山芋。不禁大笑，随即招手叫小鬼进入他的办

公室。大家奇怪，在事务长与小鬼之间相距有十来公尺，堆在伙房门前的山芋怎会到了事务长口袋里？至少有几十双眼睛瞪着，怎么没见到任何迹象呢？真叫神哪！好奇的人们想一睹究竟，围在办公室门前，只听到室内发出阵阵笑声，揣摩着必是小鬼出了不少奇招，所以引得李厂长等如此兴致勃勃，比瞧舞台上的魔术表演更精彩奇特。这个李厂长，实际就是监狱长，他肥胖高大的体格，令人见而生畏，这日他出现在事务长室，是特来试探倪小鬼。这位毛泽东思想的卫道士已被倪家宽奇妙的绝技所吸引。魔术有道具的遮盖掩饰，纯属虚假，而小鬼的这一手是两手空空，取来的东西皆“货真价实”。稍后，倪小鬼穿起一套黑色新囚衣面带笑容走出来。

倪家宽因有癫痫病，无用劳作，成日在监狱的生活区闷散，到处走动。初到时因人数众多，宿舍容不了这许多人，他们暂时在饭堂打地铺。饭堂里被洪泽湖的新犯占满了，大伙儿只得在饭堂外的空地上开饭。这段时间里，因小鬼食宿都与众人同在大饭堂，发生了不少令人捧腹的趣事。

工厂劳作，每晨七时上班，下午六时收工，中午有一小时的午膳时间，晚间有两小时的思想教育时间。在工作时间不准进入生活区，唯有倪小鬼，他所在队的劳改犯都外出做工了，他则任意溜达。有一天他在近厕所的空地上闲逛，遇上几个布厂刚落班的劳改犯，围住他要求变一套。起先他不肯，后来有一个劳改犯说给钱，他答应了。原来那人有一只断了柄的铜勺，请小鬼给接上，小鬼接过断勺，将两截对在一起，口中念了几句听不清的词，然后对着断勺一吹，立刻恢复原状，没有拆断的痕迹。围观的几个人高兴得跳起来。随后小鬼向勺主要钱，那人竟摊手作势说没钱，小鬼恼了，夺去铜勺，即予拆断，掷在地上，愤然离去。可是那几个人却笑得前俯后仰，望着小鬼的身影，称奇不已。

小鬼转身缓步进入毛厕，此时正值中午，小鬼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蹲下大解。恰好一个叫陆勇的电工也在大解，手里拿几张上海产的便纸蹲在小鬼的右边粪槽上。小鬼见有便纸就伸手向电工索取，陆勇遂借机一试他的法术，将一张便纸撕成碎片递给小鬼。只见他接过碎纸，嘴巴动了一阵，随后将碎纸合捧在手窝里，对着一吹，竟成了一张完好的便纸，这一刹那的奇妙变化，得使陆勇目瞪口呆，难以置信。这纸是上海寄来的，这里没有别人有，确是把他弄糊涂了！

1957年的元旦，这批洪泽湖来的劳改犯已从饭堂迁入监狱第二排大宿舍，与布厂、被服厂的劳改犯同大门出入。宿舍里每间房住十六人，小鬼与直属队的老弱病犯同住一间房。其他人不出工都要待在室内，小鬼则常常溜出去转悠。回房时嘴里零食、糖呀、麻饼呀总是在怀里揣着掏不完。有人见小鬼每次出去必往供应站门前转一下，然后边吃边走回宿舍，因他年幼无人过问。老人们明知他的来头，借那天中午伙房蒸大馒头，遂央求小鬼顾念老人们肚饥嘴馋，作个法找几只热馒头给大伙尝尝新，小鬼首肯。于是，他走近窗下，眼望着伙房，手里用一顶草帽做遮掩，嘴里嘀嘀咕咕，随即将一只只热腾腾的馒头，从草帽里取出来分给大家，连他自己，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众人惊奇得呆望着，他只是憨笑。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监。

被服厂裁剪房有个患先天性残障的黄姓裁工，有天从饭堂兴冲冲迈着摇摇摆摆的步子出来，回到车间喜洋洋地告诉同工说：“你们来看，我这只掉了柄的大瓷杯给小鬼一吹就接上啦，连个破绽都没有，真叫神啊！”黄摆子这一说，引来许多人拥来看，不一会儿，全被服厂的人知道了。可是，这个厂的女劳改犯从来都不敢接近小鬼，在这里从未见过女犯人跟着看热闹，因为一些女性都听说小鬼爱捉弄女人，唯恐被小鬼搞恶作剧。

1956年至57年的下半年是经济的兴盛期，那时的监狱制度比较有人情味，宣扬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提倡评选劳改积极分子，组织挑选改造表现好的劳改外出参观市政建设等等。并改善伙食，对技术劳改犯定级每月按级别发给一至五元的工资，米里加豆饼的干饭不限量吃，半月吃一次馒头，每周当一次荤。奇事就发生在当荤上，当荤日，六人有一盆肉，午膳时饭堂内外有千多人就餐，六人一个组合，聚在一起蹲在地上进食。倪小鬼的一组，盆里的肉老是满满的吃不完。而邻近组的盆子里，尚未动筷就少了许多，闹着不够吃。待倪小鬼这组人吃罢走了，邻组人就拥来争食。

一天黎明，该是大宿舍的大铁栅开封的时候了，可是那把拳头大的锁还紧锁住大铁栅，看守没有来开锁，许多人倚在门口，不能出去上班，可能看守睡糊涂了还未起身。这时直属队的大组长看看时间已过，实在不能再等，于是唤了倪小鬼来。高大的组长，领着个矮小男孩，挤在人群里死命向大门靠拢，人们的好奇目光都集中在小鬼身上，大组长提高嗓门说：“各位让让，我们成千人都被锁在里面，看守不来开封，我们迟到了都得挨熊，所以叫倪小鬼来开，有事我负责。”大伙儿听说，就让了条道来。小鬼走近铁栅，嘴里嘀嘀咕咕，伸手将大锁一提，霍的一声开了。站在前面的人亲眼所见，丝毫不假，如此大的铁锁，没有钥匙，经他一口气，手一提就打开了。顿时一阵哄笑，个个觉得迷茫不解。后面的人看不到，急得大叫。这像梦幻般的事，一直存在人们的心中，对小鬼刮目相看。

一次当荤日，伙房买了许多黄鳝，满满两大缸放在伙房门前。打理黄鳝是件十分麻烦的活，炊事犯感到头痛。伙夫一双手只能提一条，滑溜溜很难摆弄，唯有一条条将它砸死，方可破肚肠。此时恰好倪小鬼走来看热闹，见伙夫们如此为难，遂伸手相助。

只见他一手抓上五、六条，另双手顺着鳝头一把向下捋去，从头至尾经他这一捋，就甩进大箩筐，大约只用了一支烟的时间，两只缸里的上千条黄鳝，全数打理完毕。伙房的组长呆住了，高兴得不知所措，只是呵呵地笑。他上前向箩筐里一看，这些鳝无不腹部敞开，里外光油油的，被打理得干干净净，却不见鳝肚里的肠杂。诧异之下，询问究竟，小鬼将手一指、指向一箭之遥的粪坑，众人走去一看，果真见粪坑上面浮着一层肠杂，血乎乎地散在上面，大家不禁伸了伸舌头叫奇不已。

这件奇迹乃伙房十多个炊事犯所亲见，认为看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那么神奇真切，却怎么也想不出所以然，不信人间竟有如此的怪人。滑溜溜的黄鳝一手怎抓得五六条？而且经他这一捋，这些黄鳝肚子就被剖开，尤其那肚里的杂物竟会无形地到了老远的粪坑里。凡此都为十多双眼睛所瞧着的事实，真是不可思议。1958年，伙房换了个新劳改犯肖林当组长，他原是省话剧团的团长，认为这件事是虚构，特地借送羁押号的囚饭，来看看其貌不扬的倪小鬼。开始还认为是迷信的空谈，后来有几次公安厅干部叫倪小鬼当面施法，肖林都乘机在室外偷窥，方明白小鬼的利害。其后小鬼浮肿时能吃到馒头，乃肖林暗中看顾。

1957年的夏末，早晚都有丝丝凉意了，大家对小鬼好奇的热度也与气候一样，逐渐冷却了。那天我饭毕洗净了饭具，左手拿着碗筷，右手捧着大号塘瓷盖杯正从饭堂的西门出来，正下台阶，见小鬼站在走道旁的大字报栏下。当我揭开杯盖时，清清楚楚见两粒糖在杯内，不免一愣，不知从何而来。正疑虑中，小鬼又说：“你吃呗！”我不明其真假，又嫌其不净，顺手就给了旁立者。此君立即剥了纸皮送入口中，说是小糖。我思忖这糖是什么时候投入杯中的呢？我走到小鬼跟前，他低声向我说：“给我一张明信片，我要写信回家。”我答应了，要他在此等我。我到宿舍取

了两张明信片及一条棉毛裤给了小鬼，小鬼呆呆地问我，这裤做什么呀。我告诉他天气凉了，你穿一条单裤会冻着的，应该加上这一条御寒。就这样，彼此有了一份情。我发觉小鬼虽会变奇术，但毕竟还是个半大的孩子，不解人间事故。

监狱有医务所，所里常用的一只玻璃消毒器不慎被打碎，一时找不到代替物，而又必须使用。医务人员建议所长叫倪小鬼来试试看能否复原，所长同意了，但要犯医出面。结果经小鬼一吹真的完好如初，这不仅免了一笔支出和解决了医疗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官方证实了倪小鬼的魔术并非荒谬而是妙不可言。因此公安厅对倪家宽开始调查研讨，下令将他禁锢，不让他与外界接触，以免影响社会，动摇共产党的学说理论。监方负责管教的言干事，以一只坏表作试测，要小鬼为他修复，果然倪小鬼以他超现实的魔术一吹定马，方干事无法解释其真伪，既喜又惊，视倪为怪物，加以封闭。

牢中之牢，这是中共的首创，在每一所大监狱，还另设有专以禁锢极端分子的小牢，取名叫“羁押号子”，这里是倪家宽的绝命之地。凡是有对抗意识和行动的劳改犯，都受到关进羁押号的惩罚。劳改犯在生产与生活中犯有错误时，一律都在禁锢之列。这号子位于大伙房的左边约五十公尺，背东朝西，正面对一排劳改宿舍，中间夹一块草地和一个大粪窖，后面是监狱的猪棚，应该说是被污物包围的小牢房。独立的三间瓦屋，每间约十二平方米，里面关着精神病者、胡言乱语的痴人、越狱犯、行凶者、言论反动者、对抗狱吏者等等，也有负有使命的狱奸，对监房进行“监控”。倪小鬼是特种性质的禁闭犯。

在这牢中之牢里，犯人不仅受肉体上的折磨，刑具、脏、臭、虫等对人体的损害很大，还要被一个叫张治华的精神病者成天叫骂。他拖着一副大镣，足有十斤，哗啦啦不停地走动，扰得人心

烦意乱。这人从不用水，脸手的污垢积得发黑，身上散出粪便的臭气。

另一个狂人是个中学生，自称姓胡，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给右派老师写血书伸冤，被判七年徒刑以致发狂，带着手铐关入小牢。他一进来见一堆人在玩象棋，突然举起一只瓦钵向人堆掷去，砸破了季姓犯人的头，跟着又与张治华打斗。一个带镣一个带铐，双方都受刑具限制，毕竟手比脚灵活，胡被张打得鼻青眼肿，胡的脸上被张的指甲抓出条条血印，看似狰狞的厉鬼。他拿了块毛巾在粪桶里洗脸，众人去阻止，他竟将粪便洒在大铺上，弄得铺上脸上、身上都淋上了粪水，臭气满屋，无人敢近他。他竟然还用饭盆去舀粪吃屎喝尿，闹得众人毛骨悚然，真的像置身于地狱。无奈，大家只得大声喊报告，看守和狱吏一起来遏阻，可是一见狂人这般嘴脸和室内臭气熏天，狱吏不敢张口说话，只是捂住口鼻向后退得老远，把组长叫出去怒斥了一顿。后又指着众人吼叫，责问：“是谁挑起打斗的，是哪个出的主意，你们都哑吧啦！”组长将实情说了一遍，依然未能平息狱吏的怒气。他叫了几个炊事犯将胡狂人强架着，冲洗了身上、地上、铺上的粪便，然后指着大家吼：“再有这种打斗，就将你们一个个都铐起来。”

这次骚乱，给大家的惊恐不亚于一次空袭。倪小鬼对此却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地正襟危坐，一动亦不动。有人私下议论了一下，领悟到这是由于他经受过最大一次的恐怖——“陪斩”。

数日之后胡狂人的双手因与张治华互殴，被捏紧了铐子，一铐圈深入肉内，手和臂的不断活动，皮肉与铐圈不断的摩擦，以致皮肉破裂腐烂发臭。这狂人的忍苦耐痛的精神确是惊人，同号人不忍其惨，即报告看守。狱吏为他开铐时，臭气冲得狱吏掩鼻后退，转叫囚犯组长代开。不料脓血结成块状堵塞了锁孔，钥匙插不进，又用竹片将塞孔捅开，始得以猛力拉开铐齿。取下手铐时，

胡的手腕已烂了一圈，深得见骨，惨不忍睹，见者为之落泪，可他本人始终未出一声。不料，狂人突然一头猛撞墙上，昏倒在地上，半晌醒来，竟大喊毛泽东要吃我脑子啊！放映我与妈妈交媾的电影啊等狂语，令人不敢闻问。

每日，疯囚张治华的叫骂划破晨空，他粗豪的嗓门对着牢门上端不到一尺的小窗口向外叫喊令人难懂的话——“数的什么，抢了走呗，不给吃，不给地。”翻来覆去地叫，末了加上一句“你他妈的不算孬种！……”他的骂声和大镣在地上拖来拖去的哗啦声，越发让这小牢显得阴沉可怕，加上一股冲鼻的恶臭，令人有难以忍受的痛苦，情绪烦乱得不知是酸是苦，弄不清自己是否在人间。

恶劣情境，刺激了倪小鬼脆弱的心，他受不了这种无休止的骚扰，对着张治华说了句“你喊什么！”不料，张治华对小鬼劈面一拳，顿见小鬼的右眼凸出，渗出鲜红的血，眼膛隆起红青色的包，吓得众人连声喊报告，看守将小鬼送医。约半小时，倪小鬼包扎了右眼，回到号子，一进屋就靠在铺头的墙上发愣，面色惨白，这是他癫痫发作的症状，嘴里哼了几声，仅几十秒时间症状消退，面色正常。他伸手将包扎的纱布拉下，大家一看，右眼竟是好好的，毫无受伤的痕迹。这神奇的自我治疗，乃十多人所目睹，前后不到一小时。即使神医华陀再世，亦未必有此立见的效果，见者叹为观止，难测其中奥妙。

正是人间地狱难挨时日之际，又进来一个新客，奇怪这来者竟是笑容满面。他第一句话偏偏对着倪家宽说：“你记得吗？那天在饭堂里给我吹好了破瓷碗。”说着就放下了行李。又问小鬼睡在那里，愿与打通铺。小鬼未作可否，转问组长。新客向组长称姓席，是布厂的保全工，犯了点错误。干事叫他进来检查交代。他被子厚，组长就让他与小鬼合被。两天之后始知，这个江苏无锡人特意在工作时制造个过失进号子，专程拜师来的，可见其对

小鬼的仰慕心切，也不嫌小鬼邋遢。从此，此君即是小鬼的徒弟兼护卫了。无奈，小鬼的法，乃是上天所赋，并非人人能学。席犯原属过失禁闭，吃了一个月的小苦，遗下了一条旧棉被给小鬼，出了羁押号，一无所得。

从一进小牢起，每人限定每月十八斤囚粮，谓之“六大两”。两木瓢稀粥，每日两餐，每餐一瓢，日日如此，另加半铁勺咸菜。从1958年元月开始，羁押号的囚粮减为每日三两，每餐给一两五钱米。可以想象，一两五钱米煮成粥顶多只有三号搪瓷杯的一平杯稀粥。在这成天吃猪食，干牛活的劳改犯面前，这点吃不饱饿不死的量，就成了死与活的问题了。不仅如此，监狱竟将这一两五钱米，加上大量的水熬成米汤，索性不给小菜，只是用碱催化了米，加上盐煮成分量似乎很大的每人五千克的米汤。一日两次向肚里灌，肚子越灌越大，也越灌越饿，身体越灌越瘦，瘦成皮包骨，最后到了无力支撑自己身体的程度。我们七八天始有一次大便，可又便不出，只得用手指在肛门里抠，拼命用力挣，挣得一身汗，却只挣出几声空屁，抠出三、五粒白果大的黑屎，硬得像石子。

有个叫朱旭的难友，就在这时被突然提审，当他坐起来站在大铺下想走出门的时候，已是摇摇晃晃，一出门就摔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还是那个看守兵扶着他走，回来时也是被扶着，一进门就躺在地上，全号子都饿得无力说话，只是用眼望着他。米汤送来了，他兴奋起来，勉力支撑着身子去领受炊事犯送来的五千克米汤。两个炊事犯抬来一桶米汤，看守兵开了锁，推开门，将木桶放进室内，跟着用木棒在桶内绞拌，边绞边舀，因为米沉底。大家非常重视米的效能，所谓粒米度三间，经过不停的绞动，米遂上浮，每人都能舀到相等的米，朱旭喝了五千克米汤，始有力登上大铺。

这种特别刑罚，进行了两个月零三天。一天早晨，我突然一阵头晕，两眼发黑，心里慌乱得不能自持，就此休克。待醒来，始知医务犯正为自己注射针剂，又给了一些药，其实是维他命 B、C 及鱼肝油丸。就在休克的前三天，我闻到米汤味就恶心，好似米汤里下了硫磺那样，一口米汤都咽不下，喉咙像有一块石子堵塞似的，但是开水照饮，就是不能喝这种米汤，因此有四天未进食，身体已经虚弱不堪了。

囚犯成了试验品，他们用这离奇的供食，以测试饮用碱盐米合成的米汤后的生理变化。遭受这饥刑的人，虽然没有流血，断筋拆骨，皮开肉绽那样可怕，可是那无形的饥饿之苦，尤甚于刀割火烙。难忍在于刺心挖肝般痛在内里，以致疲于呼吸，直到昏迷休克。这无形的饥饿之刀，长时期一片片、一丝丝割着整个身体，普通人的血肉之驱是无法忍受的。张治华说：“这里头下了什么闹洋花呀，闹得吞不下！”倪小鬼、朱旭、李少武以及老杨、老季，甚而食量最大的陈惠生后来都不再去接米汤，只是向伙房要开水，往胃里猛灌开水，得到一种满胀的感觉。那时唯一的安慰是听屋后猪舍的猪叫，这叫声告诉我们，伙房即将喂猪了！我们体内的细胞活跃了，因为猪食里掺有黄菜叶和菜根，随风飘来的菜香，大有提神充饥之效。

室中十来个人有大半数已奄奄一息，小部份人因关押不久，尚能喝汤活动。监方得到医务犯和炊事犯的反应后，恢复了净米白粥，日给六两，每餐三两米，再加半铁勺咸菜。改变供食的第一天（1958 年的 3 月间）我们吃到一木瓢净米白粥，再尝咸菜，感觉如啖山珍，其味之鲜，胜过冬笋。倪小鬼不舍得一次吃完，就用一只装鱼肝油丸的小瓶装起来慢慢品味。一时间这死寂的小牢恢复了生气，死神悄悄离去，笑语欢声同时出现，白粥咸菜使我们重新活过来。

这段饥饿的时间，约有一年四个月，其后是每月十八斤囚粮，麦皮二斤算一斤，掺杂各半，全年是稀饭。小牢禁闭，没有期限，什么时候狱方认为你交代清楚，方可调出小牢，参予工厂劳动。倪家宽和几个重刑犯一样，短时能有调出的机会，参加劳作就能吃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只能在小牢里挨饿。

在这十来平方的囚室里，十多人挤在一起，一边是大铺，一边是走道，走道的临窗一端放一只大粪桶，走道中间放两只水桶。十多人中，有几个神经失常的狂人、有癫痫症者、还有一二个是受命的监控，专收集各囚的思想动态，生活言论。倪小鬼在室中常常施法，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给人以超越生物界限的神奇。比如，囚室里的大粪桶，并非天天倾倒，看守有时一周始来放风，小牢里的人，成日吃粥、喝稀、排尿特别多，粪桶满了，小鬼用一只塘瓷杯将尿便舀起，一杯杯由窗户的铁栅缝向外倒，每次众人省一杯稀饭给倪小鬼作为酬劳。不料有次小鬼不慎，倒尿时将杯滑落到窗外，已是晚黑了，看守早已休息，而粪水将流出桶外，逼得小鬼只得施法。他站在窗下口中喃喃，只见这失落在窗外的瓷杯像有人送还似地现在窗口，小鬼伸手接住，众人在这一刹那间不由得哗了一声，真叫怪啊！而倪小鬼若无其事地拿起瓷杯，继续做起舀尿动作，一下又一下数着向窗外倾倒，数到五十停止。人们看在眼里，却闷在心里，因为狱吏宣布过，不准小鬼搞名堂，谁叫搞就加谁两年刑。有了这个禁令，谁也不敢吭声，只当没瞧见。

有天刚开饭，小鬼将没吃完的咸菜向小玻璃瓶里装，手一滑小瓶失落在水泥地上碎成几瓣，旁者说糟了，这下没得用事小，但要注意不要扎到别人的脚。小鬼不吭声，弯身将碎片细心地拾了起来，然后双手捧起碎片合掌摇了几下，嘴里嘀嘀咕咕对着合掌一吹，摊开手掌，大家伸头一看，竟是只原来的好瓶。这只小瓶

原来是我给他的，我还有一只，在他跌碎之际本想再给他一只，未料他一吹复原，此时我还以为他拿去了我这只，我回头看这只仍在枕边，始知小鬼确有补破还原之术。

58年的春季，关进一个逃犯，姓张，头上有癞痢，双手背铐，夜里睡觉困难，只能靠墙上坐着等天亮。号子里的组长原是与小鬼一批调来的，知道他的底细，以往在洪泽湖，小鬼带镣时，每晚都将大镣除下当枕头。因见张秃子可怜兮兮地硬坐了一夜，组长就叫小鬼晚间将张秃的背铐给取下，有事他负责。组长的话，小鬼岂有不听，不仅取下背铐子还与张秃打通腿，自此白天带上夜晚取下，蒙头大睡，小鬼这一吹之术，惊得人直摇头。

隔了几天，张秃子牙齿发炎，半边脸肿得红红鼓起一块，痛得哼声不绝，日夜不宁，连稀粥都不能吃。大伙儿不忍其痛苦，代向小鬼央求，好事做到底，决不让看守知道，给张秃治一下吧！小鬼被众人说动了，亦得组长首肯，他就取了一支竹筷，端着半杯清水，在朱旭的红毛衣上摘下一根红毛线，回头看着张秃子张开的嘴，用竹筷将线塞在患处，又命张秃子咬紧红线，他则念念有词，呷口清水向张秃脸上一喷，就此完毕。顿见张秃肿消痛止，与常人一样，乐得大家的手舞足蹈，压低嗓门欢呼起来。

1958年的春节，年三十下午听到伙房宰了二头猪。号子里清晨起身就开始议论年初一加餐的事。按照惯例，春节必定有干饭有肉有熟菜，也许还有荤汤，什么猪血，下水豆腐汤，尝一下别来经年的肉菜香。谁知一直等到十点，外面的开饭钟早已打过好一阵，伙房的红烧肉飘香多时，尚不见伙房送饭来。正是此时，看守前来开封。站在窗下翘首仰望，使劲闻香的李少武急忙和组长抬出粪桶，倪小鬼则乘机拾了水桶往伙房跑去，跟着的是朱旭。一会儿两人抬了桶清水回号子，组长和李少武亦洗净了粪桶抬回来。此时始见炊事犯抬着木桶稀粥蹒跚而来，甫入室，悄悄示语，

谓事务长不准你们吃干饭，我们偷偷给加了一碗米，今日的粥稠多了。于是各人皆叹了口气，盼来的竟是一木舀粥。待看守收了封，众人低头喝粥，倪小鬼突然从敞着胸的破棉袄贴胸夹下取出一大把蒜，分用给大家，并说道，过新年吃大蒜，大伙儿香香嘴巴。他就是没有给陈惠生、张治华，因为张治华打他，陈惠生骂他是个职业乞丐，是个猪头疯，发作时乱来一气。他经常骂道：“人民政府一颗子弹毙了你这小鬼头”，而他被判刑三年，就是因为骂了毛泽东。倪小鬼优待我，给了四根大蒜，因为我曾给了他一只小玻璃瓶，而且我们相处的时间较长。

这一年的春节是我有生以来最凄凉的一次，自从中共反右运动开始被关进小牢已历大半年。年前老母因久久未见我的信，试探性地为我寄来一只邮包，一条旧棉絮和两瓶鱼肝油丸。就是这样，为了自我安慰，在这年初一的第一餐，就以四粒小丸和一根大蒜调在白粥里，算是加餐厚待自己。也以同样的数量，给了难友高振鸿，同享这顿终身难忘的年夜饭。高振鸿与我同时为小鬼写过交代，结下了情谊。我清楚地记得高用六指的手，很郑重地接受了我微薄的心意，含泪的眼睛注视着我的情份。我转过来，又拿四粒鱼肝油丸给倪小鬼，可他拒受，并说他有得吃。他这一说，倒使我觉察到他最近常在门上的小窗口张望，有时像在吃什么，不过他默守戒律，监方不许他搞名堂，所以从不泄漏私密。有次他给了一点张秃子，说是牛肉干，可别人绝不敢贪这便宜。

有一个叫郑德才的合肥本地人，当时号子里都叫他“马达”，因为他每天总有几次同样的演说，像马达似地开一阵就停止，内容无不相同：“弄妈的，日本鬼子一颗炸弹，血肉横飞，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种深仇大恨你不去报，成天将我闷在这鬼地方。弄妈，我郑德才没有挖你祖坟，将你儿子煮吃。我同你有什么矛盾，一天到晚算计我，我郑德才孤身一个，有什么大不了！”

这天马达开过了头，走了火，竟然骂得脸红脖子粗，索性走到牢门下对着小窗口向外大声喊话，像机枪似地嘟嘟不停，喊得口水四溅，嘴角上起白沫。惹来了看守，对他喝阻，可马达照开，惊动了狱吏魏管理员，走来厉声遏止。骂声照旧，甚而点名道姓大骂毛泽东、共产党。这就触发了狱吏的无名火，歪着头，硬着脖子，手叉着腰，指示看守将郑德才拖出来绑上，并帮着看守对郑德才拳脚交加，打翻在地。一个饿得皮包骨的囚犯，怎经得像猪、恶得似狼的狱吏狱卒的肆虐。他们将郑德才五花大绑不算，还在地上倒拖。可怜瘦骨嶙嶙的躯体，在尽是砂石的地上仰面朝天，被拖来拖去的转圈圈，背上的皮肉被尖硬如刀的石砂刺破了，弄得血肉模糊。“马达”歇声了，于是被推入号子。那时正值春节，挨了半年饥饿，“马达”经不住如此折腾，人到了号子不过刻把钟，马达满脸黄豆大的汗珠向下滚，他跪行到难友面前，头和脸依偎着李少武组长和我的手上，脸色苍白，声音嘶哑，求人为他解绑，不一会就倒下来了。号子组长见此，只得大声报告，狱吏走来，见马达已是气息奄奄，始开恩叫松绑。快手的李少武将马达身上捆绑的绳一松开，马达一声嚎叫，随着全抽搐，半晌方睁开了眼，对人说要喝水。事后马达说，在松绑的一刹那，周身如遭钢针猛刺，痛澈心脾。经受如此酷刑，马达死而复生，整整数月没有出声，只是躺着。满背斑斑血迹的伤处，后来竟是不治自愈。除非铁石心肠，目睹这场无人性的施暴，没有人不心痛如绞。我发觉倪小鬼见狱吏施暴，竟惶恐得避在角落掩面而泣。看来，曾经受过陪斩，他当时的惊骇，至今仍未消退。

数日后魏管理员，出现在小牢外，满口恶棍腔调，歪着头，硬着脖子，叉着腰向号子里发话：“郑德才老实了吗？告诉你再不老实叫你去喂野狗。倪小鬼！你的骨头总不比他硬吧！好好履行，争取回家当社员。”接着，他又对大家施威一番：“你们这些个，

有的反动得很哩！还在想蒋介石回来，别做梦啦！告诉你们，现在全国农村都公社化了！人民公社成立，吃饭不要钱啦！你们听说过吗？那个国家能做到吃饭不要钱？农村开大伙，敞开供应。”说完，将手里的一张红头标题的报纸掷进小牢，又说：“你们好好看看，我们安徽的粮食高产，又放特大卫星（各地竞相报导高产消息，谓之放卫星。），这是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一亩田竟然收到二十三万斤稻，人民敲锣打鼓在庆祝，你们无动于衷，成日吃饱就睡，好好学习，洗洗你们的反动脑袋。”

狱吏走后，内心感到非常沉重，听他的这番说教，犹如在巷子口遇上一只癞皮狗向我狂吠那样，令人厌恶。我无意地瞥了一眼那张《安徽日报》印着通面红字的号外，只觉得可笑，那种弥天大谎的消息，连小学生也不会相信。

在这阴暗残酷的小牢里，人们并非软体，亦未被压服，倪家宽即是提供生机，催人奋发的唯一妙人。不要单从烂陋疯颠的乞丐形外表去衡量他，在他身上，确有一股子洋溢着奇妙生命的真理和奥秘，给人以不可言喻的精神力量，潜伏在心灵深处静待转机。有一个夜晚，他闲着无聊，将一些旧棉絮，在手里搓揉玩弄，捏成长圆形，然后低头对它一吹，竟霍地变成一只白兔在囚室里乱窜，惹得众人追逐，正兴致中，兔子纵身跳出窗外跑了，这是苦中有乐的一面，是倪小鬼给予的活力。

一次组长洗净了好几块布碎片，晒在窗口的铁栅上，准备补衣裳，不料一阵大风将所有布片统统吹落在室外地上，分散得很远，无法捡回，遂央求小鬼帮忙，小鬼对组长不敢执拗，即站到窗下，手里拿顶破草帽作遮掩，望着外面，嘴里嘀咕一气，见他从破草帽里一块块取回，递给组长。

新来一个吴姓的蚌埠人，因出监时被搜出私带公物，被扣押，将重新判刑，来到两天后胃病发作，痛得在铺上打滚。他知道小

鬼的怪，向小鬼求救：“我看到对面的宿舍窗台上放着一大瓶药，我认得是治胃病的，求你施个法搞来给我吃吧。我知道这批人是上月从淮总二支队解来的，我不会白吃他的，出去了我一定还给他。”这番央求，博得了小鬼的同情，而组长也点了头，小鬼走到窗下，果然见到对面窗台上有瓶药，即取了块毛巾做遮手，嘀咕一阵，乘势一接，从毛巾里取出一撮药片给了病人。这人接来看，说就是这个药，立刻用水送服。无奈，并不见效，延至天黑，依旧绞痛难忍，续向小鬼哀求，行个善给我治下吧！连连跪求，那时正值火夏，病者更加难受。众人帮着说情，光着上身向小鬼打躬。小鬼见天已晚，看守不会来巡视了，就着病人仰卧在铺上，众人围成一圈，屏气注视。倪小鬼向组长讨了支大针，只见他赤着膊，汗水淋淋的手臂捏住那支粗针向病人前胸徐徐刺入，并以拇指按下针尾，使全针进入胸内，恰似医生动手术那样，使观者为之咋舌，担心这针进入后拔不出怎么办，胆小的竟扭转头不敢再看。这时大家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景象，只见小鬼的手顺着插针处徐徐向下推动，直到小腹，这针尾随着小鬼的手慢慢被拔出，清清楚楚，人们看得出神。前后十分钟，病人痛苦全消，起来急忙向小鬼叩了个响头，千恩万谢。次日早晨，大伙儿特地站在窗下望着前屋的一排窗户，确见正对面的窗台上有瓶药，好端端仍在那里。

这姓吴的告诉我们：“我未进号之前，就住在这对面窗户的西边一间，因为监内正在整顿监规，淮总这批人都是加刑重判的，其中三分之一带大镣，厂里腾出五间房给这批人，我就搬到西边房，要不是整顿，我犯的这点错不致被扣押。布厂好多人都被解到公安厅，前几天贴出被处决的布告。车间墙上有好多大字报，写着与倪家宽搞迷信活动的名单，第一名就是那个外国大学毕业的董毅，现在与淮总人闷在一起，已扎上大镣。”

经吴难友这一说，始知道全国又在搞运动，也明白了倪小鬼之所以不能出号的原因，“从宽”的一面过去了，眼下正在“从严”，不知这劫难何时了！

奇怪的事不仅要亲眼见，还必须亲手去做方算真。有一日看守拿来厚厚一叠布厂作废的商标纸，给我们当厕纸。我拣了一张图案清晰完好无缺的纸，并在反面签了名，也让几位难友朱旭、李少武，高振鸿、杨某、季某等签了名，然后我亲手将它撕成碎片，交给小鬼，请他使之复原。倪小鬼犹豫不答，众人又向组长央告，组长以目示意，始点头允诺。他接过碎片，双手合拢捧着摇了几摇，又嘀咕一阵，再就对捧着的碎纸一吹，摊开手来，竟是一张完整的商标纸。大家争相察看，反面几个人的签名丝毫不差，这令人惊奇不已，可称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绝妙表演，但因其真切得出奇，使人仿佛置身于梦中。

怪事在眼前出现得多了，也就平淡，认为微不足道。当时小鬼与众人一样，长期挨饿，身体缺乏营养浮肿，起先是足腿，然后肿到了阴囊，若皮球大小。见他用一只二号瓷杯盛了清水，背着身子将自己的睾丸掏出来，放在杯子里清洗，洗毕仍将睾丸放入阴囊。这个手术没有用刀，既未见血，也未见缝合，恰如原先一样，而怪在肿状全消，他却若无其事，而旁者看得伸舌头，这究竟是什么人啊！在倪小鬼生前的最后阶段，不断有公安厅的干部来对他进行测试，将他带到隔屋房里，每次总有一二小时。在小牢里的众人虽见不到搞了什么新的绝招，但次次都听到隔墙上的哄笑声。可以想象，这无非是小鬼的法术所引起。这些小干部并非探求奥秘，寻找科学依据，而是一睹为快，瞧瞧不花钱的戏法。

除却亲见小鬼所行的种种，尚有耳闻二则一并引述。直属队的殷队长，有个双膝有疾不能走动、左眼视觉不明的儿子，得知属下新来了个怪人，就召他为其子医治。倪小鬼应召后回到宿舍，

同室人纷向探询。小鬼笑而不答，出示一包红糖，说这是殷队长给的，众人会意。赠送红糖原为农村习俗，凡有求于人，事成后赠红糖一包，作为谢礼。但是劳改队的队长大人，决不会随便送给犯人礼物，这就是说倪小鬼为殷队长做了一桩大好事。在中共监狱制度下，有着严厉的阶级界限，不允许干部令犯人做党纪所禁止的事，殷队长命倪小鬼治病的事，如不隐蔽，将招祸殃，所以属下不可声张。一些外出劳动回来的劳改犯说，殷队长的病儿如今常在家前屋后与儿童作戏，奔跑如常。

难友汤应煌，可称三朝老人，曾任汪伪政府的杭州市长，1956年在新生厂直属队与倪家宽同一宿舍，他与我偶然话及此子之怪。他说当时同室中有上海籍老囚吴某，悄悄央求倪小鬼将其上海家中的一副眼镜施法弄来，必当感恩。小鬼重情，即询明老吴家的地址及眼镜存放的确切位置。约两周后小鬼递了一副眼镜给老吴，问是否这个。老囚接过一看，不禁叫绝，说道：“一点都不错，正是这个，你真是人间活佛。”

1958年的深秋，倪家宽终于抵不住长期饥饿而病倒，因缺乏营养全身浮肿，他像个吹气的橡皮人，头脸肿得像弥陀佛，眼睛肿成一条横线。监狱这时才给他改善营养伙食，一日三餐都给吃馒头，每顿三个白馒。这小鬼每道餐只能吃一二个，余下的分给同室共享。那时先进来的已陆续调出劳动，只剩下小鬼和其他三人，小牢显得冷冷清清，空旷了许多。狱吏唯恐同室分去小鬼的营养食物，遂将他调在隔屋的空房，独自禁锢。浮肿禁盐，小牢的人，个个都肿，不过小鬼尤甚，因他不听医嘱，偷吃了碱食。他说，肿过了胸，他无法使自己消肿。他临终的那天半夜，我睡梦中被倪家宽在邻屋的喊声惊醒，听到他大声而凄厉地叫喊：“大伙房送开水啊！我渴得很，要喝水呀！”一声接一声，喊了很长时间。监狱里除了伙房，都被锁闭，没人应承他的要求，渐渐就没了声

息。翌日开封时，只见那女医务犯，从小鬼的空屋里拾出一条短裤，一根他特有的粗纱腰带及一只女童鞋。他生前经常摆弄这只童鞋，还对人说那是他小侄女穿的，现在她长大了。这些遗物被丢在小牢前面的药园子畦边，令人见了心酸。最后是医务所抬了一口棺材埋葬了他，也许这棺材是倪小鬼复原了那具医用玻璃器皿的报酬吧，因为犯人死了从没有用棺材的规矩。

倪家宽给人留下什么呢？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些令人难忘的迷离怪事，和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妈妈说午收后来接我回家”。他死时年仅十九。如果他生在自由世界，他将被喻为神童，受世人所爱戴，也许他会成为百万富翁，享受着神的恩待，本着神的旨意传播福音。可他偏偏出生在共产社会，成了“无神论”的对立面。他的神奇本领并没有将他从牢狱和饥饿的双重枷锁中解脱出来，死神过早地将他带离了人间。

这个怪异的生命暂短得令人痛惜，他从未有过自己的希望和追求，更不明白何为荣耀，何谓欢乐，就那样凄惨地悄悄离去。整个生命历程，似猫爪下的老鼠，被政权玩弄一番后囫圇吞没。这可爱的怪异生命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唯有见过他的千百个囚犯，在记忆中深印着合肥监狱里有过这样一个难以言喻的怪人。

当载着倪家宽尸体的白皮棺材抬离牢中之牢时，可惜那位爱护他的工程师高振鸿已先期出了小牢，未能与我对着他的灵柩同声一哭。现在劫后余生的我，为自己苦难的生命和曾给我生命带来过些许愉悦和惊喜的倪小鬼，以及他的扑溯迷离的悲惨故事记下一笔，作为永远的悼念。

镇反后的一次恶浪

监内在 56 年宽了一阵子，平静后的宽松景象只是昙花一现。57 年随着全国的所谓大鸣大放，又一次掀起肃反的恶浪。这一股险恶的势头，一直冲击到监狱。

1957 年的 2 月，妻子突然从上海来到合肥监狱。生产科王科长出乎意外地找我谈话，问了我的经历，又谈到家庭，随后告诉我去接见室。那个魏管理员带我到了大门外的一间小屋里，见妻子坐在里面的长凳上。她见到我就迎了上来，笑容满面，而我却激动得含着眼泪说不出来话来。她穿着一件海绒大衣，咖啡色的西裤，一双高统的黄皮鞋，完全是大城市高层妇女打扮，显得像个阔太太。无怪王科长对我说：“你家属见到你这副样子，会不会起变化，对你嫌弃？”我答：“我现在是罪犯，当然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十年时间很长，即使是一块石头放在大路上，石头自己不动，也难免会被人相中取作它用。相形见绌，这四个字，正是我当时的内心感触，加上狱吏在一旁监视，使我越发自卑了。我在她跟前的长凳坐下，问父母亲都好吗？为什么不带女儿来？她答妞妞哭着要来，因为车上很很挤，孩子受不了！说着就弯下身子，伸手摸着我的脚，问我冷吗？也许是我那时激动得打颤，她以为我受冻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彼此默默道别。第二天，狱方又安排妻子来监内参观，她看了监狱各厂的车间、伙房、宿舍、饭堂，最后来到我的车间，站在我劳动的裁剪房材料间门口，我因为彻夜未眠，无精打采地坐在椅上，面对帐本发愣。她已走近桌前，领她来的是车间的王干事，他原本在我对面桌办公，因此他让妻子坐在他的椅子上并说，你们谈谈吧！

罪犯的一切都受严格的监规所控制，外界来了特殊的访客，谁也不敢停下手里的活而左顾右盼。全厂没有犯人知道她是犯人的

妻子，加上有干部陪同，还以为是高层的女宾来参观监狱。这天的下午，王科长又找我谈话，向我说，管教上本可让你与妻子同宿，因为你前次私发了信件受到警告处分，所以厂方只招待她膳食，并给三天的接见时间。

从狱方的接待措施上，我已觉察到管教科已向妻子询问了我的一切经历，加上妻子的外表综合起来，认为我不是一般的反革命。中共通常会扩大案情，设置陷阱诱人入瓮。妻子一向善于谈吐，不加约束的快口，滔滔不绝漫无边际地表现自己，这就使我在后来整顿监规的运动中成了靶子。第三天的上午，妻子来辞行告别，那时我精神上受到波动，已两个整夜没有入眠。对各方面都怀着绝望和悲观，对父母妻儿的顾虑更多，无法掩饰颓丧的神情。当我跨出车间送别妻子时，几个女犯都在窗内望着我与妻子的离别，挂着同情的眼泪。随着衣着讲究，外表大方，手里提着一只精制的皮箱的妻走到大门口，门岗见我含着泪无言举手示别，就问我：“她是你老婆吗？她很不简单。”当时我并未意会到，我们这一别竟是终身分离。

四个月后，全厂因夏季炎热都停止生产，男女犯人都投入围墙外的挑土方劳动。我身体瘦弱，起先叫我随市区门市部的劳改犯做画样工作，然后又命我单独一人在大车间画样、油印，集装成册，作为服装样本，所以没有投入体力劳动。

正在这时，我发觉有潮热，医务所卫所长怀着女性常有的慈心，带领我到安徽医学院看门诊。病人在那排长龙，女所长向院方交涉，让我不排队优先就诊。医生是上海籍人，五十开外，有一股令人敬尊的风度，知我是劳改犯，并不歧视。他略略问了我的病例，每天下午有潮热，是肺病的初期。医生向所长说，要我休息。回到监内所长已转报厂长，叫我每天上午劳动半天，下午休息。所长给我一瓶“异药井”，规定服完一个疗程(三个月)，并将我

调在隔离室，与几个肺结核病犯一起。正是这时，全监的“整顿”开始，每晚规定学习两小时肃反文件，结合自己检查言行，每人作出正面交代，由小组汇集送管教科审核，学习中都有干部在旁监督。

其实在调我住进隔离室时，监方已派了监探同室，暗中监视，随时告密，可我竟蒙在鼓里。同室的病号有孙士勤，他患肺病，右肺被切除三分之一，取掉三根肋骨。他是上海吴淞镇人，父亲开服装店，人们都叫他“小开”，因他曾参加蒋经国组织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大队，被定为反革命犯，判刑七年。对面宿舍有个老囚人叫周仲良，年近古稀，罪名汉奸，被判十五年，常州人。还有一个直属队的病犯，叫张健中，被判五年，即将刑满。有一天他大吐血，竟吐了半痰盂，面色苍白，卧在铺上呻吟。我见此，出于怜悯，即取了两只鸡蛋，和乳粉冲了一大盅叫他饮用，第二天又冲了要他饮，这样，接连四五次，他起床走来谢我，以后就成了朋友。因为都是病号，无须上班，几个相聚在一起以聊天为消遣，久了就放松了戒心，互不设防。

宿舍有四张叠床，规定十六人一室，而隔离室只有四五人，其中孙士勤、王介生和我是一起从上海调来的。王是苏北人，原是新四军的排长，北上时他留下了，到上海学缝纫当工人。镇反时他主动交代，被定为叛徒，判刑五年，有肺病，肺部已穿孔。另外两个，一是皖北人，一是镇江人，在上海做工，生银屑病。隔邻有个叫刘永健的在被服车间，南京人，原是南京市政府的委任官，这些人都是隔离室的常客。

周仲良，本名汤应煌，曾留学日本，汪伪政府时的杭州市市长，也曾任司法行政部长，去日本考察时曾受御宴，抗战胜利后被定汉奸罪。在上海某铅笔厂任会计，也通晓英、法文，公安厅经常调他去翻译英文书籍，不参加任何劳动。他脑子里古董不少，谈

风颇健，每逢休息日总要来茶话小聚。中秋我特意多买了几只月饼，晚间窗下赏月，藉以消愁。

不料这类小聚，均被监探告密，运动期间被揭发指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小集团，以我为首进行监内反革命活动，成了肃整的重点。恰巧张健中刑满出狱回上海，主动来问我有无信要带出。我因前次托留厂就业的刘大名私发信件受到处分，不敢再以文字传讯，于是我送他一件短大衣，和一条羊毛围巾为凭证，要他去我家叫妻子代我上诉，谁知这些都成了我的罪证。在美苏冷战期间，我曾在闲话时指赫鲁晓夫是战争贩子（指苏联向古巴运导弹）；在一次看墨西哥影片《生的权利》时，我无意中感叹说“我们几时才有生的权利”，就这都成了我的严重罪行。

我先是停止劳动，反省检查，然后召开全监斗争大会。那次挨斗的共四人，两男两女，男的是杨某和我，女的是黄蕊芬和戴苏斐。他们先斗黄蕊芬，饭堂坐得满满的，可发言的只有文娱组的几个人。说她施展勾引故伎，以色相腐蚀干部，有力不出，投机取巧，结论是要她深刻检查，认罪悔改。然后是斗戴苏斐，一些女犯对她揭发非常尖刻，说她思想反动，不服从管教，充当地下律师，鼓动别人上诉，说有理就应该上诉说清楚自己的冤屈，花八分邮票出出气有什么不好。她与政府对着干，不怕斗，曾说过：“哼！斗争大会我才不在乎哩！当它听一档书，开开胃，反正在牢里，时间不属于我。”这些揭发，是一个上海籍的女犯所为，她是与戴最相好的人。于是引起一阵激烈的呼喊声，要求从严处分，加大火力，斗垮这坏家伙。末了，当场把她扎上大镣做体力劳动，任清洁工。

斗到我时，群情激奋起来，个个举手喊报告，争着发言，并大声喊叫，要我站到前面低下头来。一个叫崔捷三的犯人，苏北人，抢先发言：“季 XX 是我们车间最反动的家伙，表面上不声不响，

可是背地里组织集团，反对政府。从他来到车间起，就没有说过共产党好。根据他的反动本质，国民党的骨干分子，早就应该杀，政府对他如此宽大，他不知感恩悔改，反而在监内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提议将他枪毙。”随着就是“枪毙他”的吼叫声，跟着就将我反铐起来，送入牢中之牢。到羁押号子就开了铐，叫我彻底检查。隔了两天，车间的竺干事提审，要我将小集团的名单交出来，深挖反动根源，然后将我带到车间，再次批斗。这是1957年的10月21日，煞似社会上的批斗恶霸地主的情景，我站在中央低头弯腰。我扫视了一下，凡是与我交往过的及同宿舍或隔邻的犯人都在场，这些人为保护自己，发言无不上纲上线，如无理上诉、鼓动别人上诉、为王介生写病假条时竟故意扩大病情、叫人装病偷懒、在监内拉拢感情、赠送物品、图谋不轨、辱骂苏联领袖、组织反政府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谣言、指共产党独裁专制，季某实际是暗藏的特务分子，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等等。最后，管教科长的结论是：该犯在改造中的表现，在劳动上是好的，但在思想与言论上则反动透顶。这说明他是个极其狡猾的反改造分子，大家要擦亮眼睛，识破他的阴谋，进一步揭发他的反动言行，不再毒害众人。现在将他继续关押反省，老老实实彻底交代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从此我在牢中之牢蹲了一年零四个月，那时正逢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监狱实施从严的一面。全国对在押犯厉行节约，劳改单位犯人伙食改为一日三餐稀饭，囚粮减至每月每人二十一斤，并掺拌麦皮豆饼，伙食费每人每月五元。而羁押号则更低，每人每日给三至六两。58年初突然从治淮工程调来所谓的反改分子八十多人，三分之一带大镣，关在宿舍内，与羁押号一样受尽折磨。

1959年2月，我调出牢中牢，派在印刷厂劳动，这所厂男女劳改犯约百余人，分两班劳动。我轮夜班，在老旧的四开印刷机上

看油墨，从下午六点到次晨六点，十二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印刷机的翻印，巡视板面是否清晰。虽不出力，但十二小时坐在高高的木凳上，到了下半夜，只觉得腰酸背痛，眼皮困倦得难以忍受，头脑昏沉煞似受刑。这两台四开机，每周出一份《新生报》，报导安徽省的劳改消息，主要刊登共产党的劳改政策，督促犯人服从管教，努力改造，积极生产。

大凡全国的各省或特别市都有《新生报》发行，这是公安部的统一规定。当然这个印刷厂并非只印新生报，它还有十多部脚踏圆盘印刷机和一台电动切纸机，承接各学校商店的校刊和帐册的印制，业务繁忙，收益颇巨，可它的支出仅是无偿劳力者的伙食费而已。受饥刑一年多的我，对十二小时的劳作，感到极度疲乏，但能填饱肚子，比在牢中之牢整日捱饿要好得多。暴政尽管极其所能压制犯人的敌对情绪，但永远也改变不了他们原有的思想意识。严格的监规和学习制度，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控制了犯人的时空而已。要改变犯人的思想，除非置之于死地。

1959年5月的一个早晨，我正在饭堂的戏台上教女犯使用缝纫机，突然一个司法警走来喊我的名字，我应声“有”，法警就带我到大门口。接着就看见以前与我同室的孙士勤、王介生、刘永健、周仲良等都先后站在我面前，厂里的管教干事命我们登上一轻卡车，由两名法警押解驶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甫入法庭始知这是对我们五人的公审，我环顾四周，除了法庭上坐着四人外，庭下并无一人，显然这是借公审之名的密审，只是多了两个一男一女的陪审员。从开庭到退庭，这一男一女未发一言，可见他们不过是刑法程序上的装饰。

至于审问的内容，完全和57年厂内和车间两次对我斗争所揭发的一样，如今都列成罪行。其中最严重的是指赫鲁晓夫是战争贩子，和中共是独裁专制的政体。这两点被法官重复问了数次，

而审判的总结指我为反动小集团的主脑，周仲良为重要成员，在监内相互勾结，制造谣言进行反革命活动，毒害众犯。唯王介生能及时醒悟，揭发他人罪恶，庭上不予定罪，其余四犯押回棉织厂听候判决。全部的审判过程不到两小时，候审的时间却超过了半天。

回监正值晚餐，心中有事，进食无味，胡乱吞下一碗豆饼饭，就回寝室独自闷闷地思索这一切。心知难逃加刑厄运，觉得头脑沉重得难以支持。正待躺下休息，却被印刷厂的小组长走来传报，说杜科长叫你到办公室去，于是随他出得宿舍。行至生活区与生产区交界的大门时，突然被两个武警拦住，问我叫季 XX 吗？我答是。其中一个拿出手铐，将我铐上，并推我走，二警押我走出大门，走向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没有路灯，黑朦朦摸索着走，分不出方向。正行时，路旁照来手电筒，随着这光亮，杜科长叫喊道：“是季 XX 吗？”我立定答应，他嗯了声说：“你要老老实实彻底交代你的罪行，争取不死，听到吗？”我听了这沉重而严厉的声音，不禁毛骨悚然，也不作答，继续跟着二警走去。不多远就到了一座岗亭，二警报说押解犯人，就直向公安厅看守所大楼走去。

进入新收间，做了登记手续，开了铐，按了手印，又将我反铐上，然后又叫我就地坐下，扎上半步镣，于是手脚都上了刑具。他们煞似对付一个江洋大盗，叫我不得动弹半分。新收间的狱吏叫来一个劳役犯，将我背上二楼的监房，放在大铺上。这时室内已熄了灯，已是就寝时候，室内的犯人都已睡下，见我这个新客带着双套刑具，知是重犯，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一个带大镣的青年犯对我说：“你是工厂来的吧？”我点了点头，回说是新生厂。接着另一个中年人抽出一条被，折叠成方块放在我身后的墙角，叫我不能睡，只有靠着坐过夜了。我连声谢谢，于是就倚着软软的被子坐下，伸直了双腿，合上眼睛叹了口气。脑子在

翻滚着今日的一切，低声唤老娘，我辜负老人家的盼望，要与亲娘永别了！这一日从生到死的变化多大啊！

知道自己即将告别这世界，并不觉得死的可怕，所想到的是对上下两代人的愧疚，和对中共这套制造栽赃杀人的阴毒手段怀有极度的仇恨。自省这一生，从未有过损人的想法，未做过害人的歹事，经得起上帝的审判。可是为什么摆脱不了共产党的魔爪，就如此任人诬陷摆布，乖乖地上脚镣手铐并等死呢？我应该认输还是怨命呢？在这我以为是生命中最后的一夜里，我无法入眠，在床上翻来覆去，脑中有个走马灯，反复地思考这些问题。我的臀部麻木，腿脚酸疼得无法忍受，眼中金星直冒，真觉得生不如死。

天明了，号子里的难友都起身，将被褥放在身后，坐着边做活边等开饭，而我有生以来第一回尝到带着双套刑具苦坐一宿，等候天明挨一颗子弹的滋味。就在这天的早晨，新生厂的狱吏、魏管理员给我送来衣服铺盖及饭具。我这才感到也许不会立刻枪毙我。只是不见了数年来的家信和几张家人的照片。我放胆请予查询，却遭狱吏的反斥：“你这反动透顶的家伙，还在做梦要东西，我看还是考虑你自己的性命吧！”

这号子里还有另一个青年人也带着大镣，他原是新生铁工厂的劳改犯，因多次逃跑，从原判四年加到无期。他为人豪爽，每日都是他给喂饭，大小便为我解裤，擦屁股。他带的镣有十斤重，镣圈用碎布包扎着，以免铁圈与皮肉磨擦，用一根布绳系着镣链拖在地上发出响声，他的长裤都在镣圈中套进去。而我的半步镣圈紧贴在羊毛裤脚上，没有空隙，不仅无法穿脱内外裤，连血脉流通都受到阻滞，因而数日后一双腿肿得难以忍受。经此折磨身体逐渐虚弱，监狱给关押犯每日两餐，只是两碗稀粥和两块豆腐干大的麦皮饼，谈不上营养，仅能维持生命而已。每到午夜就出

盗汗，周身臭气，衣裤不能换洗，无奈唯有向狱吏张干事请求开铐换衣，不料这个请求竟将我的背铐除去，真是感激不迭。

有了手不仅吃饭睡觉得以自由，不再痛苦难熬，而且也恢复了基本人的活动能力，不似动物那样只有脚没有手了。这使我轻松地如死复生，觉得应该活下去，因此跟难友也有了交谈的兴趣。靠窗下的一位难友年龄最长，他先向我递话：“喂，新客人，你的位子组长，现在你可以活动了，应该搬到这边来。”我即随着他的指点将铺盖搬到他那边。交谈下始知他姓吴，已年过六旬，安庆人，原是安庆圣保罗中学的校长，调往合肥安徽大学任教务长，曾留学美国费城大学，肃反中被判十年徒刑。他青年时期爱好足球运动，曾是费城大学的校代表，体格高大，在校长任内亲自教体育及英语，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这也是他的罪名之一。此老食量很大，每日供给的囚粮与他的需要相差悬殊，饿极了曾吃过牙膏和棉絮。有次提审过炊场，见一些菜根黄叶散在地上，就偷着拿来吃，岂知这些未洗净的残根烂叶上面都有蛔虫卵，食后在肠胃里繁殖开了。我亲见他那次从嘴里吐出四十多条蛔虫，令人恶心。犯医给他服了蛔虫药，次日就拉出百多条蛔虫，见者无不惊骇。因此他的身体日益消瘦，监方因他是病号，长期未调出劳动。

一副半步镣在我脚上已戴了四十二天，不能换脱内外裤子。天气热了，只得将毛裤及外裤褪到足踝。又因镣圈紧，使双腿麻木。吴老建议我向张干事报告。我鼓起勇气在狱吏开封时大声喊报告，张干事问干什么，我指着脚上的小镣向他诉说，镣圈太小，我的腿肿了很久，请将镣圈松一松，张干事嗯了声就走了。直等到天黑也未来开镣，心里嘀咕着不知结果如何。第二天早晨我再次报告，却有了反应，张干事叫我出来，我赶紧下铺跳啊跳到了门外。他叫我坐下，我就地坐下，他开了镣。我呆望着，准备等他放宽

镣圈再给我带上，而他将镣圈拎在手里，叫我回去。我心里大喜，向他深深一躬，以表感激。进了号子，众人都来道贺，因为开镣意味着已从宽量刑，不会处死刑了。死的威胁从此消失，顿觉飘飘然，真如捡回了一条命，生命又有了盼头。

与吴老同室仅两个月，尚未深交又告分手，有点不舍。监中有一个规律，不允许犯人之间久聚，调在另号虽然只一墙之隔，就没有再聚的机会了。这是1959年的7月，我经此折磨，体质已弱不禁风，引起旧疾复发，继初入监的湿热之后，如今五年后又复发。除了所有大关节剧痛之外，体温升至41.7度，以致大便失禁，拉在内裤上尚不知觉，卧在铺上已呈昏迷状态。犯医杨某，以酒精遍涂我全身，降低体温，复又提来一桶井水嘱同号难友为我用毛巾沾湿敷胸和前额，轮番交替。犯医当时摇头示意，唯恐不治。说来奇妙，这夏日的井水，凉气刺骨，竟然起了救命的作用，在不断的敷换之下，高烧降下，人也清醒了。我含着满眶泪水望着医生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同室难友亦面露喜色。可是满室有我拉的稀屎，臭气熏人，幸有好心难友为我冲洗，令我愧疚难言。当时赖以救命的药物就是“安乃近”，是退热止痛的灵丹，如此约一周，热度退尽，但手脚的关节仍肿痛未消。

同号的“李可”难友，是“二进宫”（即第二次入监）的犯人，此君早先毕业于南京的中央大学，进监前是安徽省政府的秘书，目前尚未判刑，他被捕是因为他在学生时期曾经张贴过反共标语。第一次被捕就审查了一年，公安局将他的那张大学毕业文凭拿到各地，询问了他所有的同学，以期找出他的罪证，结果白关了一年，无罪释放，恢复工作。当他们还给他那张文凭时，文凭竟被摺叠得像张烂纸，可见这张文凭经过多少人的手，以致弄得面目全非。此次运动，又找到他，交代过的陈帐重新结算，张贴反共标语，已被列入反革命条例中了。他免不了被撤职查办，判刑劳

改。我在病中蒙他关顾。他不失为持正不阿的人，出生于贫民家庭，蚌埠市人，日本侵华时他还是小学生，高中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但因家境贫寒，无力缴付学费。正踌躇时，遇少时女同学，毕业于中华女中。她自愿去任小学教员，将所得供李可读大学，如此情义，坚持不懈，李可终于大学毕业，遂与女同学结为夫妇，永偕白头。李两次入狱，乃妻始终如一，每月必来探监，亦为李可上诉，并向省府力争李可历史清白，如此恩爱夫妻实属罕见。

不久我又被调出，与一姓捺的老人同号。奇的是一室中仅我与捺老两人，而这老人受监方优待，不劳动，每日两餐都供面条，而且是重油加料的面食，每顿满满一大号缸，吃不完总是给我留着，因此我每顿都吃双份。老人看我瘦骨嶙峋，表示怜惜，示意要我多吃些，使病体恢复。闲话中知其乃民盟的安徽省支部负责人，原籍安徽，可是他太太是广东人，久居香港，50年始回安徽，所以说广东话。他体形瘦小，貌不惊人，谈吐中颇具文人气质，心胸豁达，是位乐天人物。他曾述及汪精卫被刺事件，指此案是在香港蓄谋，原本是刺蒋介石，不料汪精卫首先走出会场，刺客误认是蒋介石，汪做了替死鬼，所幸子弹未中要害。

过了一段时间，始知道这是优待号子，不但吃的不同，而且也不用干活，不像前两个号子要扎鞋底。像“李可”那样的硬干，每天要扎五双鞋底，干这活儿不给椎子，又没有顶针箍，全仗手指顶，所以李可的中指都被针屁股顶成小孔，又结成老茧子。

就在这精神状态稍获舒解时，接到女儿妞妞的一封短信和一只小包裹（里面是两条毛巾，一双短袜）。读了信不禁泪流满面，几平失声，她才十二岁呀，就遭此劫难。“爸爸，你在哪儿？妈妈和我们姐弟三人，都要服从政府的分配，移民到甘肃的山丹县去，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见奶奶，更不知你何时能出来。”这几句话，像刀一样刺着我的心，我清楚记得，以往妻子好游荡的个性

使我烦恼，曾说了一句气话：“这么贪玩，那一天将你弄到甘肃山坳里，你就苦了！”不料今天竟加在她和儿女身上，太惨了！那里的日子怎么过啊！

我接受了新生厂的教训，每到一处不再随便吐露心声。我认清了人类的普遍特性——“经不起威逼和利诱”，对同监的人，决不轻吐肺腑之言。对吴老、李可、捺老我都持有戒心，虽然认为知识界的人不同于普通刑事犯，但还是对中共的险恶心有余悸，故而在公安厅看守所内，我一直抱定不再跟别人倾诉内心，更不敢谈论任何涉及政治的话题。

1959年的10月11日，我病体尚未完全恢复，这天一早就被调回新生厂。到了厂的办公室前，看到原来车间的女狱吏，我还以为到原车间劳动，遂走去招呼。岂知这女吏一改往日的和蔼，捂住鼻子向我斥喝，挥手叫我走远些。这才令我顿悟，在她眼里，我已不如乞丐，身体外观已被折腾成一堆粪土了！四周有几十个与我命运相同的人，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在等待着。八时，一辆载客车驶入厂内，接着那个王科长带着两名背着冲锋枪的大兵走来，拿着名册点名，然后叫我们上车。这时我见到了董毅和周仲良，彼此以目示意，登上客车后就出大门上了公路，不知押送何方。

白湖农场

位于安徽省东部，长江以北的一个小县“庐江”，距长江约百里之遥，山之中一处天然形成的湖泊，被称之为小白湖，它有调节山洪的巨大作用。湖周围的农民赖以此湖灌溉、捕鱼，世代相传，安宁而融乐。传说曹操曾有意在这里屯粮驻军，开辟湖泊改筑良田，作为练兵的基地。这个传说竟被中共所袭用，推出一个

“白湖远景规划”。当这幅蓝图展示在塘串河高坡上的白湖农场场部办公大楼的白墙上时，正是中共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的全盛时期。他下令利用劳改劳教人员，将这块方圆卅六万亩，茫茫一片的天然湖，改造成为旱涝无忧的米粮仓。

他们首先成立规划指挥部，然后调集大批劳教和轻刑犯人，乘雨量稀少的冬季，于湖的中央筑两条二十里长的大堤，取名叫穿湖大堤，将白湖分为两片，一东一西，称为东西大圩。整个大圩有环圩大埂，埂外湖水滔滔，水绕着埂进入两条大堤的中间，成为一条人工河流，直通巢湖。东西大圩四周被湖水围住，圩内劳改犯人无法脱逃。堤宽二十公尺，高十五公尺。这个工程计划若在平地，并无特别，可是筑于几千年形成的湖心就很艰巨了。没有现代化机械，仅以人工在稀薄的淤泥上筑起大堤，单靠毫无反抗能力的囚犯用其体力来完成这亘古未有的巨大工程，可以想象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的生命和健康被毁掉。

今日出现在地面的“白湖美景”，包括三十余万亩良田的巨型农场，一个现代建筑的场部，及化肥、修配、造纸、阀门等四座工厂，一所医院、一所中学、一个警卫团，再加上直属场部的招待所、电影院、建筑工程队、排灌站、农试站、轧花打包厂、剧团、蔬菜大队、副业大队、大食堂等等，供应着上万的特殊阶层。中共的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可在这所白湖农场体现出来。那些特权阶层的淫乐享受，是无数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奴隶轮番为他们作了死而后已的牺牲。

将一片白茫茫的天然湖变成米粮仓，也都是数万冤魂苦鬼生前用一双手、一把锹、一副重担，一锹锹、一担担，成年累月，日以继夜地挑灯夜战打造出来的。犯人们将辽阔的湖面，开辟成三十六万亩良田，挖分成环湖大堤及两条并列的穿湖大堤，中间相距五百公尺。整个湖面的水汇集到 500 公尺的河道中排出，流入

巢湖。东西两大圩的内部，分别规划成干渠、支渠、斗渠，形成灌溉网，以灌注二十亩一块的全圩稻田。浩大的土方工程从 54 年到 61 年这八年中，全场五万劳改犯每个人要限时限量完成成百上千的土方！

在冬季，每条大堤要加高两公尺。当时每个劳改犯每天工作十四小时，甲等劳力要完成四方土、乙等劳力每日完成三方土，丙等劳力完成二方土，不完成不给饭吃。工地有宣传鼓动队，敲锣打鼓，到工地巡回督促。以加饭二两、四两、半斤、一斤，赏烟一支、二支、一包、二包半条、一条为奖励，减刑半年、一年、二年为诱饵。

严冬冰封，大雪纷飞时，犯人被迫赤膊上阵。在工地，劳改犯个个光着上身，经不住寒风吹袭，不得不挑起重担快跑，以求增加体温，抵御严寒。肩头先是被扁担磨得皮开肉绽，然后隆起一块厚茧。炎夏背上被烈日晒成流浆大泡，泡破了受汗水的侵蚀成了火疮，疼得似针刺火燎，夜里只得侧身不能仰卧，任你是钢筋铁骨的好汉，也会被折磨得失去人形。

“白湖”从白茫茫一片湖泊，改变为今日阡陌纵横、一望无际的旱涝保收的良田，加上附带着的现代化设备的几座工厂，无一不是千万个无名“政治奴隶”赤手空拳，超负荷甚至卖命地劳动所换取来的，其中的血泪和惨痛事例，只有亲自在场的人才能知晓。这些情况外边完全不知，因为知情的犯人和干部都被下令严守秘密。随着残余的老成凋零的幸存者的逝世，这些血泪史也将永远埋没人间。人们如今看到的是变成鱼米之乡的白湖，和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一个前公安警察邢某被判两年徒刑，刑满被留用，他叙述了一个亲眼见到的悲惨故事：“我分派在欧队副的队里当大组长。那时穿湖大堤刚完成东面的一条，正是严冬时节，欧队副带领一队去清理河底淤泥。清晨先用木板铺在冻硬了的淤

泥上，然后逐段将冻结的淤泥挑运到大堤上加高堤岸。在这个过程中，冻结的淤泥经白天阳光曝晒就渐渐解冻，至傍晚时分几乎全部溶解。其他队都已在化冻前收工，唯有欧队副贪功，为了提前完成任务，硬要延至天黑还不收工，其时所有犯人早已疲惫不堪，又累又饿了。欧队副这才招呼收工，于是全队从木板上鱼贯走到对岸，然后选了十八个壮年劳改犯令他们将木板一块块收回，搬运到堤上堆好。不料傍晚时分，经一天的日晒，淤泥早已开始化冻，待十八人收了木板，淤泥已不能负荷人体，十八人竭力爬到中途，脚底就开始下沉，虽拼命挣扎也未能逃脱灭顶之灾。这十八条生命，顷刻没于泥潭。岸上的人眼见这种危急情况，不禁大叫救命，乱成一团，我更急得嚎哭起来。可是欧队副对此不仅没有责任感，连怜惜心也没有，他竟像遗下一堆污物似地挥挥手扬长而去。”这真是一樁骇人听闻的惨案！事后大家都没有听说有什么报道，也不知欧队副是否要负什么刑事责任。总之，这十八条命就无声无息地从世上消失了。

以安徽为例，究竟有多少名劳改犯？确切的数字，唯有省劳改局档案柜里还有。从几个著名的水利工程、大大小小的劳改农场、工厂及各省市的看守所、监狱略可知其概数。如佛子岭水库、响洪甸、梅山等水库工程，“淮总”的几个支队就有几百万劳改犯人，总数不下千万。一般说，重刑犯不会放在外面，安庆监狱就是集中无期、死缓犯人的所在地。白湖的五大队（即湖心大队）、合肥的新生棉织厂就是集中重刑犯和技术犯的处所，用以发展工业，以无偿的劳动来填补它的工业空白，为它创造所谓的社会主义财富。在它认为需要的时候，也可将一些重刑犯放在特设的警戒森严的城堡式的大监狱里，这就是白湖农场的“湖心大队”。

59年的10月11日，合肥市的省属劳改局直辖新生棉织厂，集中了七十多个重刑犯，用两辆大客车送往白湖。照例是武装押送，

这四百多里路程中途，只允许一次饮水和大小便。押送的干部是王科长及四个背冲锋枪的警卫兵。这些重刑犯驯服地端坐在车厢里，中午到达一个县城市的汽车站，干部和警卫轮流下车进餐，犯人关在车里以携带的馒头充饥。每个犯人给一杯水解渴，同时放一次风，警卫持枪站在客车与厕所的两头，让犯人解大小便，随着就继续行驶。

59年正是全国大饥荒开始，沿途所见满目凄凉。上午十时、下午五时是农村和乡镇的用膳时间，在所谓的吃饭不要钱，农村开大伙的集体制号召下，每到一处城镇，就见街道两旁老老少少排着长龙，每个人手里拿着土碗竹筷挨次接受大食堂所发的一木瓢稀粥。这些人面黄肌瘦，因为这一木瓢稀粥里菜多过米，将之充饥，只能抵挡一二个小时，根本就填不饱肚肠。这比日本侵华时俘虏和苦力的生活还要差，至少日军对他的敌人和工具似的苦力还给吃饱。而共产党夸耀解放了人民，竟是叫老百姓喝吃糟糠。这种景象看在劳改犯眼里，感到今日当了主人翁的老百姓日子过得尚不如犯人。中共谎称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在安徽就有吃死人肉的事，整个中原大地沉陷于饥饿的恐怖中。

大饥荒的惨情，是中共一手制造的，根本不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可说它是“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当时各省的首脑们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号召，各自竞相虚报农业成果，将粮食的亩产量，从千斤提高到万斤。安徽日报竟出号外，全版用红字标出放“特大卫星”，某乡某村亩产稻谷二十三万斤。照片上一个大姑娘站在稻谷上，显示稻穗的密度高得能支撑一个人体，引起许多记者访问。此类谎报，以安徽最突出，中共中央就根据各地报上的数字征收粮食，如此逼得农村不但颗粒无存，还倒欠应缴粮食，弄得农民只有坐以待毙。官方无法自圆其说，只得撒下弥天大谎：“中

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将罪责推在老天爷头上。全国大饥荒，有钱买不到吃的，城市人死啃降低的配给，农民没有配给，只得吃草根树皮，甚至死人肉。没有吃，饿死，没有人敢怨政府，媒体更没有报导饿死人的消息。

由于路面坎坷，东行缓慢，有足够的时间目睹惨情，眼到之处满目仓痍，活似人间地狱。四百来里的行程从早上八时开车，中午停了一小时，直到下午五时始到达白湖农场场部所在地“塘串河”。此地属卢江县境，场部设在高地上，四周圈以高高的砖墙，冲着路口开扇大门。下车后我们在围墙外坐等，王科长向场部交了解送手续。因为唯有我是从省看守所提交给新生厂转解白湖的，所以下车王科长就喊我的名字，并说你加刑十年，合并为有期徒刑二十年，这是判决书，你看了签个字。我大病初愈，瘦弱的身子，坐了一日颠簸的车，站起来不免摇晃，听说加刑十年，心里毫无准备，也不想看判决书的内容，接过笔来，哆哆嗦嗦地签了名，十分听话地将判决书交还给他。这张毁了我一身的判决纸，与我仅有短短的一面之缘，惊鸿一瞥，就让它永远躺在公安局的档案柜里吧。

从场部到解送的五大队一队，约有十来华里，我病后的躯体，瘦得皮包骨，两边的足踝依然肿得像鹅卵石，一步一拐步履艰难。同案的周仲良已是年近古稀，原是要人扶的老人，而今他却叫我搭着他的肩头慢慢向前走。就这样又痛又累浑身冒汗，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到达一队的大草棚，全程用了四个多小时，边走边受解差的骂：“你这死囚还摆臭架子，穿皮鞋怎能走路，还不脱了光脚走！”我只得苦苦哀求，说如果脱了皮鞋我实在受不了地上的小石子的刺痛。我要老周先走，忍着风湿病的剧痛，像是在受刑，痛澈心脾。待我最后到达一队时，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周仲良为我领了一碗菜粥，吃了始有力说话。有一个年轻的杂务犯将我

带到工棚，被编在老弱组的铺地上。那里挤得连被子都放不下去，所谓的铺位，其实就是泥地上铺着一层稻草，边缘用一根根圆木拦着的通到两头的长铺。长约百余公尺的工棚，像一艘船躺在地上，两头用草棚挡风雨，一边留四个门洞，一进门就是排在两边的长铺，中间留有过道。里面有一股冲鼻的污浊臭气，熏得我不能吸气，简直像到了猪圈。

1959年的白湖只开垦了一半，给人以荒漠凄凉的感觉，初垦的地，植的树木都还没有长大，看上去有些光秃秃。另一半则白茫茫一片湖水，由一条既长又阔的长堤拦住，由南到北，形成堤西是水，堤东是田。场部高丘脚下，一条大道直到塘串河的渡口，木船将我们这批劳改犯摆到河东，就踏上这长二十里的长堤，行约二里就到了圩心。这里一望无际的黄沙土，在这约二十多万亩的黄土地上，一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如今已规划得沟渠纵横，块块方田，可以开始耕耘了！

堤的边缘是旱地，中间排列着A字形草棚，只见几个城市衣着的女犯出入其间。周围的旱地远处有人在作业，再向深处行就是水田。十月天气秋收已毕，稻根露出水面呈褐色一片，一望无垠，如此广阔的田野，需要多少人手啊！从戒备森严的监狱来到这大自然怀里，觉得清爽悦目，不禁暗自感谢神，是他赐予了我们这些被人间遗弃的罪犯如此的享受，我甚至觉得病体的痛苦也能够忍耐了。想必是上帝的安排，要我在此度过十年的农田生活。宇宙间自有生死、哀乐、盛衰的规律，强求不得。念及此，内心首次出现一种宁静之感，让我在最艰难时有继续挣扎求生的勇气。

久被监禁的人，无不虚弱得像大病初愈，面色苍白，骨瘦如柴。我不仅是被从严监管，而且是大病初愈。一队的王助理员，是个方涉监狱的下级狱吏，尚有人情味，见我体弱，不叫我下田劳作，他先要我修补囚衣，然后又叫我做抄写工作(用小册子抄写犯人名

册)。风湿热发病后的后遗症十分折磨我，四肢的关节肿痛，脚踝与手指关节肿得不能弯曲，用力就痛，即使平地行走，或手拿笔杆针线，都如身负百斤重担，紧张得周身冒汗。

1960年的冬季以前，白湖这所特种监狱，根本没有房屋，即使有几间土和草建成的屋子，也是筑在堤埂上给狱吏家属和警卫兵住的，室内更简陋得只有一张木桌两张长凳。当我被指定在工具棚里抄写名册时，有暇浏览这初垦荒凉的白湖景色。原来这里是群山环抱，受山洪冲泄的盆地，久而久之聚成大约有五十万顷的湖泊。60年，这湖心大队，编为五大队，在湖心开了一块百顷的四方地，四面挖了深十米，宽三十米的深沟，沟外筑有高高的围墙，安装了电网，形同城堡。堡外是干部眷属区，那里另有天地。这个劳改监狱完成之后，一、二、三、四队皆是十五年以上重刑犯，属于五大队，于60年的冬季全部迁入新建的堡内。一排排的新居，是砖木结构，共有十排，右左各五排，每排有十二间，第三间有个隔墙，室内边是土坑，中间是走道，每间住十六至十八人，每人占2尺铺位，恰好是平卧的宽度。一个队分得两幢，四个队共占八幢。另有两排，一排是各队的伙房，一排是干部的办公室及各队的小仓库，62年又添设一个澡堂。

进入宿舍后，队里来个刘法钦干事，王助理调走了。刘接受了王的意见，没将我编入小组，留在队里管杂务，与收方员梁定方，大组长张玉科、徐光藻、记事李敏来、沈克枝等人住一间仓，这无形中救了我这条命。因为杂务这个工作，相等于军中的事务长，除了干部外，杂务是代替干部的总管，而收方员是生产上的总管，大组长则是作业区的工头，记事则是记录每个作业区的劳动成绩。通常一个队分二至三个作业区，大组长负责分派该区的劳力，督促犯人的劳动。全队的生产由收方员统一安排、劳力、畜力、机耕，掌握全盘的耕耘和收获，逐日上报。

白湖农场的场长，相当于县委书记，但他所管辖的是约有十万人
的大监狱，和一片约三十多万亩的土地，他对这人和土地有着
绝对的权威，可以完全控制和充分运用这庞大的人员。他对生产
的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在那里有一个团的兵力，作为警戒，更有众多管理犯人的干部。
全场有十多个大队，大队下属十二个中队，及机耕拖拉机站，种
子队、运输队、米厂和副业杂务队。大队的耕种面积约二万亩土
地，管辖三至四千劳改犯，还有一个门诊室。大队的主脑为教导
员、副教导员及大队长、大队副、干事、会计、管理员、技术员
等干部，每个中队设指导员、队长、队副、管教干事、助理员、
事务长等六个干部。若以每个干部是五口之家，那么加上四个工
厂，一个卫生院，及场部庞大的直属单位的干部和家属，合在一
起，整个农场就有两万以上不劳而获的特殊阶级，而这个阶层的
男女老少，无不养尊处优，过着人上人的优越生活。以一个中队
的头头来说，他应有二百五十个农奴，和一千多亩土地，可以说
一呼百应，道地的土皇帝。他的享受，比一个县长还要威风。他
们绝不会对这些曾是社会名流、抗日好汉、家庭中的柱石的劳改
犯产生怜惜、同情，相反地将他们视为最可怕的敌人。

60年秋收后，“西大圩大堤工程”开工时，正是隆冬天气，白
湖遍地冰封，天未明，悬在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半截“钢轨”被敲
得铛铛响，这是劳改犯起身的信号，与军队的组织相似，却比军
队的纪律更严。劳改犯在这里充当牛马，已失去人的生活习惯。
每天从散发着臭气的被窝里爬起来，匆忙拥到室外的空地接受
炊事犯发给的一溜子稀粥，饿狼似地食毕，用舌尖舔尽食具上的
米粒，然后将食具放在布袋里，背在肩上或系在腰带上，赶紧站
队上工地。一路快步登上大堤，放下食具脱去棉袄，立刻操起簸
箕担子，光着上身挑土方。干部命令大家光着上身，因为这样干

活利落、工效高。在凛冽的寒风中赤着身子，谁能忍受？不得已一个个只得打起精神快跑快担，使光着的上身发出热气，头上冒汗，以自身的热量抵挡严寒。饥饿和劳累把人折腾得个个筋骨突露，骨骼变形。超强的劳动令人不堪负荷，脑筋已经没有余力去运转，个个人成了行尸走肉的活工具。即便如此，还受到二十四小时的监督，稍有不合管理人的意，就有大难临头。不过上面将这种“让你活下去接受劳动”称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搬土是劳动的内容之一。在距东大堤 600 公尺的平行线上再筑一条西大堤，于是两堤之间就形成一条河，将整个白湖的水引入这条宽 600 公尺的河里，然后直通巢湖。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矿场、工厂、牧场、水利巨型工程等，无一不是犯人用双手加大锹、扁担和簸箕这种原始工具开拓完成的。白湖农场的建成就是此类原始生产组合的奇迹。

凡从事农活的囚犯，手不离锹、锄、镰刀，肩不离扁担，整天与水土打交道。炎夏被烈日晒得喘不过气来，双脚陷在污泥浊水里，不是生皮炎，就是橡皮脚(又名丝虫病)。由于长期饥饿，极度劳累，缺乏营养，加上医药的简陋短少，造成种种疾病。一个队里，每天出工时，总有 20-30 病号留在工棚，不出工的病号必须经医务犯检查，干部批准始配给病号稀粥，通不过犯医的检查就得出工下田劳作。以普崎圩农场而言，饿死的比活着的多，死了的没人抬埋，往往死了很久还与活着的睡在一排。而活人已无力干活，只剩下抬起身，伸手接开饭时的稀粥的力气了。一排排的监房简直就如坟墓，死神的幽灵在四处徘徊。最后干部也慌了，只得带着还有口气的幸存劳改犯投奔合肥劳改局再转到白湖。普崎圩农场就此荒芜，杂草丛生，一片荒烟蔓草。

白湖的自然条件较普崎圩优越多了，一直旱涝保收，不似普崎原是“无为”县长江边的芦苇滩，一望无际的低洼沙土地，对长

江水势无法控制，难得一次丰收，灾后就被放弃。白湖的成就在于充分利用劳改犯，生产日见振兴。可是劳改犯人的生活条件数十年来仅有微小的改变，两排房屋的两端造了围墙，一边是伙房，一边是厕所构成的一个院落，大门两侧一面是门诊室，一面是澡堂。劳改犯人日出大田劳作，日落而息。所有劳作，二十亩一块的大田，先由拖拉机翻耕，然后由人马和牛力细作，从泡种育苗、拔秧、移栽、耘田、拔草、施肥、灌溉，直到收割打运、脱粒、晒扬、上堆进仓、打包等的双季收获，全部落在每个中队的二百多劳改犯人身上。每队喂养二十来头牛，百来头猪，千多只鸡鸭，二十亩菜园。铁、木工数人，每队一个医务犯，六个炊事犯，这就担负起一千二百亩土地的生产。而那六个干部就是二百多人的主宰，他们严格控制犯人的行动，以毛语录来主导劳改犯人的思想。劳作使每个劳改犯终年筋疲力尽，每天收工时，有气无力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排队接受伙房发给一碗糙米饭和一木瓢菜的午餐。菜里看不见油星，菜多过米饭，这是劳改队的常规，所谓“饭少菜来凑”，从这句自嘲的话里可以了解到饭面这类主食品是经年短缺，僧多粥少，此之谓也。

跟这有天壤之别的是围墙外的干部家属区。从表面看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居住在与囚犯相似的房屋内，可是以面积而言，大过劳改犯人的二十倍。以实际生活来看，连县委书记也不能与之相比。劳改队的干部是土皇帝，而这些家属在囚犯眼中，真的贵似皇族，天之骄子。凡是农场生产的最上乘、最肥美、最鲜嫩的家禽家畜、水产菜蔬和稀有农副珍品，都被上贡给他们享受。用几个案例可以引证这些土皇族的特殊享受：干部食堂是由劳改犯中挑选的厨师担任炊事员，所有荤素食物都由劳改队供应，买一头小牛，只需八元，肥壮的大牛只五十元。这种价格在外边别说买牛肉，即使一张牛皮也要数十元。干部食堂的牛肉不仅不花

钱，而且还有收益。鸡鸭鹅每斤官价三角五分，可是民间单是一只鹅的鹅毛一斤就值八角。猪肉官价五角一斤，然而这里猪是由各队调去的，食堂只要给赶猪的劳改犯吃一顿饱饭，少算百儿八十的斤两不会计较，反正是公家的事。如果在干部食堂花一角钱买份红烧肉，分量是一个劳改犯人一年所吃猪肉的双倍。干部食堂生财有道，常以几大缸猪肉油每斤一元的价格卖给劳改犯人，或以烧熟的鹅鸭每斤八角卖给劳改犯，牟取厚利。劳改队的干部每月工资不过四十至七十元，可是他全家人的伙食费不会超出十元，而柴米油盐蔬菜水产都不用花钱去买。每个大队都有鱼塘，围沟里的大鱼每尾十来斤不出奇。干部家属食堂买两角钱鱼就够一家人食用了。每个家属饲养禽畜，无需买饲料，而且可以作为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市场的收购站。另外有一些专业劳改犯，讨好家属，暗暗地把鸡、鸭、鱼、蛋送货上门，无人知晓。所以他们除了剥削，还能发横财。

再举一个实例，一名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叫马长彬，这人原是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连长，复员后在家乡阜阳任干部，因为通奸杀人被判无期徒刑，解送白湖改造。他不但熟悉干部的习性，而且与养练队的管教陈队副是小同乡，因此这个有千来名犯人的养练队及门诊室医务犯和病号的伙食都归他管，生活资料都掌握在他手中。这人有胆识、善奉迎，全大队的干部家属无不相熟。由于他出入警戒线，由队部出了长期通行证，那些岗哨个个与他相识，他也就无需凭证出入，镇上的粮油杂货供销社更是与他老交情，那些干部家属要买什么都叫他代办，他成了全大队劳改犯中的红人，于是他的手面越来越大。他虽是犯人，却有大把的现钞和与现金同样价值粮油票。他利用养练队粮油结余来讨好本队干部，私自送米送油。他独自在院墙外住一间仓库大屋，伙房犯人也在他管辖之下。因为他是管教干部的亲信，谁也不敢不听他的，

他的手腕是对本队的家属输出，对外队家属输入，凡托他买卖粮油禽畜总要抽点油水。这样久而久之，就积得成千上万的现钞和粮油票，这样的手面和数量在当时的民间及干部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劳改队的犯人无权查问伙食，而家属认为犯人绝对不敢亏负干部。在这错觉下，马长彬得以为所欲为。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劳改犯，能够得到管教干部如此信任，可见他的机警和圆滑，同时也反映出干部的贪心和愚蠢，无知而独断。也正是这种因素，使马长彬产生远走高飞的图谋，计划逃循出境的行动。他暗下策动了门诊室的医务犯谢庆民医生和张安春护士，他们两个也都被判无期徒刑。

马长彬向管教陈队副报告到场部米厂领米，填了三人出差证明，拉了两辆板车和一捆麻袋，伙同谢、张将医药箱和医生工作服，都藏在麻包里，拉着板车堂而皇之地从后门诊室出发，通过大桥岗哨，顺利到达塘串河镇。通常每次到场部领米都要带一至三人，先向队部报告，然后由他带领出入警戒哨，这习已为常。此次的图谋是他多年来取得干部信任的运用。马长彬在镇上卖掉了所领的大米，出了集镇，三人行至无人处丢掉板车，将带来行医药箱及白色工作服穿戴整齐，背着药箱扮成下乡的医疗小组沿着乡村走出卢江县。他们不能在城市住宿，因为没有路证，只能在农村以巡回医疗为名，替农民治病的理由，借宿于农家，白天由交通线乘车，傍晚就投入农村。

出走的当晚，伙房组长向陈副报告：“马长彬和谢、张三人都未归队。：陈队副回称：“这三个家伙必定是多饮了，不敢回来。”第二天下午依然未见马等三人回队，这下慌了手脚，连忙向大队报告追捕。三人到达蚌埠时，张安春提出散伙，聚在一起目标大，不如分开自找出路，马长彬不敢勉强，遂拿出千余元给了张安春，从此分手。马、谢依然为伴，张则取道北京去找舅父安身。不料

舅父是个老干部，原则性很强，知道他是逃犯，决意要张主动投案。小张执拗不得，只得由舅父安排投案。投案后的结局很简单，张安春被送回白湖，仍到原单位，在大队门诊室做护理。经过一段交代审查后，上面对他很放心，不镣不铐，依旧与往时一样，不过他比以前更沉默寡言了。

本来他是个中学生，在大鸣大放期间，一时受鸣放的冲动，竟与几个知心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党的秘密团体，设立了党部，有党魁、有执委、更有主席、部长等职称，不久被内部告密，以致一网打尽。主席叫沈克枝，被判死缓（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部长”张安春被判无期徒刑。

白湖的公安系统根据张安春的供述线索，即时上报，立为要案，发出全国通缉令。根据马长彬当时的逃跑路线，第一个目标越过中朝边界逃到朝鲜，第二是潜伏在大别山区。张安春投案后的两个来月，公安就在大别山边缘农村发现了马、谢的踪迹。于是地方民兵与公安联合组成了搜捕网，并逐渐缩小搜捕圈，逼使马、谢入瓮。现实打破了马长彬的设想，大别山不再是适合游击或躲藏的地方，当年中共的游击根据地，已被地方组织所代替，山沟森林都遍设了护林点，边缘荒地亦早已是农家的拓荒区，林木与山村毗邻。被围在林木深处的马谢躲过层层监视哨所，露宿在密林里，但饥饿迫使他俩必须潜入村寨觅食。他们觉察到村民见到他俩那种惊慌状态，就知不妙，即向山里逃窜，然而围捕的民兵越围越近。民兵和公安武警举着武器，如临大敌，马谢见状，惊慌狼狈，只得束手就擒。公安唯恐反抗，手铐加绳索。马长彬痛得涕泪直流，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脸上滚下黄豆大的汗珠。民兵将他像绑猪那样用绳索绑着，抬下山来。谢庆民只是被反铐。

半年之后，谢庆民被解回白湖二大队门诊室，依然做着门诊室的劳改犯医生。翌年春季一个晴朗的早晨，马长彬被解到白湖青

山脚下，由场部召开全场宣判大会执行枪决，由白湖法庭在台上宣判他的罪行：“马长彬因通奸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投入劳改后曾因表现积极，二次减刑为二十年有期徒刑，于73年组织逃跑，盗窃财物，化装成医务工作者，流窜于蚌埠、合肥、六安一带行骗，图谋不轨。群众搜捕时竟武装对抗，企图抢夺武器，实属罪大恶极。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X条X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二大队的养练场传出马长彬等三人逃跑的消息后，直到了张安春回队，谢庆民解返，马长彬枪决，前后约一年二个月。行刑时，在青山刑场四面布了警戒。一辆红色警车，车头架着机枪，进入警戒圈，停在刑场的边缘。两名武警架着马长彬出场。这时的马长彬好像受伤的螳螂，上身弯曲。法官宣判完毕，插上亡命牌后，大家才看清楚，马长彬已不能站立。他被拖到斜坡下，背靠土坡跪在地上，只听哨音一响，小旗一扬，砰的一声，马长彬应声而倒。

围观的成千群众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整个过程就象看戏一样，并不觉得惊恐。对于死囚大家也无动于衷，没有什么同情怜悯。死个人不过象踩死一只蚂蚁，犯人在这里早晚就成了一堆粪土。有些人也许觉得枪毙人稍稍有些刺激，为平淡的乡间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

血和汗

“塘串河”属于卢江县的小集镇，是白湖农场场部所在地，五层高的楼宇建筑在高地上，不受洪水威胁。场部的周围附设着各个指挥部门和生活设施，控制着东西两个大圩。每个大圩组成十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十二个中队和一个机耕队一个种子队，一

个门诊室一个轧米厂，一个水陆运输队。中队是劳改的基层组织，约有一千二三百亩水田，以及猪、牛、鸭、鸡、棚。其他副业如菜园、鱼塘、豆腐房、糖坊、羊圈等，中队也附有铁工木匠，这些设施均由中队的二百五十上下的劳改犯运作。人畜除了进行劳力耕作外，他们的粪便是绝好的天然肥料。

1960 年的 5 月，由劳改苦役徒手完成的西大圩大堤工程竣工了，它将湖水变成十多万亩肥沃的良田，人们眼看着半湖的浩浩绿水，流入贯穿南北的中心河道，主条河道阔达千公尺，长有二十多里，直通巢湖转入长江。

就在这一年的春耕播种季节，西大圩的湖水已放尽，露出黑呦呦的肥土。藉着尚有浅浅的余水，人们撑着小木舟往返全面撒种，无须翻耕，无须施肥、除草，经过 60 天的自然生长，竟长成了漫无边际黄澄澄的稻海，引得不知从那里飞来的大群野鸭，铺天盖地呼唤而过，犹如狂风怒涛落在稻海里争食人的丰硕成果，自晨至夕络绎不绝。这可苦了白湖的劳改犯人，场部一声令下，全场出动，与天候野鸭争粮食，无奈倒伏的稻子和深陷的淤泥，增加了收割的难度，弯腰割伏稻已是够难的了，又加上一步一陷，成了难上加难，一整天也难割半亩地，随割随打，一面打在活筒里，一面装上小木舟运走。哪一队收割，粮食就归哪一队，引起了全面竞争。

粮食的配给制，经常变换数量，计划既定，绝不会对劳改犯人施仁，宁可让野鸭争食，或抛散在田里，也不肯给劳改犯人多吃一两。收割的人只得边割边打，边偷吃偷藏生稻，因此这次丰收，损失要比收存多。而且有三分之一的劳改犯人因此次挑堤工程和收割，过份劳累加饥饿而病倒。有几个来自城市的人吞了生稻伤害了肠胃。有一个名叫孙葳的杭州人（是上海三友实业社老板的外甥），因食了大量的生稻，刺破了胃，生稻阻塞在肠里当夜死亡。

多数人偷了稻子，回到工棚背着干部，将生稻用布裹起来拿砖头砸，去掉糠皮，吃生米。

西大圩造田挖沟工程，也像东大圩初期一样，由数万人赤手空拳来完成。他们住 A 字草棚，吃定量四十斤糙米饭，劳力分成甲乙丙三等，劳改犯人按等级吃饭。强力劳动，饭不果腹，营养不良。一年 365 天，除却三天假日休息，那半截钢轨总在清晨星空敲得铛铛响，劳改犯人从睡乡中惊醒，起来叠好被子，围着门外的大木盆，各自用旧得呈灰黄色的毛巾洗一下垢脸，就着个人的饭具排列在大木桶前，挨次接受炊事犯给的一木瓢稀粥。这是 1962 年宣布人道待遇的囚粮标准。若在 59 至 61 年间，早餐是菜多米少的稀汤，或者是从北方运来的黑高粱，不去壳的高粱粗粒，糙得卡喉咙，大家只有直着嗓子带水吞，饿着肚子出工。

大部分人原先均非庄稼人，被强迫做着所谓的“农活不要学，人家咋着我咋着”的拔秧、插禾、挑秧把、耘田、拔草、施肥、灭虫、撒肥，然后割稻、捆稻把和挑运等活计。不下水的，要做些场基上的脱粒、上堆、翻场晒稻、收场等杂活，也是累得精疲力尽。在炎夏温度高达 50 度以上做重活的往往受暑晕倒。而整天泡在水田里，手脚腐烂更是人人皆然，收工后在犯医那里用桐油掺药膏涂在手脚上，照常干活。春夏的农家最为辛劳，大家在春耕、夏管、秋收中无限止地付出体力。在冬间，劳改犯人还要投入冬整冬修的活儿，俗称“加堤修坝”。

1959 年—1961 年间，白湖的劳改犯人被推入更为严酷的阶段，囚粮定为卅斤，每天都有一顿米饭，丙等劳力只能吃到二十五斤，甲等劳力可以有三十五斤，而病号只有二十一斤的定量，根本不能果腹，蔬菜只限于每队二十亩菜园的产量。优级细菜全供干部家属食用，粗菜不够一个队二百多人吃，只得在水沟里捞水草来代替。水草原是农民用来喂猪的，现在猪吃的水草转给人当食物。

饿极了的劳改犯人，在收工午餐时，接过炊事犯一大舀子煮熟的水草，像饿狼似地大嚼大吞。为了填饱辘辘的饥肠，水草一度成为主食。那一小碗饭，成了我们唯一的美肴，眼睛望着米饭，嘴里嚼着水草，以米饭的香味来推送水草下咽。有时，伙房也用菜瓜和少量的黄豆掺和在水草中一起煮烂，上面浇一勺生油，当作营养菜。

饥饿已将人的味觉降低到了与猪狗相同，苦草能嚼，不嫌其苦。农场在春夏提倡种菜瓜，产量高、损耗少，一条菜瓜往往重达七斤以上，味甘、生吃可解渴充饥。每天伙食以菜为主，洗切时挖出瓜瓢丢在干浆桶里喂猪。由于瓢内有糖份，引来红头蝇吸食，就是这种肮脏不堪的污物，竟也引得饿极了的劳改犯人在经过大伙房时一拥而上，争着向桶内捞取瓜瓢吞食，惹得红头蝇在众人头上乱飞。直到1962年的秋天，囚粮定量增到四十斤，此种惨况始消失。

这一年全国粮食解冻，农民首先开禁，恢复了生产，各个供销社也重新出售生活用品。粮站供应油粮种子，于是前期乡村的分煮分食，又恢复到一家人可以同煮同食了。随之农家也可以饲养家禽，乡镇的收购站也有猪肉、鱼、蛋出售，但是收有官价，售则凭票，除了高层干部外，市民按人口领取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及豆制品供应卡。

劳改犯人连受限制的资格都没有，只算是奴中之奴。在春夏秋三季繁忙时期，体力消耗巨大，要求增加副食，以弥补主粮之不足。可是干部们坚持所谓党性，不但不为这些强劳动力的饥馑所动，反而施以高压，发出警告：“近来有些抗改分子，乘政府的人道主义改善犯人生活之际，提出增加副食的要求。告诉你们，国家对待罪犯采取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今天农民的生活没有你们好，为了改造你们的剥削享乐的恶习，对你们是给你吃什

么而不是你要吃什么，给你休息而不是你要休息，给你穿什么而不是你要穿什么！你们必须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不准乱说乱动。”

犯人在大队教导员的一番恫吓、欺骗的训话后，只得将怨气吞入肚里，继续过那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春耕秋收中最需要的是年青力壮的劳改犯人，农田里的挑秧把、挑稻把和栽秧割稻，主要靠这些强劳力。剩下的拔秧、耕田、拔草、施肥、灌溉就由一般劳力去做。其实，不论重活、轻活一样累得人腰酸背痛，手烂脚裂。例如每队一千多亩水田，按比例要育一百多亩秧，这个传统拔秧劳作，就要落在六七十人身上，从日出到日落，十四小时都浸在水里。秧田里有数不清的小虫和对皮肤有害的化肥、人粪和污水，时时刻刻在腐蚀肌肤，腿上长水疮，手上起水泡，劳改犯人要承受经年累月的痛苦。干部还施尽方法来提高工效，检查质量，弄得人提心吊胆，全力以赴，没有人敢偷懒怠工。收工时，年纪大的往往直不了腰，只得垂头弯腰，摇晃着缓缓而行。

队上规定参加拔秧的老弱病残，每天工效不得低于 20 公尺，一亩田六块秧，每块宽 2.5 公尺，长 60 公尺，这里长着密密麻麻的秧苗。犯人要将之从泥中连根拔起，洗净根须上的泥土，边拔边洗，拔满一把，即用二根稻草扎成把子。这样连续不断地拔、洗、扎，快手每天可拔 60—70 公尺，普通劳力 40—50 公尺，超额有奖。奖是多吃几两饭，完不成 20 公尺的不准收工，点着汽油灯也要拔完。有个老弱犯人完不成，只得央求快手帮助，否则就要饿肚子。

有一类原是农民出身的劳改犯人，有农业知识而得到生活上的优待，在劳作上处指导地位，如犁田、催芽泡种、放水、撒种、做秧田、管理抽水机、堆草、上仓等，都由他们指导。再有一些如放牛、喂猪、饲养鸡鸭、木工、铁工、种菜，掌握这些技术的劳改犯人，都由各队的收方统计、大组长、记事、杂务犯负责施

工调度，代替干部进行生产和管理。这些技术劳改犯，除了犁田随小组生活外，其余都属小单位，分居在工棚以外自建的草棚，可以自己煮食，向伙房领米、油、盐、菜蔬。他们的活动范围较大，不论定量多么少，他们都能吃饱，因为他们直接掌握着蛋品杂粮、蔬菜，并有机会去捕鱼摸虾。而收方统计、大组长、杂务、医务等犯人，属于犯人中的掌权者，全队犯人在其管辖之下。大多数权力犯人都能以仁义为怀，不仗势弄权，所以他们所到之处能接受各小单位私赠的食物。

在那个年代的白湖劳改队，有着这样说法，“劳改进伙房赛似上天堂”，这道出了饥饿的威力，有了粮食，其满足感竟达天境。有一次，刚从田间收工回来的犯人经过猪棚，见圈外一堆霉烂得连猪都不吃的山芋干，竟一拥而上弯着腰边拾边往嘴里送，好像在争食美味那样兴奋。站在一边的监狱岗哨，以不屑的语气大声喝阻说：“你们不怕病啊！这么脏的东西吃了要闹肚的，不许吃。”可是谁也不听。

各队的医务犯与一般劳改犯不同，他们有个单独的医务室。医务室药物不多，也谈不上设备，药柜、药箱、手术床都由土坯做成。至于医疗器材，仅有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表、注射消毒盒。而药物多属于降温消炎止痛药品，如四环素、土霉素、链霉素、阿斯匹灵、大黄片、牛黄解毒片、驱蛔片等，外科用仅有红汞、紫药水、碘酒、酒精、纱布药棉等，别无他物。

农场的劳改生活和生产状况，都处于原始状态，除了拖拉机和抽水机外，再也没有现代化设施，医疗卫生就算脱离原始，但比起城市要落后许多。与农村的“赤脚医生”相比，这些医生的资历较高。在农忙季节，犯医背着有红十字的药箱，到工地田野作巡回医疗，散发人丹十滴水、清凉油，备中暑的急用。他们顺便也去小单位走走。犯医是劳改犯的恩人，犯人有病，唯一的关心

来自医生，因此犯医所到之处，无不热情欢迎，殷勤接待，菜园的瓜果、鸡鸭棚的蛋品，鱼虾都是招待的礼物。在劳改犯人眼里，犯医是二干部，唯有他背着药箱可以到处走动，行遍整个大队无人干涉，出入干部住所与眷属交往，是最自由的人。再有就是剃头、拾粪，这两项活计，算得是监狱中的自由职业，在中队的地区内可以任意走动。剃头拎包和粪担子是通行证，凭此能出入无阻。

记得在 1973 年间，社会上刮起一股青少年肇事风，那些有权有势的高干子女，追求起西方生活方式，在自我表现上放纵不羁，追求物欲性欲。连工人家庭的孩子，也跟在高干子女后面亦步亦趋，胡作非为。有些是红卫兵的变种，到处进行打砸抢，无法无天，引起高层的注意，下令取缔，于是公检法一起遵行。此一时期，白湖农场新到了许多相貌体面，活蹦乱跳的新客。相形之下，他们像新生的牛犊，我们是粪堆里的枯草。他们健壮的体格，穿着新潮服装，鲜艳夺目的翻领 T 恤，奶油色的西裤，呈现一股令人羡慕的青春气息。我们这些已经被折磨得腰弯背驼兼白头的老反革命，眼看这批在红旗下长大的新秀壮苗，不解他们怎么还有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进来的新犯成份很纯，有些是公安干部的儿子，也有公社主任级的子弟。从外表上看，这些青年人没有畏畏缩缩的自卑，有的是一股满不在乎的傲气。

他们刚到时正逢“双抢”，没有例外立即投入最紧张的劳动。指导员要他们做挑秧把、插秧、挑运稻把、打场等最艰苦的活计。不到一周，他们的外表都变了，由白到红，由红到黑，背和臂露出的部分，都凸起了许多流浆大泡，泡破了流黄水，皮揭了就显出一块块粉红色的新疤，疤的周围有一圈黑色，好像烫伤的痕迹，这是阳光的威力，给人留下的纪念。肩头被扁担磨破，同样是白红黑的变换，并且变成粗糙的硬块隆起在肩上，这就是改造政策

让人重获“新生”的实例。凡被劳改必然有此经历，任你是铁打的汉子，也会变得像偎灶猫、落汤鸡。被晒红了的背，痛得似火燎，水泡破了只能侧身而卧，再加上食少缺觉，也就是一个来月的工夫，他们就成了又瘦又黑又脏的瘪三，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英武气概了，这就是所谓的脱胎换骨吧。干得再辛苦，实际上等于是无偿劳动。谈不上报酬，不过按劳力等级每月给两毛、一元的零用钱。刑满就业后才可以拿到 16-25 元的工资。

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在这个改造政策下，出现的悲惨事例实在太多，仅举几个我亲自目睹，有代表性的真人真事作为后世见证。

黄英，一个失败的投机者

白湖劳农场于 1960 年从安徽蚌埠市监狱调来一批受加刑处分的重刑犯。湖心的老圈子五大队原是重刑犯集中的所在，刑期在十五年以上至无期、死缓的人都解送到这里。黄英身材短壮，其貌不扬，平扁的黄脸，左颊鼻嘴之间有一条寸来长的疤痕。他为人很随和，但见识很广。他和一个姓熊的老年犯一起，在大队的发电房劳役。老熊看来已逾花甲，原来是上海美商电灯公司的工程师，留美生，1956 年调合肥电厂任职，58 年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那时老熊以工程师的资历来负责用一台使用了数十年的美制旧电机，发电供应一千个灯头使用，真叫做大材小用了！黄英当时就是老熊的助手，听从老师指挥，干着竖杆、架线、敷设、安装工作。那时我正在圈沟边小草棚居住，为养练队犯人洗衣，就便请黄英接一条线安个灯头照明。这是难友中的私交，接触后以乡音联络了感情，彼此没有距离。好在小单位与大工棚分

管，不受中队干部约束，晚间不用参加小组学习，黄英借口查线常来闲聊一气。

早先我听说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很野蛮，经常吃生鱼活蛇，当时消耗大的人饿极了，什么都敢吃，也就不以为怪。据说这人是无心无肺的傻人，直向人说他妈妈是娼妓，妹妹是舞女，自己是日本特务生的野小子。可是从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了他的真实底细。原来他母亲是上海某轮船公司一位黄姓高级职员的小妾，出身于青楼，从良后随黄某生下黄英和他的妹妹。日本投降，在胜利后的繁荣景况下，他母亲带了艳丽如花的妹妹到武汉另谋出路，因为她不耐黄家的重重约束。于是妹妹就在武汉白猫舞厅当舞女，不久就嫁给带领她的大班。武汉被共军占领后，由大班带领母女转投香港谋生。而在上海的黄英，被当时倒向共产党的热潮所驱使，投靠了解放军通讯兵学校，在南京受训练。入学后在一次交心甩包袱运动中，他编造了自己的历史来交代，以期取宠于校方，博得另眼相待。故而将自己说成是妓女生的，所谓“母亲是娼妓，妹妹是舞女”，自己是日本高级特务生的私生子，是下层的苦人儿。不料，弄巧成拙，共产对他的出身，不仅不同情，反而追查他的日本特务关系。这一下正抓到他的要害，捏造的谎言经不起盘查，结果根据他编造的历史，定了一个伪造历史，欺骗政府的罪名，判刑五年，成了当时通讯兵学校的奇闻。南京军事法庭将他解送到蚌埠鞋厂劳改。期间，他多次上诉，仰仗自己是旧社会中的被压迫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向司法界大吵大闹，因而带铐带镣，迭次加刑，直到判以死刑，最后熬不过高压才被制服。后来又从死刑改判为十五年徒刑。

黄英在狱中一段时间后，仍然不死心，打算重新提出申诉。于是他首先向好心肠的指导员陈述实情，得到他的同情，认为当时量刑过重，愿意帮助黄英上诉。经过两年的周折，终于得到新的

结论：“维持原判”。可是从 1950 年到 62 年，黄英已在狱中颠沛了十三年，比原判的五年，过期八年。按照中共的刑法规定，多服刑期应予以补偿，而监狱惯例，凡逾期部分，工资以每月十八元计算，按月扣除生活费用十二元，尚余六元，八年超期应补发工资五百七十六元。这一点点的以人身自由换来的血汗工资，经黄英无数次申请，当局还互相推诿，一文不发，黄英白白被奴役了八年。

黄英留场就业，成为农工，终身为奴。他被分配在西大圩七大队十一中队，那里是清一色的刑满不放的所谓职工，实质与犯人一样，所不同的是有 17-25 元一月的工资。职工伙房有鱼、肉、蛋等荤菜，想吃就买。除了农忙以外，每月有两天休息。一年有一次为期十五天的探亲假，但是所有劳作都比劳改犯紧张得多。假期休息也不得越出警戒线，仍是与民间绝对隔绝。

1962 年的某天，他乘休假来劳改队看我，主要为了棉衣。当了职工，衣食都要自理，他的体力只值 20 元，每月拿 20 元工资，除去伙食费所剩无数，买不起棉衣，因此要我偷偷为他弄件棉衣，否则无法过冬。于是我就将自己领的新棉袄加工，利用我洗衣并修补棉衣的方便，给了他一件新棉袄。

63 年刚过了春节，星期天的早晨，黄英来到我的小草棚，兴致勃勃地取出一张相片。漂亮的画面使我眼睛一亮，一位端庄秀丽的女郎，真像巴尔扎克小说《伪装的爱情》中的那位女主人。她身后站着一对男儿童，座前立着一个十分可爱的碧眼金发女孩。黄英指着相片介绍，端坐的就是他的妹妹，现在她嫁给一个英国人，生了这个混血女孩，站在妹妹身后的一男一女是同前夫生的。又说，妹妹与上海的父亲通信，得知他的下落。此次从香港寄来二百元和一个邮包，几件羊毛衫，衬衣和西裤，花式鲜艳，在这里不适合。说着敞开棉衣露出里面款式新颖的羊毛衣。我连连向

他祝贺，总算苦尽甘来。无奈当局禁止与海外联系，连这 200 元和要缴进口税的包裹里的衣服也扣下大部分！从此也就断了亲情。

1975 年，我也刑满就业，恰巧与黄英同一大队。一次星期假日在大队的会议场相遇，他已变成情绪纷乱的堕落者，酗酒、赌博、偷窃、冷酷无情，像换了一个人，老了许多，又黑又瘦，脸上那条疤痕更明显了！

阮东风：被斗垮的共产党员

阮东风是个共党内部的极左分子，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思想倾向了！他出身于皖北的一个富农家庭，受过初中教育后就投奔新四军，从红小鬼干起，文书、干事、排连长直到副团级。他是在肃反中被淘汰的中级干部，原因是隐瞒家庭成份，结果以包庇地主罪被判五年徒刑。

对这个判断，他不服，大闹法庭，说他对革命有功，声言父亲被错划为地主。他原是富裕中农，进监后继续上诉，指责法庭对他报复，抗拒改造，直闹到高等法院大骂审判员，激怒了司法人员，将他吊在旗杆上示众。他受刑不过，只得承认自己恃功闹事，无理上诉。结果被加刑十五年，合并为二十年徒刑，解送白湖农场改造，编在湖心的重刑大队。这人是五短身材，略肥胖，口齿伶俐，善于宣传党八股，滔滔不绝。

阮东风被编在湖心大队一队，这个队的管教干事刘德钦是个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个曾是极左的抗改分子十分厌烦。那时正逢西大堤工程开始，以阮东风的年龄和体力必须参加挑堤，天未明起身，一瓢稀粥，喝完就得背上饭具列队出工。他的担子里，不让执锹的多上土，多了他就踢掉，簸箕里头只有十来斤土，挑在肩上直晃悠。他踱着八方步，经常表露出抗拒态度。在当时，甲等

劳力挑运四方土，乙等三方，丙等二方。一方土约两千斤，每担从堤下到堤面要行 100-150 公尺的陡坡，大力的每担挑 100-150 斤。唯有阮东风敢于抗拒，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出他的顽固不服。这自然触怒了干部，亲自为他上锹，一头一大锹，少说一担也有百多斤。这百来斤的担子本来是普通重量，可是阮东风哪里吃得消，勉强应付两担之后就躺在地上耍死狗，嘴里哼着喊着，鼻涕眼泪抹了一脸，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儿。干部叫犯医来检查，结果认定他无伤无病。接着强迫他继续挑土，他不服从，依旧躺在地上哼。干部就将他绑在凉棚的木椿上，并将一担大土放在他肩上。这一百多斤的重担果然厉害，他很快就大汗淋漓，脸无人色，拖着长长鼻涕，头歪到肩上，看上去已了无生气。干部厉声问道：“阮东风，你还抗不抗？认了罪，我就放你。”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再也不敢了，毙了我吧！”

第二天他不起身，小组长递给他白粥，他吃了又躺下。干事严斥说：“吃了饭不出工，天下没这等好事，要你当老太爷来啦。”阮东风连连央告：“我确实全身无力，站起来都颤抖，让我在队里休息吧！”说着就坐在地上。干事叫了两个力大的，用簸箕将阮东风抬上工地，他依然躺在地上不动。到了中午趁干部回家吃饭，所有人都在分饭之际，他就溜回工棚睡觉。刘干事下午查工棚，见阮东风偷溜回来，就叫他写检查。不料他竟写了一份控诉刘干事不按政策办事的报告，并叙述他对革命有功，法院错判，要刘干事以对待儿子的心肠宽待一个受屈辱的革命者，停止虐待，否则不符合党的政策。他另加一笔，大骂刘干事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打击和虐待革命同志。

阮东风的大胆对抗，激怒了刘干事。他咬着牙，手指阮东风：“你是反革命罪犯，革命阵营里没有你这种败类。”于是亲自将阮东风按倒，反手背绑悬吊在屋樑上，从下午四时吊起，足足一

个多小时。反绑着，手腕被悬空吊起，这是会引起脱臼的剧烈痛苦的。阮东风先是大喊大骂，不久就声嘶力竭，汗流满面。剧烈的痛楚，使他几乎晕厥，只得连连叫饶。放绑后，他的这双手已成残废，腕部软软的没有握力，只能作为病号待在工棚里，吃病号饭。一日两顿稀粥，三两米一顿，只有搪瓷碗一碗，填不饱肚子。他要求干轻活，如在大埂拾稻穗，摘绿豆、碗豆等，有机会走到圈外。我每天都看到阮东风和一些病号在埂上捕捉蚱蜢吃，也有人在猪槽伸手捞猪食向嘴里送，仿佛吃得津津有味。猪食的馊臭味令人恶心，肮脏得与粪便何异？有人劝阻他，可他竟瞪眼反斥：“你知道什么，你吃得饱饱的怎知饥人的苦，如果饿你几天，恐怕你连屎都要吞了！”

这个曾誓言要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彻底进行革命的志士，对毛泽东奉若神明，好歹也爬到团级，当过干部，如今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党的尊严似乎也随着落入猪圈了。

吴宗衍：典型的孝子

这是一名不满二十岁的少年犯，瘦削的身材，白净的面皮，一股斯文的模样，见他挑一担粪水摇摇晃晃的，就知道他对农活难以胜任。九队的王干事知道他是个大学生的，有意要他担任菜园组的学习组长兼记录员。不料这个倔强的少年一口回绝说：“我不会记录，不会主持学习，还是让我锻炼锻炼体力吧！”无论王干事怎样说，他都坚持不干，弄得狱吏下不了台，勃然大怒，勒令他下跪，他不肯。王干事近前猛踢几脚将他打翻在地，铐上反铐。凡受反铐的人既不能自己进食，又不能躺卧，大小便都要别人帮助。当时我在做打绳劳役，天天在菜园组院子里，有机会帮助他，因此了解他的为人和身世。

吴宗衍是上海市著名的十二小画家之一，天赋艺才，擅长讽刺漫画，连载于报刊，如讽刺官僚作风、贪污丑行、邪恶风气，这些作品针贬社会，无不击中要害，加之嘲讽诙谐，趣味横生。他的构思巧妙，笔触线条洒脱，观之令人捧腹，更能一解心中怨气。入狱前他攻读于杭州艺专，因写血书代父伸冤被判十年徒刑。乃父是前嘉兴县一家报社的主编，因是国民党的新闻工作者，被打为反动文人，判刑七年，解往东北劳改。吴宗衍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位清白之士，出于孝道挺身而出写了血书诉状为父伸冤，不料中共竟指为包庇反革命，对抗政府，将其逮捕，判刑十年。这样一个有才气和勇气的孝子，就成为现行反革命，他的一生也被摧毁了。

他不愿做学习组长，原因在于不欲做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不肯做违背良心的事。狱吏命他写检查，他仍然不屈服，坚持不写。我在一旁暗暗替他着急，怕他会吃大苦头。因此跟他商量了之后就代他捉刀，替他写了份检查反省，递给王干事说，是吴宗衍口述，我代写的。这样敷衍了过去，狱吏就给他开了反铐。从此他也懂得厉害，不再硬抗，应承了做记录员的工作，也为墙报画了一些刊头插画。其实，只要自己不存整人的心思，学习记录无非将难友每晚学习时的发言，扼要地摘选，并添上几句好话，也就行了。

记得有一次吴宗衍为了帮助一个将刑满出监的人，偷闲画了一系列漫画，大约有三十多幅赠送给他。我得机欣赏了全部，这些漫画非常生动有趣，带有含蓄的讽刺意义，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品。他对那个将出监的青年说，你出去没有钱寸步难行，可以拿这些画以你的名义投稿，我深信至少可以得数十元的稿酬，足够你往返上海。在探望你的家人之后，抽空到我家看望我的母亲和妹妹，告诉他们我很好，不要担心。

那时我已年近五十，不再有青年人的冲动，内心与青年人不但没有距离，而且跟他们相处融洽无间。他们的秘密，从不躲避我，他们用肥皂刻公章，三五密谈，我见了只当未见。逐渐地我知道他们有了组织，为首的是那个曾是“国家省级篮球评判”的体育教师。

狱吏虽然监视很严，而且犯人的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在有限的空间里再加上严密的岗哨、围墙、电网、围沟等重重障碍，犯人可说插翅难飞。不过即使最小的空隙，还是有机可乘。他们的计划竟是野心勃勃的暴动，夺取武器，冲出樊笼，进入山区，发展武装，到处打游击。他们利用赛球的机会，进行大队与大队间的活动（监内曾一度提倡体育运动，标榜文明监狱制度），吸收一些青年练习篮球，借此秘密组织暴动伙伴。可惜他们中没有秘密组织的经验，竟像帮派会团那样歃血为盟，效仿起义的方式，激发牺牲精神，结果被人窥破秘密，检举出卖，遭致一网打尽。

1967年在老圈子的湖心大队九队，处于文革高潮过后的整肃阶段。老圈子里，新设了一排临时监房，用木桩代替铁栅，每间开一小窗，由几个刑满的职工看守，带有神秘色彩，不准犯人行近。这个警戒圈，每次送去的饭菜要比劳改队的好得多，好似干部伙食，这表明关押的是干部。就在这时，我从湖心调到新圈子的养练队做缝纫活。那里没有老圈子那样森严，没有电网，也没有围沟，于南北开两面大门，只有一个班看守，驻地南门外的兵舍里与干部办公室相连。北门外的西侧有一排六间瓦屋，坐北朝南，东边两间是木工和缝纫工房，两面四间堆席草，一间职工宿舍。养练队有打蓆组、打绳组、运输组、农田菜园组，主要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犯人，他们被利用起来，做织蓆，搓麻线打草绳，编草帽、草垫、草包、枕蓆等，除了卧铺不起的犯人外，全都要参加劳动。

白湖的生产指挥部规定每个农业队都必须划出 40 亩水田种植芦苇，收割后集中在二大队养练队，供应制作凉蓆和草帽的需要，因此安徽合肥市出现了大批与浙江温州蓆制品媲美的草蓆、枕蓆和手编草帽。这些产品既好又便宜，在社会上受到顾客的欢迎。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精美的手工作品竟出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的手。这些东西，都是老弱病残的囚犯，带着病体，坐在土炕边上，用双手一根一根编织出来的。监狱仅以喂养猪狗的代价，就生产了市场上的抢手商品，赚取了大宗的利润。这些精美商品的背后隐藏着对奴隶们的残酷剥削，谁会想到这些呢。这些奴隶当中，也包括了朱树德神父和李静涵教授。

1969 年的春天，大埂上的树已经长成，能遮住阳光，树上的嫩叶和地面绿草相映，一阵阵清香里夹杂着吱吱喳喳的鸟语，我偷闲站在阴处，欣赏着大自然的浓情蜜意不舍离去。正出神时，忽见远处走来几个人，定睛远眺，惊见来的是吴宗衍，他带着手铐，被两个武警押解行近。他面色苍白，瘦了许多，见到我使了个眼色，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毫无表情地望着他走去，暗忖必是事泄被捕押解场部。这瞬间，只有眼目传意，默默无言。待他走远了，不禁长叹一声，凄然泪下，良久不能平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如今想来，那次与这可爱可敬的青年是最后一面了！

黎美宪：唯一飞出去的鸟儿¹

1960 年的秋天，我调在集训队已有半年了。这个队原是将全大队的重刑犯和受加刑处分或逃跑过的危险分子集中起来，给予从严管束的地方。这里另辟一所小院，有职工守门，不准单独行动。

¹ 为了尊重这位女老师的隐私，此处用了假名。

此处共有二百来人，有六十多副大镣，出工时一片朗朗镣声，令人心惊胆战。有一个班的武警持着冲锋枪压队，劳动时两挺枪对着现场，如临大敌，这是监狱设立的牢中之牢。每期六个月，在从严中，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绝对不准单独行动。吃饭以小组为单位，团团席地围坐，每人一个瓦盆，以同量的米、菜、盐、水放在瓦盆里，伙房用四方的木蒸格蒸熟，由炊事犯送到小院内，由小组长带领全组按次领取，然后全组围成一圈就地坐下进食。那时定粮是二十斤，只能供两餐一干一稀，不能果腹，没有油荤，每日只有挨饿，肚中的辘辘声终日不停息。

在这严厉的监管下，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的压制。集训队发动了一次精神袭击，狱方授使其他队犯，检举集训犯人的罪恶，无论监内监外的言行都可揭发。于是大量的大字报集中火力对着集训犯人，而犯人之间也可互相面对面检举。当时集训队的小内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随后天天晚上开斗争会，逐个逐个地斗。被斗者任凭众人动手推搡，动口辱骂，不可抗拒，只有低头弯腰趴在地上认罪。挨打挨骂，精神濒临崩溃。这个阶段，每人都面无人色，晚上挨斗，白天劳累，弄得像刚从阴间走出来的鬼，个个蓬头垢面，虚弱无力，精神恍惚。用猫捉老鼠来比喻这种手段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猫捕到鼠在吞食前，往往要玩弄一翻，犯人像猫爪下的老鼠，在锐齿利爪下，魂不附体地颤抖，死与活根本不由自主。一旦被玩够了，猫口一张，接之而来的即是粉身碎骨。大部分人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故而尽管大字报上写满了人名和耸人听闻的罪行，反正是笼中之物，索性一动不动，听任摆弄。这样一来，反而没有出现领导们预期的热烈效果。

集训队由姓张的大队管理员掌管，这人比较讲现实，给人较温和的印象。当集训时期结束以后，由他将所有集训犯人分配到各

队。我因为懂得缝纫，就叫我到大队裁缝铺工作。这时我的心情有如由污水坑爬出，蹲到清水潺潺流过的树荫下纳凉那样舒畅。这个裁缝铺只有两部脚踏的缝纫机和一块长案板，非常简陋。里面原有一个刑满就业的青年职工，和一个名叫洪盛余的手工裁缝。洪某是历史犯，判刑七年，曾是卫立煌公馆的长工裁缝，合肥籍。此人为人险诈，曾对我故意刁难。他先是检举青年职工，说那职工与某干部有私情，隐藏祸心。我发觉后主动请调，离开这个在劳改场还算优越的环境。不过我前后在此仍然约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我认识了女劳教犯黎美宪。

这裁缝铺位于圈外的干部家属区。区内有一座干部食堂和六排砖墙草屋的干部宿舍，有近百户人家。最后一排是所小学和大队供应站和裁缝铺，横头南向的几排是大队仓库。小学只有一位教师，由女劳教罗萍担任，苏州籍，能讲普通话，约二十八岁。小学生知道她是劳教人员，都不服从。三、四十个顽童，聚在一间大教室里，显得很宽敞。

罗萍梳二条长辫，一望就知道是城市女性。这位圆脸略带肥胖的教师很严肃，从来看不到她的笑容。她缺少女性特有的温柔，老是绷着脸向小学生叫喊安静，可是孩子们总是嘻嘻哈哈吵闹不休，于是她就用教鞭连连猛拍讲桌，以镇住喧闹。在上课之前，她手摇着上堂铃，从前面走到屋后，好像在赶小猪，赶着顽童们进教室。这之后，总要纠缠个半小时，课室始能安静。罗萍的嗓门尖锐，扯着嗓门教课，依然压不住学童的嘈杂，有时她也会被这般顽童闹得哭起来。她以罪犯身份，既当校长，又当教员，还兼杂役，整日没有空闲时间。下课之后，学生竟边走边骂老师是劳改犯。有次，一个十一二岁的顽童，书背不出来，罗萍罚他“立壁角”。这孩子竟骂道：“劳改犯，没资格罚我，我不站！”罗萍就去拖他，不料这顽童竟大喊劳改犯打人，奔出教室向他父母

哭诉，硬要他老子处罚罗萍。孩子的妈更不讲理，领着孩子责问罗萍：“政府叫你来教书的，不是叫你来打孩子。”这一闹，气得罗萍病了几天，没有上课。此事引起大队长的注意，就向场部女队调来黎美宪，并向学生宣布调来一位“人民老师”，这才镇住这些顽童。

那天的上午，黎美宪挑着一副高担，犹如行僧，一头一个包裹行李，上任来了。她黄黄的脸色，外穿一件米色卡其雨衣，有一股女学士气派。不过她那干枯蓬乱而稍带黄色的头发，很随便地用橡皮筋拢了个发盘，却泄漏出干了沉重农活的迹象。她从裁缝铺门前走过，行向小学，放下担子就向罗萍说明来意。罗萍欣喜地带她去见大队的女干部，然后女干部领她来到供应站的方会计那里，领了干部食堂的十二元饭菜票。在当时的情况，这十二元饭菜票，相当于社会上一个科级干部的待遇，这对劳教身份的黎美宪来说，好似农村姑娘嫁给了城里的小开那样高兴。女干部又从大队仓库里取来一块旧的白被里，偕同黎美宪来到裁缝铺为她缝制两套衬衣短裤，就这样彼此相识了。

小学生们当她是人民教师，恭而敬之，旁者都知道她和罗萍一样是犯人中的幸运儿，享受特殊待遇的伙食。由于她急着穿，两套衬衣短裤在两小时中就制成了。正在烫熨的时候，她走来取衣，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做得真快，谢谢。”我以上海话答道：“勿要谢。”她听了很惊讶说：“侬上海人？侬哪能会做裁缝？看侬不像哩。”我回说：“我现在做着裁缝，怎么说我不像？”她随即问：“你判几年？”我答：“二十年。”她呀了一声，对我伸了伸舌头：“这么长，你怎么挨啊！”我说：“慢慢熬呗！”这样长的刑期使她意识到我是个反字号的重刑犯。她的眼神里，表露出同情和惋惜。自此她每天买饭经过门前，看没有人就给我两馒头。在那时，这种白麦馒头，犯人只有在梦中才见得到。

自从黎美宪来到小学之后，学校的气氛完全变了。学生们秩序井然，他们对上课的铃声已能服从，不必老师拉开嗓门大声吼叫了。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即使仍在喧叫，黎美宪似小铜铃的声音，一句“不要讲话！”全室立刻鸦雀无声。以前那种喧闹不休的情况遂逐渐消失。黎美宪对工作和生活似乎感到相当满足，经常显露出愉快的神态。有一天假日，一排小学的课室，空荡荡静悄悄，教室门前一群麻雀在叽叽喳喳觅食，前排眷属宿舍的后窗透出妇孺的低语。不久，这清晨的宁静竟被黎美宪的歌声所冲破。她先是细声哼唱一些40年代的流行歌曲，然后又引吭高歌，敞开嗓子唱起黄梅调来，模仿严凤英的天仙配《路遇》一段，唱得十分动人，她的纯真情怀表露无疑，闻之令人暂时忘却内心的凄凉和沉郁。罗萍大声阻止她说：“你疯啦，怎么这样高兴！”黎美宪答称：“我散散心里的闷气，让我开心开心不好吗？”罗萍又说：“你呀！小心前面的家属说你放荡，影响你的名誉。”

我一面工作，一面沉思着。黎美宪是个外向的女性，性格爽朗，现实环境的压抑使得她不得不摆出安静老成的样子，其实活泼、浪漫才是她的本质。一开了头，她就经常敞开了喉咙唱黄梅调、京戏，无拘无束，毫无禁忌。然而年轻女性这样的自我表露是很容易节外生枝的。先是在管理人员的家属中们传开，这位女教师在以歌声卖弄风情哩。这些闲言闲语一经传出，她就成为众魔猎艳的目标。

62年初，我自老圈子调到大堤畔的五队，这儿距大队有七八里，单独生产棉花、大豆、山芋、甘蔗等旱作物。在队里，我仍然独自在伙房旁的小草屋里为全队的犯人洗衣，也兼洗干部和家属的衣被，在劳改队来说是份好差，也算得特殊。管教队副姓周，是个读书人，写得一笔在干部中称得上好的毛笔字，看来是知识家庭出身。他的妻子却是农村妇女，初生了婴儿，以抚育子女、服

待丈夫为己任。不久周队副调走，调升为大队的小学校长。大队生产发展后增加许多设施，家属区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黎美宪所在的小学，不仅新建了校舍，教室也引进城市化的设备，成为标准小学，新聘了好几位女教师，其中有大队长的女儿，竟然初中程度也在这小学执教，周队副就是这所小学的第一任校长。

劳改犯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小组，绝对不容许脱离小组，很少能知道小组以外的消息，可是单独居住的小单位，皆住于队外的小草屋，恰似农村的看管瓜果所搭建的草棚。五队处于大堤旁的十字路口，大队以外的运输犯和干部职工往返场部都要从五队门前经过，有时在伙房和我住的小草棚外面坐下歇歇，喝口水闲聊一气。本队放羊的杨瘸子，赶着二十来头羊，在大堤上围河边遛达，无论干部、军人职工，甚而一些渡河过来的男女老少，都从他身旁经过，他有机会得与行人闲聊，无形中成了传递消息的话筒子。

社会上称做桃色事件，在监狱应该叫做奸污丑闻，与其说是有伤风化，不如列为仗权强奸，凌辱女犯。一大队的干部食堂，位于眷属区的中心，四面有供应站、小学、拖拉机站、米厂、仓库、干部家属宿舍等，食堂的炊事人员都是劳改犯人。晚餐后熄了灯，坐在食堂守夜的劳改犯人可以观察到四周的一切，而外界只当里面没有人。

某个夏日的夜晚，眷属区放电影，在食堂南面的空地上竖起银幕。八时许就见大人小孩搬着凳椅排满场子，不多久已坐满了，放映开始。食堂东面的小学教师宿舍，黎美宪老师房里还亮着灯，外面夜色茫茫，从玻璃窗可以清晰地看到室内的黎老师。此时，周校长只穿汗衫短裤，手摇芭蕉扇，足登木屐从眷属宿舍走来，行至黎老师门前，环顾四周无人，乘着夜幕掩身推门入了黎老师的房，接着闭门熄灯。这一切都展现在干部食堂一个值班炊事犯

的眼里。这类劳改犯人都知道尽忠职守，所谓劳改进伙房，犹如上天堂，何况进的是干部食堂，所见所闻怎敢泄露半点，弄不好要下小组劳动，甚而加刑。然而一旦老难友相遇，总要互吐心底，谈谈不可公开的秘密。

养练队的菜园，有一处专为看管桃园的小草棚，位于老圈子的围墙脚下，是处人迹稀少的幽静角落。有一天的黄昏，养练队的老张队长，拎着一个蓆草编的提包，走来与看园的老犯人闲聊。进入草棚就从提包取出酒菜放在小桌上，并说要在这里饮酒赏花，给他在外面望着点儿，别让闲人进来。看园的老余头唯唯喏喏，躬身向他应诺。老张队长边说边走了出来，站在桃树林里四面张望，老犯人遵命行事，真的就走到圈外的小径上为队长放哨了，东张西望，表现得忠心耿耿。其实这饮酒赏花竟是与女人幽会的代名词。

三月盛开的桃花，在夕阳下相映争艳，绯色的光彩照得人似痴似醉。张队长满堆绉纹的老脸竟也发了红光。此时，只见小径的远处出现一位穿着整齐，颇为洒脱秀丽的女眷，缓缓行来。老犯人正要阻止，老张队长却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招呼：“黎老师，这里桃花盛开，多么有趣，来这儿坐坐赏花。”说着已走拢去，迎面后又并肩走回来，进了小棚。夕阳渐渐消失，剩下静悄悄漆黑的一片，唯有草棚的小窗射出淡黄的斗大光亮，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老土八路张队长年老气衰，得了肾病，发现尿中带血，以此提出了与老妻离婚，住进医院治疗。出院后竟然向潘大队长请求要娶黎美宪。大队长指责他的没有阶级立场的荒唐要求，并拍桌大骂一场。接着黎美宪被调离小学，转到场部卫生院当护士。于是这件“求婚案”不脛而走，传遍了全大队，唯有桃园幽会却无人知晓。

1969年，安徽洪水泛滥，整个白湖除场部外都浸于洪水中，淹没了所有房屋和庄稼存粮，人畜禽都迁移到大埂。干部家属悉数避洪，先期迁入场部各部门，犯人则不准出圩埂，栖于圈埂的临时油布篷里。省军区派了巡逻艇环湖监视犯人，封锁航道。周围农村的老百姓“乘洪打劫”，数不清的小木舟，由一些青轻力壮的小伙子驾着游弋，在被洪水淹没的圩内打捞被水淹没的粮食和财物，乱得像洪荒兵变。谁的水性好力气大，谁就获利。军中架起高音喇叭在大桥上向农民广播：“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你们是革命的好农民，你们要救死扶伤，圩里是全民的财富，打捞上来要交给农场，不可据为私有。”尽管大喇叭叫得震天响，可湖面上的小木舟穿梭往来不息，打捞上来的粮食就往村子里搬。干部出面阻拦，却挨了揍。于是干部就指派刑满留场的职工与农民争夺，竟遭到农民的围攻，并且打死了一个职工，因此职工不敢再阻拦，最后还是叫犯人出来阻止。很奇怪，这些农民一见犯人，就不再蛮干，乖乖地将肩上的粮食放下，谁也不愿与犯人为难，出现了干部办不到的事，犯人给和平解决的奇迹。有一次，一群农民在大埂上围攻一个看管粮堆的老干部，男女农民边打边骂：“你这个喝劳改血的家伙，你对劳改犯欺压惯了，我们可不管你这一套，告诉你，今天是人民当家，这是老百姓的粮食，我们有权取用。”这时在粮堆的几个劳改犯上前喊道：“大哥们别打啦，打坏了我们有责任，我们不能眼看你们打干部不拉开。”这一说，真的有效，农民松了手，老干部急忙躲到劳改犯人的身后，按摩着痛处，现出一副得意的神色，停止了呼叫。

豪雨不停，圩内已水深过膝，干部已全部移往圩埂，圩内的劳改已无人管理。在最紧张的时刻，播音的大喇叭喊话了，命令尚在圩里的劳改犯人即时离开工棚集中到大埂。二大队养练队的老

弱犯此时才开始避洪，纷纷将自己带不了的行李放在铺顶的行李架上，各自穿着随身衣服背起饭具，逃离圩心。倾盆大雨泻向地面，犯人只有草帽能遮住头，身上的棉衣已被雨水淋透，待走近大埂已成了落汤鸡，蜷缩在大埂的油布篷下，冻得脸发紫直打哆嗦，脱下棉袄挤去了雨水又穿上。眼看大堤多处渗水有决堤的危险，白湖四周的农民拥到场部要求炸堤泄洪，否则圈堤外的农村将被淹没。众情激昂，迫使省委不得不作出炸堤决定。隆隆巨响，西大圩堤埂炸出个巨大缺口，泄泻了滔滔洪水，约一小时圩内洪水漫过屋顶，恢复原来的一片汪洋。农民藉机抢粮食，军队无法阻挡。那时上空飞来一架直升机，徐徐降落在场部广场，大家都以为送来了救济品，后来才知道是省委李德生前来视察灾情。

七天后雨过天晴，可是白湖的水势依然严重，因为长江的水位高过历史纪录，白湖的洪水退不下去。虽然天空阳光普照，而圩内仍是白浪滔滔，劳改犯人像小鸟回不了窝，大堤成了临时栖息地。豪雨使白湖农场损失了大批公粮，而周围的农民却因雨获食。

劳改犯人像淋湿毛的鸟儿，一群群张着翅膀在堤埂晒羽毛，等待飞回巢中。多年来建造的房舍，全部浸在水中，要等长江水位降低，白湖泄洪，劳改犯始可回归旧室，有些还得重新修筑。我夹在回不了巢的鸟儿里，暂栖在临时搭起的堤边草棚里，修补全队的冬衣，属于老张队长管辖。张队长住在卫生院的宿舍里，那里有众多的职工，医生、护士、杂役、男男女女很忙碌。洪水冲击后，行政陷于瘫痪，场部出现无政府主义状态，陡增了自由气氛。张队长原是在卫生院治疗肾病，就便看管队里留在大堤的犯人，所以这段时间不时走来我们住的草棚，明为监管，实则聊天。他根本不过问工作，堤埂上有两个组约二十多人，担任挑土加高大堤工程。我们三人做修补棉衣工作，其中有一个年轻瘸腿犯人小陈，原是淮南市一家服装铺的缝纫工，脸庞圆圆白净，给人

以稚气的感觉。他因写反动词句，判刑七年，初中文化，平常爱说笑，讲些油嘴滑舌的俏皮话。他心地善良，当时才二十岁，判刑时十八岁。

从8月发水以来，在大堤上逗留了三个多月了，张队长在闲话中多次眉飞色舞地提到黎美宪，十分陶醉。老队长比起我至少长十岁，高大的个头，天生一头卷发，一副侏子相貌，脸上的油亮掩不住许多皱纹，倒是尚有点爽朗豪气。他也带有三分流气，易于翻脸。他很想从我口中知道外界对黎美宪的评价，我提到他心爱的人多才多艺、聪明大方，他会拍着大腿说我有眼光。谈近了就不以犯人看待，缩小了彼此的距离，甚而叫我慢慢做，以延长在大堤的时间。

李宗仁夫妇回到中国的消息，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监狱藉此向犯人宣传共产党的伟大，而犯人对此毫无兴趣。大家意识到，即使国民党全部瓦解投降，监狱里的反革命犯，依旧是奴中奴，根本改变不了悲惨的地位。倒是一件监狱的奇闻，成了二大队犯人中私下谈论的话题。就在李宗仁出现在报纸上的那年秋天，黎美宪在卫生院接到通知，叫她去北京，李宗仁要召见她。据说黎美宪的父亲乃台湾国民党的立委，现在美国任教授，与李宗仁交厚，委托他在大陆寻找女儿。白湖农场特为黎美宪制做了新装，并资助路费去南京搭机前往北京见李宗仁。黎美宪去北京不久，卫生院的女护士接获黎美宪自香港寄来平安到达香港的佳音，说即将前往美国。这件新奇的消息，成了全场犯人传说的中心话题，大家将黎美宪引为中国的唯一幸运儿。

这件事说来奇妙，黎美宪不仅对我熟悉，而且与我离婚的妻子也有一面之交。1962年7月，妻子到白湖向我提出离婚时，就在二大队小学见过她。后来黎美宪在老围子见到我，曾说起当时与离妻交谈的情形。她曾拿我为她做的衬衣给离妻看，引起妻子流

泪。她本想将那件衬衣赠给离妻为纪念，无奈衬衣已破旧，因此作罢。又说离妻曾叮嘱她转告我，自从我入狱后，八岁的女儿曾搬着小凳子坐在我家对面的分局门口哭着要等爸爸出来。离开劳改场已有近卅年的今天，黎美宪、我的女儿、离了婚的妻子，以及我本人，都先后到了美国定居。

四个自缢身亡的含冤人

从老围子调到堤边五队的 1962 年，年终评比时，我被并在菜园组学习。这个组有个专管绿化的劳改犯叫王振亚，合肥人，原是安徽省园艺专科生，是合肥市逍遥津公园的技术员，因贪污入监，是个妄自尊大的人物，常争取立功。其间恰好有个姓翟的老年犯，独自住于菜园东端近排水站的小棚里，为人忠厚可靠，因信一贯道被判十五年徒刑。他在评比中很少发言，不料发言时因传统思想较深，将王光美比喻为娘娘，尊其高贵，这就被王振亚抓住小辫子，指为将国家领导人的爱人，说成封建帝王的皇后，这是对当今领导的污蔑，应作深刻交代。在总评关头，王振亚一口咬定不放，别人也无法代为辩解，这一手竟逼得这老实人结结巴巴，说不上理由为自己解脱，急得流出泪来，连连说：“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无心说的。”

通常年总评比在晚间进行两小时，最迟到九点半就得散会，王振亚不放翟过关，一直要追到底，挖出反动根。这几句话竟成了催命咒。翌日清晨，猪棚的劳改犯起身到伙房打饭，经过翟老头的小草棚，惊见老翟悬空吊在露出棚外的木上，不禁大叫吊人啦，吊人啦。喊声惊动了干部和邻近的劳改指导员，带着两个劳改犯走近察看，翟老头的尸体已经硬了。他们将他放下，只见他双眼

突出张着口，口鼻均有血渍，形状可怜，指导员吩咐取下那扇木门，以他的棉被包起尸体，用门板抬到青山埋了！

就在上述事发生不久的一个夜晚，五队毛厕后的雨棚下又吊死一个劳改犯人，据传言是因为他的独子因母亲改嫁而投河自尽，死时才十四岁。接获这消息后他就不进饮食，那晚在毛厕里哭了一场，在半夜无人处上吊自杀。次日挑粪的菜园劳改犯人发现，干部叫不许声张外传，叫小组派人用一张草蓆将尸体裹了用板车拉到青山埋掉！

跟着在本队院子里一颗树上又吊死个姓吴的老人，此老也是个军人，曾为黄埔五期生。在抗战前曾任团管区司令，在合肥人称他吴司令。他的自杀是为了他的侧室向他提出离婚，故而厌世，死时已近古稀。这一连串的自杀案，发生在年关岁尾，给犯人不祥之兆，暗中传说纷纷，以为冤魂找替身，搞得人人不安，对照自己各自悲伤。

正处于愁苦凄情中，又传来隔邻剧团的不幸消息。一位扮演七品芝麻官及陈公道解差的丑角吊死在那里，死后棺材就埋在与五队交界的空地里，一堆圆圆的黄土新坟引起路人瞩目。这人的死乃是含冤自缢。传说他姓赵，以前曾任汪伪县长，为人没有恶迹，判了十年徒刑。他爱好京剧，是个票友，所以刑满后就在剧团任职。身前有个女儿，就业后就接来白湖剧团打杂，父女共同生活。剧团里演小生的角儿，看中了他的女儿，于是竭力奉承，屡作馈赠，直至有了婚约。谁知正处于情谊高峰之际，女儿被北京的叔父邀请前往入学，以免在劳改农场误了一生。这对他父女是椿理想的幸事，可是这对那个小生演员却是莫大的打击，眼睁睁望着心爱的人离去，沮丧得失魂落魄。他由怨生恨，报复赵某，索讨以往所赠财物，继而竟指父女串通诈骗，甚至更恶毒攻击，说父女长期同床有逆伦之嫌。他在剧团发起对赵某的斗争会，逼赵作

出坦白交代。这种莫须有的指责逼得赵父走投无路，有口难辩，只得深夜在厕所悬梁自尽，落得个畏罪自杀的结局。

这位冤屈的赵职工，五队的劳改犯人台上台下都曾见过，他与队里的犯医梁栋材均为宿县同乡，曾数次偕同女儿来五队门诊室探望梁医生。

说来也真巧，是年农闲的深秋，剧团在驻地广场演出，邻近的各队都去观赏，我随队排列在最后，前面人群遮住视线，只得站立观看。忽然有双手抚着我的肩上，回头一瞧，颇为面熟，正欲启口，他却先出口：“你还认得我吗？”顿时，我听出他的声音，惊呼：“莫不是胡应功？真未想到在这里遇上你。”彼此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于是他悄悄带我到他住所，坐定后相互细细端详了一番，不禁唏嘘感叹。同班同学离校廿四年后竟在监狱相逢，能不怅然？胡已刑满就业，在剧团敲大锣。回顾自己，尚有一大截刑期，不知能否熬过。自此我常趁夜晚溜去看他，好在相距只有一里之遥，那时我在队的围沟外的工具房独居，赵职工自杀惨情是胡应功所叙。

在这不满一月之中，而且又是在一里方圆的小范围内，竟一连发生四条人命冤案。在这森严残酷的劳改农场，像只死了四只蚂蚁，事前事后了无声息，仿佛什么事没有发生！

朱树德神父

1967年的秋天，我从老围子的九队调到大队门诊室的养练队。这是因为梁队长，他计划利用这个队收割的蓆草，打成凉蓆、枕头蓆销往市场，所以调我这半吊子裁缝来试制枕蓆。在这里遇上朱树德神父。朱神父原是上海董家渡教堂的神父，曾留学西欧，获法国天主教神学院博士学位，并曾往欧非五十多个国家传教。

回国后担任上海徐汇中学教务长及震旦大学教授。龚品梅事件中，他被中共逮捕入狱，判刑廿年。兄弟七人，他是老大，除了二弟在梵蒂岗教堂任教皇秘书外，其余五个弟弟都是劳改犯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家是全黑家庭，他的老母每月要寄六个接济包给六个坐牢的儿子。

我第一次见他时是在老围子，那是 1960 年在大队门诊室尚未迁到新围子的时候。他当时已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中等身材，略见肥胖，生就一副慈祥的圆脸，一身囚衣，腰系草绳，足登草鞋，戴一副近视眼镜，令人一看就知是个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这眼镜缺掉一双脚架，被他用线绳代替套在右耳上。他在养练队的打绳组，做理麻、搓麻线的劳动。每当夜晚在大院内纳凉，就坐在小院或草墩上闲聊。我与他相识在毛厕里。通常劳改犯人都乐于在毛厕里吸烟、交谈，因为犯人只有在睡觉和大便时，是最自由的时刻，唯有毛厕里没有干部监视，臭虽然臭，却能换来片刻自由，大家都乐于号在里面。就在这臭气熏人的自由中，我遇到了他。老朱的确字不凡，囚衣虽陋，遮不住他内在的高贵气质，草窝固然寒酸，也埋没不了他那颗圣洁的心。他的上海话，乡土味很浓，给我无比的亲切感。我早闻知他是位神父，即坚定的神职人员不会放弃信仰变为无神论者。

起先，我以法西斯为话题，向他请教，接着从希特勒的独裁霸道顺而直指当今。他认为希特勒的极端霸权政策，在于对外有着狂妄的侵吞全球的野心，可对本国的统治则多少还具有西方传统中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从普遍人类的观点出发，特别是从宗教立场来看，侵犯他人就是魔鬼，因此希特勒成了魔鬼的化身，受到世人的唾弃。法西斯的涵义也就是极权主义。劳改犯人所处的现实状况，要比受希特勒涂炭最深的犹太人悲惨百倍。这番内心真诚的沟通，虽然言语不多，可是彼此心灵深处都产生了莫逆之情。

所有的劳改队不管平时做什么特定分工的劳作，农场的惯例是一到春耕夏种秋收时节，所有能够使用的人力，全部投入农忙抢工，朱树德也不例外，虽然他年事已高，身体孱弱，也依然要被指派去拔秧、拔草或拾稻穗，不到病倒不能退下。

养练队有一位好心肠的犯医名叫高辛，他以医生的善良本性，暗中为朱神父释难。他向干部建议，朱树德患着高血压和心脏病，不能过度劳累，否则会暴卒。所以朱神父得以幸免，避免了田间重活，总算能艰苦地存活下来。在囚粮减至廿一斤的时期，劳改犯人都因营养不良而瘦弱，有时连自己的躯体都无法支撑，走路行动都几乎有困难。养练队的老弱病犯和参与劳作的劳改犯人，在伙食上有明显的区别。在那饥饿的年代，场部卫生院的女护士（原先是修女）私下将卤肉、卤蛋传给大队门诊犯医，再由犯医传到我这在围子外劳作的人手里，然后带给朱神父，让他得到一些额外的食物。我们的行动都进行得小心翼翼，不致引起难友的猜疑。我总是在围外铁木工炉上煮熟，分次送给朱树德。在围外劳作的劳改犯人活动范围比较大，接触面广，监方管理相对宽松，所以我们能够在严密的监禁下，成功地传送食物。他 1973 年刑满，被分配在西圩八大队就业。我于 1976 年被中共释放，曾去八大队探望朱神父，不料恰逢他返家探亲，未得晤面。后来我在境外听到天主教的修女和教友传说，朱树德神父的胞弟奉教皇派遣，应中共邀请组团访问北方教区，并在北京发表了访问观感，表示对中共宗教政策赞赏，返回时途经上海，要求当局给予会见乃兄的机会。那次是中共首次邀梵蒂冈组团到访，在此以前的毛时期，政府视教堂为顽固敌对势力，龚品梅事件就是个例子，天主教徒受害面之广，可称史无前例。

梵蒂冈代表团在北京发表的好评是基于朱树德昆仲得以晤面的因素，代表团到了香港后就发表了揭露中共迫害宗教的消息。

这骨肉小聚竟断送了朱神父圣洁的生命。代表团返回梵蒂冈不久，大陆传出朱神父在白湖农场的死讯，教皇通谕全球教堂为朱神父举行悼念弥撒。

曾普伦之死

我见到曾普伦时，他已年过六十了，是个养练队梁队长所信任的犯人。他为人谨慎，从不多言，可是在小组讨论时的发言有条有理，显露出他的文化水准。原来他毕业于武汉大学政经系，旧学的底子很深，原籍是庐江县，他家就在离白湖只有七里路的矾山脚下。矾山因矾矿而驰名，他虽已年老体弱，但从他瘦削的脸庞，高高的鼻梁和大大的眼睛中可以辨出他少时的英俊，壮年时的精明强干。据他自己吐露，抗战期间，他曾在安徽省府担任科长，当时省府已迁至金寨，可他每年都要回家两次，与他的“有夫之妇”恋人晤面。他一生没有结婚，专一地守着这唯一的恋人。

中共建国后，他就赋闲在家，可是过去名声扬于乡里，难逃清算，1958 年被捕入狱，判刑廿年，由于是老病号，瘦得只剩皮包骨。梁队长叫他负责整理蓆草，每天带领几个老年劳改犯人干着摊晒挑选、整理、打捆、上堆蓆草等活，对工作十分认真。可体质很差，讲话没有中气。

1973 年，我在二大队十队的老弱组与曾普伦一起打草绳，组长张秉祥（原是抗日名人张阿六任上海川沙县县长时的区长）一组十八人中，就有五、七个年纪大的劳改犯人，曾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与曾普伦的死有关连的人叫金玉堂，号登科的汉奸走狗，典型败类。事情发生在 74 年夏秋的双抢季节。农闲中，曾普伦与金玉堂等五六个老年犯合在一起打草绳，金玉堂不肯出力，怕捶草，因为举起大木槌用力将稻草捶软，即使在冬天只穿单衫干这活也

会全身流汗，因此金玉堂常常伪装胃病，上门诊就诊，央求犯医准他半休，以逃避劳作。胃病可以吃软食、稀饭、面条等。可是，他怕被大家识破，所以总是当着众人故意将小纸包的药粉吞食，做出愁眉苦脸状。曾普伦看在眼里，不便揭穿，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药多吃无益。”

那家伙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矮得像小东洋。尤其让人憎恶的是，他坐在土炕上偷偷写小报告，一见干部来查工棚就活跃起来。如果正在学习，他立即报告发言，讲一套干部最爱听的马屁话，老一套的劳改经，说自己“罪大恶极，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认罪守法，积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并帮助别人，立功赎罪，努力劳动，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决不偷懒，或阳奉阴违，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坚决与坏人坏事斗争到底，全心全意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等等，十足的奴才嘴脸。在洋洋得意时，见干部听了含笑点头，更是忘乎所以，干部步出立即尾随，嘴里喊着报告，我有合理建议，请指导员审核，然后追上去咕噜一阵，递上报告。

说实在的，劳改犯已经被打入地狱十八层，生活简陋得到了原始程度，感觉上已经苦到了尽头，所受的惩罚也到了极限，谁还有这股拍马劲头呢？用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反动分子每个细胞都有反动色素，骨头都是黑的，我们共产党人的眼睛就是光，能看透你们的五脏六腑。不过，我们还是很乐意看狗咬狗的表演。”金玉堂就是被共产党称做的狗，他的卑鄙在于为争得劳动上的轻闲，不惜出卖同难人。

金玉堂每逢农忙有肉食时就紧张起来。劳改犯人在食的方面已变得像三岁儿童那样，取他一粒糖就会恼得哭起来。几十岁的大汉子由于肚皮空空，竟然对手指头大的三五丁猪肉计较得要用秤

来等分，用自制的小秤像秤金子那样不差毫厘来分肉食品。廿来人分摊到半盆萝卜烧肉，先将肉拣出来，秤一下总量，然后又将肥、瘦、骨头分开，计算一下每份摊到几钱重。大伙儿摆碗，接着按量秤给每人，分完后犹恐掌秤人有私，再将各份编了号，大家抓阄。这样，虽然各人不是取的自己碗里的一份，但比较公平合理。金玉堂一双鼠目滴溜溜注视着分肉的过程，看不出舞弊。这个善于挑剔、天生长着反骨的老汉奸无奈地取回那份肉，望着碗底的小五丁猪肉露出不满意的眼神，顺手放在自己的铺位上，拿起饭盆，往伙房打饭，端着饭回来，看见还有一份肉没有拿走，就问，谁的肉没有拿，这才将曾普伦叫醒。

原来曾普伦上午在田埂和路上收扫撒遗的稻粒，因劳累过度引起体温上升，回来后就躺在铺上了，听到叫拿碗，始勉强坐起。他与金玉堂对面铺，于是金玉堂将肉碗递过去。他接过碗说：“我早晨两块粢耙还没吃，我的饭老金你来吃了吧！”金玉堂回称：“我自己的一份饭尚且吃不完，我的胃不好你不知道吗？你还说药多吃无益，难道多吃饭能对胃有益吗？”午饭后休息一小时后出工，金玉堂又开腔了：“唉，双抢的农忙关键时刻，有病也得支撑着出工，重的干不了就干轻的吧！总不能躺下看热闹，嘴巴说认罪服法不算，要看实际行动，我金玉堂不装好，就是爬也要爬到工地。全组只有曾普伦一个病号。”劳改队像金玉堂这类耍熊毕竟少数，他以靠拢政府的架势，挤眉弄眼边走边说，想在双抢捞一把，为他在年终评比中加立功资料。共产党向来利用多数打倒少数，反过来又利用极少数作鬼去控制多数。

照例金玉堂每次在离铺时，总要将一块脏的呈黑色的枕头布，拈起来拍打铺上的灰尘，蓬尘飞扬，他身上的尘土，以及他剥下的脚皮粒屑都一古脑儿散向邻铺，恰好曾普伦的菜碗尚未收，见此就唉了一声，用手捂往菜碗，略露憎色。这就触怒了金大爷，

嘴里嗯了一声，调转屁股往外走去，站到大院，正好上工铃响了，他提高嗓门叫了一声“出工啦！”曾普伦被金玉堂一激，不得不挣扎着上工。我见状就低声对他说，你就躺在铺上吧，我替你向队长报告病假，他无力地答道：“金老板不饶人的，我不能让你为难。”跟着他迈着艰难的步伐，手里拿起簸箕扫把走向大田。

一个农业队的耕种面积有一千二、三百亩，四周是大圩埂和纵横衔接的水渠，形成灌溉网。当时正在秋收的当口，是劳改犯人日以继夜，挑灯夜战，最为辛苦的时候。一担子稻把要从水田挑到埂上，从埂上用独轮手推车运到大场基。另外，一些青壮年劳力，弯着腰低着头，所谓的面对黄土背朝天，插秧、割稻、或者挑秧把、拔秧。最弱的老弱犯也得到大田拾稻穗，做到颗粒归仓，点滴不遗。大致六、七个老弱犯从北向南，逐块大田排着拾稻穗，每拾一支稻穗就得一弯到地，虽是最轻的劳动，但在老残病犯身上，这样一路鞠躬到地的单一的不停动作，也被搞得头晕眼花，腰酸背痛。

当拾到最南面一块大田时，姓奇的皖北人，在隔几块大田的小埂上大声惊叫：“呀！你们来啊！有人晕倒在田里啦！”听到喊声，大伙儿引颈远望，果见相距五六块大田的远处，一人上身倒在水田里，双脚在小埂上倒竖着。收割完的大田光秃秃没有遮挡，我们五、六人就从水田里快步走去，发现曾普伦双腿在小埂上，上身和头倒扑在水田里，脸部向下，急忙和老奇合力将他抬上小埂，不知怎的我腿也软手也软，两人就是拖不动。好在随即又有人赶来，这才将他拖上小埂，扶他仰面而卧。此时发觉他已无气息，脸呈灰色，头和半边脸都沾了污泥。我们立即用水给洗净，他的脸依然是铁灰色的，凄惨万分。我们大声喊医生救命。犯医董思治赶来，以手指撑开他的眼皮，见瞳仁无光，再摸胸前尚有微温，但心脏已停止跳动，我不禁放声大哭。那个带工的周队副

走来，瞪眼向我喝道：“你哭什么，死就死了呗！快给抬到大埂上去！”

我忍着悲痛与其他三人艰难地将尸体抬到横埂的树荫下，抬上大埂尚有一条水沟阻着，最后剩下我和山东老李两个看守死人。周队副将其他人都叫去劳动，又叫犁田组的壮汉拉了一辆板车将尸体运到青山埋掉。在这空隙中我和犯医董思治商量，回工棚将曾普伦的包裹打开，拣一套他家里送来的衣服鞋袜，为他穿上送终。我从未接触过这样的事，替死人穿衣服是第一次。我和老李脱掉尸体的脏衣，在水沟里取了清水将尸体从头到脚洗净，穿上新衣新鞋、新袜。这时我才体会到，人死之后那种僵硬和死灰肤色的可怕。瘦骨嶙峋的尸体竟重得难以翻动，为他脱、穿衣裳煞费手脚。稍后两个壮汉将尸体抬过水沟安放在板车上，待拉到中队前面的堤埂时已是收工钟响，只得将板车停放在堤边的麻地里。第二天清晨，才将曾普伦的尸体运到青山的墓地掩埋。因天气炎热，隔夜尸体已腐，尸水滴在麻地里散发出恶臭，很远都能嗅到，过往之人莫不掩鼻，可是这块麻地中停尸的那一圈的麻长得乌油油，既壮又高。

犁田组的人说，这天下午出工时，因天气太热，“息牛”（使牛休息）时坐在这条埂的树荫下纳凉，曾普伦也坐在这里。我们抬头看看太阳已过了热中三点，就到北面大田套牛，许是他见我们干活了，他也就从这条小埂扫稻粒，也不过一个半钟点前的事，竟成古人了！一条人命在劳改队真如同蚂蚁。当年的曾普伦受过高等教育，也曾在抗日战争年代付出辛劳，最后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傲骨犹存的曾普伦宁可累死，也不为难别人的节气，值得吾人为之一哭。他虚弱得连行路都困难，又未进餐，依然支撑出工，在烈日下行在小埂上，做着蹲下起立的扫稻粒动作，难免头昏眼花一跤跌下田，显然当时是向前扑倒，所以左边的肋骨断掉，身

子倒栽，头在水田里，就这样结束了一生。我为老友的死不平，向队副说穿曾普伦死的起因，干部不准我说，反而指责我搞鬼。

“三多”的劳改场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中，劳改队里有三多，蚊子多、小偷多、死人多，乃是专政下最黑暗的蛮荒时期。死亡原因是病死、累死、饿死的三者综合。为什么有那么多蚊子？因为不换衣不洗衣、不洗澡，脏臭的躯体吸引了蚊虫。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偷？因为三餐都不饱，没东西吃，被饥饿所逼而行窃。

有个叫左振乾的中年犯人，原是军中的少校军，河南人，被判十五年，嗜烟如命。最初他有些行装，不料逐渐开始偷窃。当时突出的问题是吃不饱，烟瘾大，受狱中的樛上君子引诱，偷心骚痒，顾不得身在囹圄的禁律，竟挺而走险。他先在伙房下手。无奈几次走险，所获仅有隔宿饱足。而且伙房的炊事犯，个个拳大臂粗，不幸失风，一顿好揍管教，鼻青眼肿，弄不好被绑在铁窗栅栏上叫你在众人面前亮相。有些人真的做得出，不去追恨共产党不给犯人吃饱，而拿被绑着的小偷出气，向小偷脸上吐口水，有的甚至一口浓痰直射小偷的嘴巴上，大家看了拍手称快。

为了肚子，有的竟然明抢。起床钟响，天尚未明，各小组的小值星到伙房去抬稀饭。一些大胆的小伙子乘着黑朦朦的机会，隐身在墙角落，一见抬饭桶的是两个老弱，跳去就将抬桶的打倒，随即抢着半桶稀饭往背隐处跑。犯人找到饭桶，抬回去时已是只剩一半了！殊不知稀饭是“命”，免不了小组里又得因“命”哭闹一场。这回教训，给老弱犯人立了规定，天不明不抬饭。

这些把戏，左振乾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恰好他生病，人瘦得像猴精，他利用病休，乘工棚里无人，就将自己的铺位，靠墙的

一端挖了个大窟窿，上面依旧盖上铺草，用以窝赃。一面暗中组织了几个青年小伙，自己是老大，唆使小伙们在半夜脱去衣裤一丝不挂，潜入别队工棚行窃，得手后就交给左老大，由老大向伙房的炊事犯，或就业的职工，换得米、冷饭、烟叶、盐、米、糖、馒头等食物补充。刑满就业的职工，有馒头、猪肉、蛋品、纸烟等物，一件毛衣可以换两斤猪肉，一条西装裤也能换十个八个馒头，一块香皂能换到半斤盐，有了盐就可以在田野开小高炉(就地煮食)了。

那时的刑满职工，需要衣服，半统胶鞋及日用品，劳改犯则渴求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劳改队的偷窃风，一夜数起，弄得人心不安。本来就身无常物的犯人是经不起偷的。左振乾就成了这时的名偷。有次他被三队的值班捉住了，被绑吊打得大口吐血，我去领他时已是半死，从此就进了门诊室，不久又转到卫生院，然后队里就接到他的死亡通知。

左振乾所纠集的全是安徽人，其中有一个是合肥安徽大学教授的儿子。教授夫人是日本婆，这儿子小俞是日本婆生的，体形高大，相貌堂堂。不满廿岁，被判两年刑。饥饿使其变了质，参加了左振乾的小偷集团。那次在二队行窃失风，被二队的干事捉到，二队半夜派人到一队的收发室叫领人。小俞被押在二队杂务组，赤条条一丝不挂，垂头站在那里。二队干事身后有几个高大的劳改犯人，干事指着小俞问道：“这犯人是你们队的吗？”我回说：“是。”“那你带回去告诉你们队的干事，从严管教。”我看到小俞脸上全是紫黑色的手指印，嘴上还有血渍，必是挨了一顿狠揍，见了我来领他，现出狼狈相。我领着他回到本队。当时天气很冷，他赤身露体，颤抖着回到小组。我见过他爸爸给他的信，知他受过高中教育，不仅外形英俊，而是智敏异常，堕落如此，为之痛惜，他表示饿极了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天清晨，本队刘干事来带工，重视小俞的事，命小俞不出工，详细审问了偷盗内幕，采取严密措施，以期根绝偷盗，将小俞所供的本队六七个小偷以及外队的八个小偷统关在一间房里，编成一个组。白天他们由干部监督劳动，不准与外组接触，晚间收工关进小屋上锁，使之无法逞故技，看来很严格。其实待干部离开后的夜晚，他们依旧活动，从后窗与外队小偷联络，这禁闭室成了外队小偷的储藏所。他们在封闭了的后窗做了个活动口，赃物可以由此输入输出。这屋因为日夜都上锁，干部不疑有他。禁闭室竟成了众偷的保险库，而夜深人静时，那里又成了交易所。偷来偷去，都是些不值钱的粗旧衣物，然而在那物质匮乏的劳改农场，那时一碗冷饭，几个硬的馒头，一把烟叶，一双胶鞋，一双饭盒竟然成了奇货。这是乞丐不如的劳改生活的实况。

记得这禁闭室新关进一个原在外面以偷为生的惯贼，他的大胆行为被干事所注意，干事在夜间埋伏在二队，他一夜数案，终于被擒获。于是被绑起双手垂直吊在樑上，下面只让两脚尖着地，夜间吊着不能入睡，全靠脚尖支撑全身，直到精疲力尽，还是解不了双手的痛苦，死活不得，白天松绑参加劳动。接连几天，他受刑不过，什么内情都供了出来，因而破了这樁窝藏交易案，将所有的小偷调离，分散到各大队。那个老大左振乾调开后就进了门诊室，不久因伤重不治死亡。这人是是个不明是非的自私狂徒，他有强烈的报复心，出于自我的私利，搞得同为天涯沦落人自相残杀，饥饿也不能为他的不义行为开脱，可说是死有余辜。有次我曾劝其放弃行窃，不料他瞪大眼睛恶声相对：“你知道什么，如果你的东西都被人偷了，肚子又饿得活不下去，保管你比我还偷，我不偷等死啊！”

这一段时期，洪荒的白湖劳改农场白蚤之多，是因为人与猪的生活相同所造成。整日劳累不息的犯人，不时汗流浹背，却没有

洗澡换衣，人体散发出的汗臭，久而衍生白蚤，多到无法清除。尤其毛线衣更是蚤子的温床，一穿上身就全身发毛。即使平面布衣和棉袄，也满布了吸血虫。用扫帚扫，虫卵也无法扫掉。随便伸手向内衣一摸，就可摸到几只。不过不痒也倒是事实，因为十多人挤在土炕上睡时脱得精光，累了睡着同死去一样，也就不觉得痒。白天的劳动紧张非常，更顾不得些许蚤咬。这种令人见了发麻的状况，直到1962年队里指派专人洗衣，用滚水烫，碱水浸洗，才将白蚤消除。

至于死人多，也是起因于吃不饱，加上医疗设备差，劳动强度高，三者总合，病号就多了。一个队二百多人，当时能出工的仅百多人，近半数病号，病号只给两顿白粥，一顿一碗，半铁勺咸菜，留在工棚的病号每次分饭总要争吵，甚至动武，分饭不公啦，争着刮饭桶啦等等，连以往在社会上有身份的、曾为人师表的犯人，在分饭时都会斤斤计较，粒米不让，头伸到稀饭桶里用手刮、舌头舔桶里的饭粒。这些病号大多数是营养不良的虚弱病，浮肿。更多的是肠胃病，因为吃了田里的生小鱼、活蚱蜢、青蛙、水蛇以及生菜野草等引发出鼓胀病，丝虫、勾虫、蛔虫在腹中衍生引起的脚肿、消瘦、胃溃疡、肠穿孔、肺结核等症。因医疗设备差，药物缺乏，往往送到门诊时已不治身亡。那时大队门诊室有个小伙子专以独轮车推运死尸到青山掩埋，一车两具尸体。青山有挖成的坑，推到坑头只须将车竖起，把尸体卸入坑内，不等掩土，别的大队也有尸体运到，一坑数具同时掩埋。在当年的饥饿高潮时期，青山的运尸车络绎不绝，谁知青山脚下埋下几多苦鬼。那里的成群野狗，就是赖以生存的。一块二寸宽的小木牌写着死者的姓名，不消一、二个月，日晒雨淋，木牌上的字已是模糊不清，最后被水冲泥盖，大多不知去向，有的变成腐朽碎片和堆堆白骨夹在一起，末了也就只是个乱葬岗子。

白湖生产的稻米足够供应卅万人食用，然而在那里艰苦耕耘的劳改犯人，却是终日饥肠辘辘。

李静涵教授

1969年白湖水灾后，我被指定留在卫生院大堤旁的小草棚里做修补囚衣的劳作。10月天气，秋高气爽，清晨准备开工，见大堤上两个人拉着一辆小板车由远处走来，经过草棚往青山医院去，板车是卫生院的。我们互打招呼，我问拉的是谁啊！答道：“李静涵。”我走上堤埂，见果真是李教授，随即向他招呼。他侧卧着向我扫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能吃东西，周身无力。”说着摇摇头不再出声了。两个运输的犯人拉着他走远了，我唏嘘着回到草棚干活，一面思量，他确是瘦脱了形。

李静涵在二大队的养练队捻麻线，做的是最轻微的劳活，用手将一支支的长黄麻撇开，然后捻成细细的麻线。这种活乃农村的老婆婆做的，如今却叫这个留学美国专攻畜牧的大学教授来操作。

抗战年代，李静涵任济南中正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回到原籍安徽合肥农学院任教授。他有个在中正大学畜牧系毕业的学生陈某，浙江慈溪人，45年在上海接收了日本移交的牛乳公司（战前为美国公司），中共进入上海后接管了这家公司，中共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留用了陈。经过数年的经营，中共熟悉业务后，就假三反五反运动，整肃了陈，指他是蒋家的嫡亲，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投入劳改，刑满后不准回上海，只得在原劳改单位就业。

有理想的人不甘心失败，跌倒了站起来，就要继续向前去，以求实现理想。这个踏入社会不久的青年，偶而知道了老师李静涵就在眼前，于是利用星期假日走访了农学院的李教授。见到老师，

如遇救星，尽吐心愿，诉说了不幸经过，请求援助，李教授深表同情。因为陈某希望能由印度转赴美国谋求生路，因此李教授遂写了封给美国友人的信，介绍陈某去美有所投奔。这是一封英文信，陈某如获至宝藏在贴身衣内，并借往上海探亲之由，离开了劳改工厂，取道西藏偷越国境。

不料到了兰州就被公安察觉，搜出英文信件，押解回原劳改工厂。陈某承认了企图偷越国境，取道印度到美国。由此追究到出信人李静涵，即予逮捕。李则坚决否认曾写信给美国友人，直到公安局拿出他的亲笔信件，始认了此事，但仍不承认有错。因其抗拒交代，从严判处十年徒刑，不得上诉。而主犯陈某因交代彻底，从轻发落，判监八年。凑巧师生两人竟逢在一起，同在一个队劳改。李教授已临古稀，以往养尊处优，一下子被投入人间地狱的劳改农场，煞是难熬。这两位都曾同队同组，自从李教授去了青山医院，再也未见回队，想是被埋在青山脚下。而其学生陈某，八年刑满后被留在白湖农场八大队当了兽医，终生为奴。

一位专家教授，偶而为落泊学生写一封介绍信，既不涉及政治，又不卖国泄密，何罪之有？可是在中共体制下，即使鸡毛蒜皮的问题，也说成罪大恶极，将你折磨致死。

可悲的小高

小高其人，不知其名，但我对其在白湖的悲惨身世，却了如指掌。1961年他随着一批劳动力及老围子养练队的少数老弱，调在大堤边缘的五队种植棉花。全队有九百多亩旱地，与白湖仅有的女队毗邻，相隔一条斗渠，土地接壤，男女犯工棚相距一里之遥，一东一西以渠为禁界。小高在队部东面的猪棚喂猪，是猪棚四人中的一员。小伙子会撒网打鱼，常见他穿一身油布衣裤，背着鱼

篓，手提一张撒网，在附近沟塘打鱼，有时也捞水草。打的鱼送往干部食堂，捞的水草挑到猪棚煮了喂猪。他在小草棚门前过，累了就坐下与我聊天。他是曹操的故乡亳县人，父亲是当地祖传中医，闻名于乡里，家道小康。他相貌端正，有一股学生气息，性情柔和，年仅十八，颇受人喜爱。他原是亳县中学的高中生，因将报纸上的毛泽东像用针刺了画像的眼睛，被同学向校方检举，这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十年监禁，投入白湖劳改。与他同队时，他刚到白湖，面带一副纯洁的学生稚气。

正是青春发育期的英俊小伙子，怎耐得原始般的枯燥无聊生活，常年被囚禁在樊笼里，度着毫无生气的奴隶生活。1964年，小高突然神经失常，不时发笑，目光迟钝，不思饮食，日渐消瘦，终日无语。被送到门诊室治疗，经医观察检查，诊断他系脑神经混乱，不能自主。他有时憨笑不语，白天在被窝里手淫，泄出的精液用手指摸了向嘴里送，吃完呵呵笑一阵就睡。后来发展到大小便失禁，在铺上屎尿撒尿，臭不可闻。铺上天天换铺草，可是衣裤上的臭气无法解决，弄得人厌烦。他也不知饱足。就这样成年累月地，虽说是治疗，而门诊的设备简陋，根本没有起到医治作用，只能说他挨过了十年。可能是人体本身的抗力，后期病情略有减轻，不再手淫，失禁的次数少了，能自己上毛厕。

从第一次见他背鱼篓打鱼起到1974年第三次见到他，相隔已是十二年。69年发水前，到门诊室去学习制作菌肥时，他正在痴呆型精神病临床治疗期。这年他该刑满出狱。1974年5月，小高从门诊室转调至十队的老弱组，干部吩咐给他单独睡小炕。我几乎认不出是小高，瘦削的脸上，现出中年人的模样，显得眼睛格外大。招呼他，他瞪着人毫无反应，好似没有知觉，行动迟钝，两手提到胸前横着小臂，像是木偶，直着身子慢慢移动双腿。默默沉思，小高已过了十年刑期，为什么还没放呢？这年的春耕时，

小高的母亲从亳县赶来探望儿子，准备接回去。不料干部准其接见却不准回家，并说“他有严重的精神病”，经不断治疗已有好转，必须完全恢复，才让出监。政府人道改造罪犯，对每个犯人负责，他好好的来，要他更好地出去，况且你们家哪来那么多钱为他治病。指导员当着许多劳改犯人的面，用这漂亮的话，打发这个乡下妈妈。小高痴痴地望着娘亲，像个木头人。

老妈妈就只有一个独子，在家中时宝贝得捧在手里，如今见他病成这样，见了亲娘，只是一味傻笑，一句话都没有，真似万箭穿心，却又不肯哭，更不敢同干部争辩。老妈妈只好连连将带来的好食物向干瘪消瘦的儿子嘴里送，小高只是张口吃，没有任何表情。看看天晚下来，已是黄昏时分，再不走就赶不上宿处了，于是老妈妈将带来的衣物收拾在一起，放在小高的铺头上。摸摸小高的脸，又摸摸他鼓鼓的肚子，见他真的吃饱了，这才一步一回头地挥泪离去。旁观者莫不为之动容。

老太太走了，小高吃饱了就呼呼睡去，别人替他取来一份饭也不吃了。次日清晨带着黑，大家都出工，工棚里只剩下他一个。待大家收工回来午饭时，见大门口围着好些人。我挤进人群，只见小高躺在大门旁，嘴里吐着沫，嘴角淌酱色的液，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着，大家弄不清什么原由。清洁犯人向指导员报告：“七点钟打扫工棚时，见小高坐在他的小铺上吃东西，但没有留意他吃什么。待十一点给他送开水时，发现他歪着身子倒在铺上，面前放着他妈带来的肉包子和两瓶辣酱空瓶，嘴里流出酱汁，一动不动，一摸他鼻孔，只有微微的气，急忙找医生。董医生走来检查，发现他吃了过量的辣酱，是太多的食盐致命，心脏已停止跳动，没法救了！”大家这才明白，小高因神经失常，不知饱足，吃了过量的辣酱致死。他调来十队才不久，作为一个特殊病人放在老弱组，单独睡小铺，因他每夜尿炕，铺草总是湿漉漉散发很

浓的尿臊味，没人过问。干部规定清洁犯人洪月庠 给他每天送水、送饭。他是被人厌恶的可怜虫，大家都不以人看待他。大家只知现在的他讨人厌，而忘记了他以往的可爱。他遗留下来的是他妈送来的衣物，和一个臭气冲天的单人土炕。大家一起动手，在午休时间将臭铺土坑清除了，很短时间内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有谁去同情和追思这个可怜的生命呢？他的娘亲又怎知送来的食物竟是送儿西归的祭品呢？

亚浦耳的少东钱方仁

他平扁的脸形乍看像个老奶奶，生就一张老太婆嘴巴，下颏微微地翘起，四川口音很重。原来，钱方仁的父亲是亚浦耳灯泡厂的东主，他家在抗战开始就迁到重庆，因此他中学阶段都在重庆度过。胜利后回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凭着新闻系的学历，被派到福建前线为新华社驻军记者，后派调在上海新华社编辑部工作，反右运动中因他的几篇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被打成右派，押送八茅岭农场劳教。

当时由于他是劳教拘留，没有搜身，一张记者证依旧在他衣袋里。他不久就逃离八茅岭农场，凭记者证，潜至上海，居于西区淮海中路延庆路碧萝饭店。他一面写申请向英国领事馆请求政治庇护，一面凭记者证买了往广州的机票，想从碧萝饭店走出搭车去机场，跨出饭店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拦住，枪口对着他“不准动”，随即铐上。钱方仁原来那股子远走高飞的兴奋劲被这意外的事吓呆了。竟像木鸡般站着，手里的提包丢落在地上。

提审中无法抵赖去英国领事馆的事，公安局又发现他写在一本杂志的空行间的反文提纲。凭这很快就结案，以偷越国境，泄密投敌的罪名，判刑廿年，解白湖农场劳改。初到白湖一大队，尚

带着廿斤重的大镣，行动艰难。后来因交代彻底，认罪深刻，给予开镣，送到旱地作物的五队作业区任甲等组劳动，干着挖沟、清畦的重劳动。他整日手不离大锹，手上的老茧竟厚得可以与脚底板相比，全身晒得黑黝黝，用一块纱布披在肩头上。穿一条短裤，赤着双足，俨如壮实的农家汉，与其原来身份相差太远了！他父亲每月一只邮包，廿斤粮票，再加拾元钱和日用衣物，使他的改造有了足够的本钱，若没有这每月的接济，如此辛劳，怎么也支持不了！故而他不仅没有消瘦，反倒更为结实。这样的家庭接济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他订出一个目标，五年内争取减刑，十年脱梢（出监），所以劳动积极，季度得奖，年终记功。每逢监内发起运动，他总是带头表现，有次检举他的姑父，曾当过重庆市的义务警，又检举同队犯人的反动言论。他文章写得既好又快，经常向省劳改局办的《新生报》投稿，成为《新生报》的特约通讯员，每次稿费总有十多廿元，乃监内少有的劳改作品。他也不断写剧本，从正面反映劳改犯忘我劳动和守法的生活，还自编、自导、自演有政治内容的活报剧。他成了劳改中的活跃分子，他的文艺水准堪与社会上大报的编辑一比高低，文字流畅，用辞贴切，比喻生动，超脱于庸俗的党八股，比工农兵文学要趣味得多。但此君已被强权吓破胆，利用自己的聪明和一只灵活的笔，为政府奴役自己的专政工具吹捧文饰，为的是换取提前出狱的机会。

他的一切表现均属伪装，平素从不多言。他是从斗争的漩涡里爬出来的，当然懂得斗争的技巧。接受了残酷的教训，所以他从不轻易露底。不过在无意的闲聊中多少可以审察他的内心。他爱好音乐，特别是贝多芬的名曲和爵士乐。四十年代的歌曲中，他常吹渔家女、蓝色多瑙河、小夜曲、魂断蓝桥。他把《福尔摩斯》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也讲《基督山恩仇记》，但讲到监狱的一节就刹车了。组里人在农闲节庆假日，都央求他讲上一段，一些

青年小伙子听上了瘾。他先打招呼，只讲“健康”的东西，不涉及政治。据他叙述，抗战胜利后，1945年至46年他去了台湾他父亲的分公司，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荒唐生活。他遇上了一个酒家女，花掉了相等于人民币五万元，最后只穿着一件衬衣一条短裤，被酒家女的阿婆赶出门。他说这一段经历时，自然加上注脚：台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个陷阱，能将青年人推向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才能使罪恶者走上爱国爱党的人生正道，成为积极劳动，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好人。这一套说明十分符合中共所宣传的“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改造成人”的改造经。

他也透露在新华社当编辑时的事，与其他报社的主编沟通，互相刊登各自的文章，以牟取稿酬，每月可得稿费二、三百元。他妻子是基督徒，他们在上海衡山路国际教堂结婚，生了个女儿。他说他喜爱“渔家女”这支歌，以此来为自己打掩护，因为这支歌的歌词具有无产阶级的色彩。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十分留恋过去的时代，在自由世界中当一名记者，这是多么快意的事啊。

起义将领王品章

王品章是个受中共迷惑的将领之一，是当时上海守军某兵团的副司令，中将职位。部队奉命撤离时，王品章竟带领残余的一个师宣布“起义”投降。1958年在肃反运动中未能幸免，被捕入狱，判刑十年，定他认罪不真，无起义事实，解往劳改农场强迫劳动改造。1968年刑满留场就业，在白湖农场七大队十一中队菜园组劳动，因年逾七十，体质衰弱，行走必执拐杖，只能看管菜园。

1975年12月7日，中共对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特人员实行宽释，王是黄埔二期生，中将衔，是当时被释放的廿一个将级军人之一。1976年元月被安置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作为养

起来的对象，每月由上海市民政厅发给 50 元生活费，家中老妻已故，儿孙因受株连度着没落生活。释放的初期，他颇得意忘形，不料仅五十元的生活费使他大失所望。回家后三代同堂，挤在一起。他再三请求，算是特别照顾增给了一间，可仍然是挤。欲想再增一间，得到的是几句敷衍的空话，向他说说政策和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要他在感恩的心情下安心休养。末了因老一辈的意识及生活习惯不同，与儿孙产生了冲突，孙辈指责祖父不该起义投降，全家落泊至此，祸由起义，甚而破口大骂，王品章一气身亡。

出监前后

1974 年是我行将刑满的一年，在白湖已度过十六个年头。这时正在二大队的十队老弱组劳动。这段时间我的心情宽松起来，连带地外表上也不再愁眉苦脸。有人说，坐监就是两头难，我对此说只认同一半。同组的大多是老人，老吴年近七十，曾是江苏常州一个小镇的镇长，被中共定为官僚地主。他乡音很重，有句口头禅——“真笑话”。一启口必先说一句。58 年他进监是双料的反字号，地主兼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为人忠厚。可能是家境富有，不善劳作，格外老态龙钟。干部视之为老实无能一类。于 74 年初从组里调到本队所属土地的边缘与邻队交界的堤埂拐角，看管堤上的旱作物花生、芝麻、蚕豆等。堤下就是东西大圩的分界干渠，水深河阔，老吴独自居于堤拐角的小草棚里，孤独地生活。

小棚的四周有疏疏的小树林，这些树随着建堤的年月成长，也将这冷清的环境点缀得颇有隐士幽居的情调。加上堤埂上种了不少西瓜、香瓜、蕃茄、辣椒、马铃薯，这些给居士提供了优越的享受，一个劳改犯人能有如是雅境，真是过着神仙般日子了！站在高处远眺，一望无际的田野风光尽收眼底，每个大队的布局，

酷似一座座庄园，纵横交错的灌溉设施，像蜘蛛网般排列整齐。一方方大田，规划得犹如图案，平铺在大地上。这里四面环山，原先是片白茫茫湖泊，现在是卅六万亩的肥沃盆地。

劳改队有三项宽松行当，被劳改犯人称做自由职业：医务、剃头、拾粪。药箱、剃头箱、粪担是三个行当的通行证，凭此可以在本大队境内任意游荡。劳改犯们的美差是在小单位，以农场而言，有猪棚、牛棚、鸭棚、鸡舍、羊圈、铁匠、木匠、菜园棚、工具房等。这些小单位以 1-5 人为限，其中边远的大埂上看管农作物的小草棚最为理想。干部鞭长莫及，好似边陲守将，距队伍有五里之遥，在十平方里的大地上有着生活和思维的完全自由。囚犯所向往的是自由，最畏惧的是小组的集体生活，只要准其单独过日子，即使最简陋的环境，也会乐于接受。

从 1974 年春耕开始，我被指定干“拾粪”行当，每天都要光顾老吴的劳改“别墅”，解除一下疲劳。因为这埂上有个大粪窖，是旱地作物的肥料库。我清早随着出工的队伍走向大田，顺便在菜园的横头树荫下停留，等待众人下田屙堆屎，多数人选择树荫下或沟边田头。这是最忙的时刻，我挑着粪担，手执粪耙，将一堆堆屎勾上来，放进粪筐。这种臭气冲天的脏活即使在农村也没人肯干。用未经改制的人畜粪作肥料，直接撒在水田里的施肥方法，一直在劳改农场沿用。这种原始的拾粪肥行当，却给了少数劳改犯有了整日自由行动的机会，得以苦中寻乐。我亲享着这自由，也习惯了这种肮脏活计。

队长之所以要我拾粪，是因为我刑期将满，不致逃跑。我挑这粪担约挑了半年之久。我每挑起这副臭屎担子，总觉得一身轻飘，一个人想到那儿就到那儿，行到大埂无人处发泄一下闷气，还我本色，唱唱歌，哼哼曲，自我安慰怀念故旧的心。担子重了就赶到菜园粪坑卸去新粪，又在小沟里洗掉粪箕里的粪碴，走到场基

撮上一些稻皮垫箕底，免得粪便粘在箕子上，然后再挑起担子去拾野粪。走遍大队和本队的大片土地，行到菜园或其他窝篷就坐下聊聊天，歇歇脚，摘个甜瓜、番茄尝尝新。

有天大雨后放晴，在艳阳下挑着担子走过石板小桥，忽听身后拍拍有声，回眸一看，原来是条大鱼从水沟跳到石板桥上。我急忙搁下粪担扑上前去，双手按住，捉住了又怕滑掉，又将鱼摔了两下，真的摔死了，用擦汗的纱布将鱼裹起来挂在担头上，悄悄赶回工棚。到了医务室，犯医董思治与我交厚，他这里有炉有锅，托他代烹，并邀共食。老董见这鱼足有三斤，问我来由，我告以实情，他欣然祝我好运，笑曰：“天赐口福，吉祥之兆，不可分食。”到晚黑，我就在医务室饱餐一顿，这是我劳改廿年中最幸运的一次，可老董说什么也不肯伸筷。

这顿美餐其乐胜过社会上的酒宴，尤其在当时的环境中难有自煮的美味。大鱼只有干部才能享用，劳改犯人能捕到的都是小沟和大田里的小毛鱼，而且除了小单位和犁田组的人，才有开小炉灶的机会，也不过是白水煮加点盐，至多弄到点葱花。而犯医那里，既有炉子（煮针消毒用炉）又有油盐 and 作料，这比白水煮毛鱼不知好多少。老董对我格外看顾，私下为我烹煮，如果被干部发觉，会遭停炉熄火的惩罚。上面说的苦中有乐就是指的像犯医那样，背着药箱，拾粪担到处自由走动，在严密监管的空隙里，也隐藏着乐的一面。一个劳改犯人在数十年的禁锢生活中能够幸运地被派在小单位，乃是蒙上帝的恩典，祖上积德。

就在这行当中，好容易盼到74年6月25这一天，却不见干部叫我出监，苦闷两天，耐不住了，即向管教干事查问。这新来的干事也姓季，他第二天告诉我，你刑期过了，过了很多，我已向大队反映，给你查。听了这心里多了一份惊疑，暗忖，回想当年明明听王科长说加刑十年合并刑期廿年，现在到期不放，还说过

了期限很多，难道当时听错了四与十之误，以四当成十了！但为什么又说合并廿年呢？反正共产党的事，干部的嘴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便讲，却不准你吐半口气。

眼巴巴盼了廿年，期近的这一阵，每天兴奋地挑起粪担轻松无比，行到大堤无人处，就放声唱起我喜爱的歌，独自在旷野里自我陶醉，发泄一下廿年的闷气。思量着能见妈妈和儿女了，心跳就快起来。想到共产党害了我一生不说，还连累了一家老小，害得老娘稚子含辛茹苦数十年，妻子离异不足惜，可是老小无人奉养才真叫炙心。想到这里不禁无名火起，挥起拳头唱起“车麟麟马嘯嘯，枪在手，刀出鞘，男儿报国在今朝……”迎着晨曦放下担子，肃立引吭唱起“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然后又唱，“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是啊，在我心灵深处，从未忘记我是个保国卫民的军人，我从未丢弃信念，忘掉黄埔精神。为什么要禁锢我廿年！刑满了又怎样呢？肯定是留场就业，继续受禁锢，每月多了个十八元的工资，此生已矣，再也不能奉老抚小。老娘多次来信，离妻违诺，不但不给每月五元的赡养费，而且连粮票都克扣不给，如今经常处于无柴无米的困境。年已九十的老娘，孤独住在镇江老家农村中半间小屋里苦熬，生活没有人照顾，衣食也成问题，仅仅依靠外甥每月给六元以维持生活。一个以国运为怀的军人，被囚困得自身不保，家事难顾的境地，能不痛心疾首！？

1974年入秋之后的一段时日，觉得非常难熬，原本乐呵呵的日子，竟变得度日如年，陷于忧怨。秋收秋种没有叫我参加，依然拾粪，白茫茫的白湖经过十八年的不断建设，各方面都超出了民间农村。住有瓦屋，每个生产点有四个队，每队一座小围子，与外队各不来往，劳改犯人只能在本队的小围里生活，除非大队集

中在一起开会，听几小时的训斥。年终开一次奖惩大会，可能遇上难友，藉上毛厕的机会，作有限度的交谈。

白湖农场随着岁月的演变，增加不少绿色点缀，圩堤上不准植树是为了不给逃跑犯人提供遮蔽，可是农场内部的小径大道却已阡陌成荫，给人以清凉幽静的感觉。这种景色比之周围的农村要整洁得多，除了集体挤在一起睡宿未变外，真的要比当时的农民生活略胜一筹，无衣食之忧。有些年轻的刑满释放农村户，宁可返回监狱当职工，每月拿廿元工资。我是一心要回家的人，无奈当局偏偏不放，因为家在上海，大城市一律不准进入。

衷心祈盼的一天终于来到，已是进入廿一年了！背着这罪犯牌子，挨了说不尽的苦难和折磨，想到这周身会发冷，双手会哆嗦。在一个雨雪的早晨，指导员来到工棚，通知我去大队报到，转往场部出监队，我激动地收拾了行李，很小心将一把裁衣剪刀藏在提篮底下，这是唯一值得珍惜的东西，它陪伴了我十多年。到了队部，干事没有查出剪刀，却拿走了一顶新蚊帐，换给我一顶破旧蚊帐，算是廿一年劳役的报酬。所在生产点距大队约七里，我与另外两难友同为出监伙伴，由队部指派运输犯拉了板车载着我们的行李送到大队部。大队干部查证了我的档案，并发给我卅六元，说是“你过期六个月，补发你卅六元。”这里的规定，无理可说，我收下这廿年来未见过的纸币，心里泛起一阵痛楚，难道我廿年的光阴仅有这点价值？转念一想，这卅六元可以作为路费去探望廿年不见的老娘和儿女了！这个盘算立刻扫尽一切杂念，令我喜上心头。

一辆拖拉机拖着一个装石子黄沙的车斗，是大队准备好的运送出监犯人去场部的大车。我将行李放进车斗，然后爬了进去，大队的解送干部坐进了驾驶仓，拖拉机带着车斗开动，摇摇晃晃地驶向场部。出监队后仍在圩埂里面，近外河的大桥，隔邻是场部

的建筑工程队和蔬菜队，后面是农试站。拖拉机将我们八九个出监的人驶入出监队的大门，里面已挤满了人，正好赶上月尾分派，所以住房客满，只得临时在食堂里打地铺。

所谓出监队，其实是大监狱将刑满的劳改犯人集中起来再分配的场所。家在农村的，发给路费，给一张证明打发回家。家在城市的，一律留场就业。监狱里有大片土地、工厂及各种行业的队站，需要大批劳力和技术人才。出监队的职责就是对刑满劳改犯人进行收发及供应食宿。这里的伙食介于劳改队与职工队之间，所以出监队长是个肥差，干部在伙食上可以捞到大笔油水，不担风险。74年的12月正是大雪铺地的隆冬时节，一路在车斗上饱受风寒，加上混杂在水泥地铺上，我感染了流行感冒病毒，接连五天高烧，嗓子嘶哑得发不出声，喉咙肿痛，浓痰阻塞了呼吸，口干舌苦，不思进食。幸亏遇上老难友梁栋材，他刑满后被分派在工程队当医生，我偶然在院子里见到他，他给了我一包“四环素”服后解了病痛。

踏进监队，神经就开始紧张，对分派的关注，胜于当年军校毕业分派，事关今后安危，好运厄运在此一遭。提心吊胆，好似要重新投胎那么重要，就怕分到农业大队，那可就苦了。最希望能分配到技术单位，比如分配到工程队看大门，每月工资25元，可以单独住一间房，无须参加任何劳役，伙食比农业队好得多。出监队每天都有各部门、各工厂的干部来挑选技术人员，每个刑满的劳改犯人都要在出监队填报各自的特长和从事的行业，任凭各劳改工厂挑选。每日清早提起精神等待，煞似考生等候考官唱名，伸着脖子，睁大眼睛仰望能中选。分配通常都由挑选单位的主持干部当面测验提问。记得有个卅来岁的天津人，原是劳教升级的刑满劳改犯。外表很帅，有股斯文的学生气质，坐在大伙儿中间，显得很突出，被白湖农场附设的“干部子弟中学”来员选中，成

为该校炊事房的会计，大有一步登天之势，这真是理想的美差，不但工资高而且食宿优越，比金榜提名还要高兴。这种美差，大多挑选成份好的高干子弟或者原是青年干部的人。我自知是敌对阶级，且年老体弱，对于中选进入技术单位已属无望，结果被分配到七大队七队务农。

从劳改队到职工队这个过程，历时十二天，其实仅相隔十来里。只是办了一次出监和分派手续，转了一圈依然被锢在牢笼里。七队的管教干部对刚来的就业者，照例看档案问话。我是大病初愈，消瘦得像无力自持的人，因此将我编在老弱组，组长是个湖北人，以往是湖北帮老大，上海黑社会的小头头，身上刺满龙纹。这个组都是刑满多年的老工，最多工资 20 元，最少的拿十几元。叫我打草绳，每月十八元工资，伙食要花去十元，尚有八元可储存。七大队共有十二个队，和一个种子队及拖拉机站、排灌站、米厂、供应站、裁缝铺和一座大礼堂，每四个队为一个生产点，分布在一万五千亩土地上。我所在的点以五六七八四个队组成，距大队约六里。每队两排宿舍，共廿四间，一个食堂，一个小澡堂，一间医务室和一排仓库、一排厕所，每间房住十二人，每人有一铺位，较劳改队略微宽松。不同的是没有围墙，各队职工，在工余时可以自由交往，炊事员也是刑满职工，每天食堂供应状况一如社会的小饭店庄，有粥饭、馒头、荤素菜肴一律凭票，粮食定量为每人每月四十斤。

从劳改犯到职工

职工队的驻地，通常任凭白湖附近的老百姓出入，各类小贩挑着货担在中午和傍晚走来销售小杂货和食物，如烟酒、鸡鸭鱼肉、蛋、糖果、糕饼等。这些都因为职工平时不准外出，老百姓按其

所需，做这集聚在一起的六七百人的小生意。这是职工队的外貌，在生活上较之当地农民生活略微好些，可比不上城市居民，因为生活水准是与收入成正比。一般说，那时的城市职员每月四十到五十元，高的七十元，低的只有廿九元，而刑满的职工每月平均工资约为廿二元，可是农民的收入不到廿元，低的不上十元。这以生产的年产值而定，贫困地区的农民就谈不上产值，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中国的农民千年以来就过着这种苦日子，共产党也无法把他们从赤贫的情况中解救出来。刑满的职工多数只顾自己，因为自从判刑后就与家庭脱离，留场就业等于依然坐监，所以也就没有家庭责任，有的甚而还受家庭接济。每年回家探亲，多数带些土产，花生、麻油、生油去城市，回场则满载而归。坐监的人苦了许多年，刑满又不能回家团聚，所以家人即使再穷也得给予补偿，好歹也是骨肉一场。不过，反革命犯多数已离婚，妻子另嫁，子女不认，怕受牵连。

全国刑满留监留场就业的职工何止千万，形成了一个最低下的奴化阶层。以白湖而言，刑满就业后可以结婚，无论劳改劳教，刑满解教后，皆可向当局申请结婚。不过男女双方均系刑满就业者，以场为家，婚后生了子女，户口不可外迁。城市有妻儿的也可接来农场居住安家，或来场探望暂住。每个队都设有接待家属的住宿所。有的家属来了不走就留下自谋生计，如做洗衣缝纫、小贩等，更有的私下做私娼。就业职工中，青壮年居多，食的问题改善了，剩下这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在这特殊环境里，很少见女人。一旦刑满，随着生理需要，求偶就成了青年职工的迫切需要。年长者可以在就业一年后请假探望妻儿，可是离了婚和未婚者对性就求之若狂了。少数年轻女眷卖淫的事很快就传开，黑市有价，分为十元、廿元、卅元一宿。也有五十多岁的老妇以五元一宿卖淫，求欢者多为青年。

我所在的七队，有位姓郭的医生，浙江籍，原判七年，刑满后一直留场行医，月薪卅六元。我初到检查身体时，因同为来自上海，即闲谈家常。他知我是儿童服装厂的东主，现出惊讶神色。隔了两个月，医生的老婆从上海来小住，是个退休的女工，丈夫不能回上海，因而每年都来白湖住上几月。好在农场的生活花费低，吃住方便。我听说来了个上海婆，就去探望。医务室郭医生一见面就为我介绍他内人，女的立即操起宁波话：“哝是福成老板？”我点点头说不敢。她又说：“我叫阿翠，以前在哝厂做格，哝勿认得我，我也勿认得哝！大家都变样啦！”阿翠上海打扮，显得白胖年青，看上去不到五十岁。郭医生与我差不多年纪已是六十出头，是个瘦长条子。所谓他乡遇故知，虽非故知，却是东伙关系，有份亲切感。她叙述我离后的家事，句句震心，勾起往事，不觉心酸阵阵。不过她已十多年未与女东来往，打从童装厂并给上海衬衣一厂，她就随转到衬衣一厂，直到退休。

医务室距职工宿舍仅数十步，我每日都在屋荫下打绳，不时见到阿翠在赶她孵出的一群小鸡。抛头露面的次数多，引起色狼的垂涎。这个生产点内有六七百个男人，就是见不到女人。阿翠这个颇具风韵的城市徐娘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因而成了男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有次在浴室中恰巧郭大夫也来入浴，大家见他瘦骨嶙嶙，有人打趣说：“大夫的脂膏都转移到师母身上了，可勿再事勤劳。”引起哗然笑声。

有一天，队长晚点名时向全队职工宣布：“这里有一个逃避劳动、有力不出，装病在家的坏蛋，竟敢乘机奸污妇女。”队长边说边从裤袋里掏出一根麻绳向大家扬了扬，接着说：“你们如果在大忙季节不捨得掉膘，故意逃避双抢（抢收、抢种）装病休息，乘机去医务室强奸职工家属，告诉你，除了你二进宫外，先叫你尝尝这麻绳的滋味。”说完就叫那个色狼站出来，随即将他反手

向背绑了起来，跪在地上。原来这个家伙生得矮小，却色胆包天，向医生佯称肚痛，要求休息。乘郭医生赴工地巡医之际，潜入医务室后向卧房里的阿翠跪下求欢，手里拿着三元钱硬塞给阿翠，被阿翠怒斥撵了出来！

在这些刑满就业的职工头上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还戴着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即剥夺政治权利三至十年。为了摘帽，无不竭尽全力，拼命劳作。一个大约一百六七十人的队要耕耘一千三百多亩水田，除了用拖拉机翻耕大田之外，余下操作全由人畜力完成。在夏秋“双抢”期间，既要在一千多亩的稻谷收割入仓，又要将双季秧苗移栽下田。前后廿来天期限，以百余人力要完成如此繁重的作业，头顶烈日，在 40-50 度的高温下，抢收抢种，即使是金刚之躯，也要叫你掉十斤肉。单单这拔、运、割、插四项繁重劳动，每个人得付出无数的汗水和辛劳。稻把运到场基后，还得经过打场、脱粒、翻晒上堆入仓，又是一道繁重的工序。每年“双抢”，人人胆战心惊，都得在劳动中掉一层膘，脱数层皮。也有人从此一病不起。至于中暑倒地的，每日皆有数起。只有一些年青力壮的彪形大汉，能抵挡酷暑炎夏的煎熬，尚能足吃足喝，其余的平平之辈，只有望食兴叹，无法下咽，只能大量饮用汤水维持体内的水分。这些苦工们在炎阳下身穿短裤，头顶草笠，赤身光脚，周身被晒得像非洲黑人，望之不似我类。

今天熬过了还有数不完的明天，挨不完的苦，盼不来的平安，也放不下悬空的心，头上总觉得顶着千斤重压。总想摘掉那紧箍咒似的反革命帽子，摘帽就成为农工了！可以每年有廿天的探亲假，并可报销来回路费，这就成了职工们暗夜中的微弱光亮。另有一些青年猛汉，天赋一身抗劳的铁骨，他们闯过劳改的险关，职工队给他提供了能吃多吃的本钱，变得比以前更粗壮有力了。他们的人格、脸面从入狱后已化为乌有，剩余的只是动物的本能，

他们像猛兽寻找猎物那样追求女性。原来烈性的人物到了狱中早已自我毁灭，或是逐渐被消亡。劳改造就出来的扭曲了的人，形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特殊社会。

我在职工队依然属于老弱，农忙时在场基翻草，或在大田拾稻穗，入秋时参与旱地作物的收摘，农闲就打草绳。老弱组的职工有少数派在队的边远处小草棚里做看管工作，度着孤独的原始生活。个个都有六七十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一张草蓆裹着抬到青山脚下喂野狗。不过也有例外。有个卅不到的小伙子，也分在老弱组，列在弱的一类，名叫冯一龙，白净面皮，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原是个学生罪犯，体质瘦弱，在全队算得穿着整齐的人，看上去有股上海味道，令人瞩目。他与我邻铺，我的铺位临高，他则稍偏。因为是近邻，不时交谈，颇为投机。他的大哥是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分派到青岛工作。由于不习惯北方的麦食生活，于60年回到上海，然后就申请去了香港，今在香港任工程师，已结婚有个男孩，生活美满。我看了他兄嫂和侄儿的彩色照片，印象深刻。还有一张他哥哥的岳父同全家一起，在澳门葡京酒店门前台阶上的相片，记得特别清楚。我85年进入澳门，也特别到葡京门前拍了照，才圆了一个当时等于天方夜谭似的梦。我与冯一龙成了朋友，他给我他家上海的住址。当我获得宽释离开时，他深有感触，不胜依依。

后来我被留在安徽一个林场。相约见面，那天恰好大雪初晴，我去巢县参加一次集会，雪深不通车，步行去县城，而他也从县里步行来访，中途不期相遇，喜出望外，于是相偕去城里友人家投宿。翌日握别各奔东西。次年又在上海晤面。后来他因不能回上海，而申请去了浙江老家。如今思之，也许他已到了香港乃兄处定居了。这个年青人如果没有哥哥的帮助，必是终生陷入泥沼，全无生还之路。

另一位老伙伴王以詹，在我的记忆中也留有深刻的印象。在我所谓刑满就业的第一年中，我们形影不离。他是位瘦小的老人，年逾古稀，家庭条件优越，家人每月有卅元的汇款。他自备火油炉，可以在中午或晚上自己烧点如意菜肴，算得上是队里的富裕户。

那时物资紧张，这里的干部除了居和食两项胜过外界，其他高档商品依然很难得到。那时手表属于高档品，即使婚嫁喜事也难买到上海产手表。詹老人往往趁回沪之便，暗地为本队干部捎来高档物件，不收分文，故此队里的干部无不对他另眼相看，每年给他批假，逾期也不追究。劳动上更是多方关顾，常常可以病假休息。他于是办理退职回家手续，一经批准就可以回到浙江老家，再进入上海居住。

王老出身于早期无锡纺织学校，追随中国纺织业巨子荣家，曾任荣家申新六厂厂长，乃荣之亲信。三反五反时王被列为专政对象，判刑十年，刑满不准回上海，就业已历十余年，与我同在老弱组打绳。因他年老体弱，同组人不要他做重活。打绳要先捶草，用木制的捶将稻草捶软，三四人同时工作，将一把把草放在一块平整的大石上，其中一人坐在小凳上双手握草把根部不断地在石面上翻动，让另外三人用木捶对着草把有节奏地用力敲打，好似打铁那样。手握草把翻动无须用力，只要将草把不断翻滚移动就可以了。草把全部被捶软后就开始理草，除去废草，留下根根柔软的长草，然后用木制的摇绳机纺经，一人坐在摇绳机上摇动转钮，另三人纺经，待三人纺的草绳都到了规定长度，就将三根经并在一起合成一股，成为一根结实的草绳。王老就做这翻滚草把和摇动机钮的活。这样捶草，即使在冬天，也要脱下棉衣甚而赤膊上阵，累得汗流浹背。在这枯燥乏味的劳动中，也得各自寻找乐趣。捶了一阵草休息时，大家东南西北聊开了。王以詹谈起抗

战胜利那年发生在上海的荣家老板被绑架，要以五十万美钞赎票的故事。原来王老就是这件轰动一时的巨案卷入者，在交五十万赎款前，他参与抄录每张美钞的号码，因而得以破案，案情曲折，令人震惊。

我在劳改队蹲了廿一年，职工队待了一年。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就业队有吃的选择，摆脱劳改队长期吃猪食的痛苦。虽然就业队的饮食不及城市家庭的水准，但在整个大陆的民生标准中已是超出一般农民。回想廿一年监狱生活，只有“非人”的感觉，真是“生不如死”，每忆及此，令人如入冰窖。每日超负荷的劳累使人陷入愚蠢，饥饿使人变成兽，加上精神上的严厉控制，人已不成为其人。我到了就业队，尝到称得上人的饮食，感到一阵满足，这是跟囚食相比而言，其实这种饭食尚不及干部吃剩的残羹剩饭。他们的吃食无须付费，可是就业队连开水都要用钱去买。食量大的吃光了廿元工资不算，还得向家人伸手。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日本人在中国南京杀戮卅万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三千，被传为人类最凶恶的惨事，可是超出这三大罪恶千百倍的镇反、肃反、文革等运动及政权下千百万劳改犯人的悲惨命运，一直被铁幕所封锁，外界不得而知实情。被长期囚禁奴役的众多知识分子，生活在饥饿和劳累病痛的死亡线上，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道德感情在压力下尽皆沦丧，幸存下来的人已经油尽灯干，无力回顾，更遑论为这段悲惨的历史记上一笔了。故而中共的谎言还在继续，劳改制度还在继续蹂躏同胞。

初到就业队有着跨出坭潭的感觉，规则上有一条最吸引人的探亲假，凡刑满而且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就业人员，即时可以申请探亲，假期廿天，旅费可报销。而戴有反革命帽子的就业者，必须在就业一年后方可申请探亲，假期十五天，路费自理。我是个被剥夺政治权五年的就业者，向管教干部申请探亲，结果不准。他

指出我才来两个月不能请假。只得强将一股思念了廿多年的骚动情感压制下来，再耐心等上九个月。以往的沉沉死气，已被近在眼前的迫切见母激情所代替，总算有个盼头。每当想起老母的龙钟凄凉和女儿骨肉的困厄景况，就寝食难安。我自身除了这副老弱的臭皮囊，什么都没有了。俗语说，哀莫大于心死。曾经死过两次的我，不觉得死有多可怕，残余的生命唯一所剩的希望，就是能再见一次老母和儿女。说来也怪，儿女虽有近期长大了的相片，但忆念所及，依旧是她孩提的模样。自从到了白湖，对自己的模样，也是很模糊了。走到水边，见到水中的自己，随着水的微波摇晃，难以辨别真形。依稀看得出瘦削的面孔黝黑似炭，灰暗的光头使我类似个苦行僧。

我慎重地将那补发的卅六元工资，用一只小纸袋包着，无论如何也不敢动用它，这是用六个月的命换来的纸币。隔岸的老百姓以小木舟载来的各种香味扑鼻的食物，多半是廿年未尝到的美味，我也坚持不肯打开小纸袋。我将一件蓝色囚袄打了个翻，用手针加工制作，竟成了一件新袄，以作回家探亲的准备。在第二个月领到工资后，抽出六元买了一条裤料，以五角钱作为借用费，向一个职工的眷属借缝纫机缝了一条西裤，这就完成了探亲的行装。

劫后廿载首次回家

1975年的4月，正值春耕开始，我在油菜地里施肥，已是下午四点了。队里搞宣教的职工过来叫我，说是干事看到我女儿的来信很受感动，知道我九十高龄的老母盼儿心切，要我回去一见，因此干事骑了自行车到大队为我领假条，要我回宿舍。当时我听了后竟激动得哭了。等了廿年多年，愿望将要实现了！心中怦怦

乱跳，不知女儿信中说些什么，竟然感动了共产党干部！果然干事骑车回来了，给了我那张比什么都宝贵的路证，我连连向干事施礼，嘴里喃喃地道谢。他又递给我队部早已拆阅了的女儿的来信，稚气的亲情跃然纸上，令我老泪纵横。

接到路证，胡乱吃了一碗饭就搁下，去作归家的准备。其实我身无长物，无需准备。除了那卅六元和路证，没别的东西。两位职工借给我一件罩衫和一顶旧帽，遮了丑，免得被人误会是逃犯。下身穿上自制的西裤，足登一双黑布面胶底的劳动鞋和一双十多年前离妻寄给的花袜，但如今已没了底，权且蒙上足面，总比光脚强。这一身打扮比上海的乞丐好不了多少，乍看活像乡巴老头进城，一股子寒酸相。有个镇江籍的职工，托我带十斤粳米给他，在镇江南乡的大哥，这提醒我向王以詹借了个拎包，算是不空手，有了个旅行模样。准备就绪，寝钟一响就躺在铺上，无奈不能入眠。大宿舍里的鼾声此起彼落，扰得心里更是烦恼，以致七想八想，从童年随着妈妈回镇江老家，想到“八一三”抗战开始，大西北的军旅生涯，又自抗战胜利到所谓的解放，一直思考到眼前，随后默默地祈祷，愿主恩赐平安，这样辗转反侧了整夜。凌晨三点就悄悄起身，收拾胶鞋、雨衣、衬衣裤、毛巾、牙刷和十斤粳米，全部放入拎包，全副行装，也是我全部的财物。到食堂买了碗粥，吃完上路。从西大圩到青山的小轮码头，要经过横隔东西大圩的干渠和东大圩的中心大道。离开宿舍时，天尚未明，顺着大路行进，每经一个生产点总有恶犬奔来向我狂吠，一路只得拾几块碎石以作防卫武器迎战恶狗，这段廿里长的路，够我走上两小时。走完西大圩这段夜路，与恶狗争战几场，弄得满身大汗，涉水过渠才到了东大圩。这时，恰好我曾经待过的十大队响起了起床钟，我不由得在内心祝愿难友们平安，我已获得探母的自由，祝你们也顺利回家。

掂着小拎包，在晨曦照射的大道上，觉得身轻步捷，迎着朝阳向船码头走去。这段廿里行程从黑夜到天明，除却几次遇犬，没有见到行人。七点稍过，我到近船码头。这时见到人群，纷纷向票房拥去，我以五角钱买了张票，据说九点开船，只得就地坐下等。廿多年来第一次还自踏入社会，恍恍惚惚，我真的自由了吗？可这张路证上仅记着十五天，过后依旧要回到笼里。正想着，迎面走来孙德丽，她一见我就笑着招呼：“恭喜恭喜，熬到头啦，现在回上海？”我站起来与她聊上了。原来她是送她的姑母回上海，不过只送到巢县，从青山到巢县一百廿里，小轮要航行六、七小时，与她坐在船仓里，有了叙旧的话题。我与她的丈夫相识已有十多年了，那时吴鑫与我同在集训队挨苦。吴鑫是烈属，他父亲是中共东海舰队一船长，在“一江三岛”战争中阵亡。他因与继母不和，被继母陷害送往劳教。在劳教期间组织逃跑，被判五年徒刑，解到湖心大队劳改，因此与我相遇在集训队。1976年，吴鑫刑满被留在二大队门诊室当职工，做化验工作，因此常去场部卫生院，得以与孙德丽相识。孙是劳教护士，解教后仍在卫生院当护士，经过一段相爱过程，申请结为夫妇。那时，我在大队门诊室养练队打蓆组，专做枕蓆裁制滚边。作场设在围外木工的瓦屋里，恰好这一排瓦屋腾出一间给吴鑫、孙德丽做新房，所以我跟这对劳改夫妻有缘相识了。他俩在婚期中有了疑难，需要布匹制被，可是因经济和布票的限制，尚缺少好几丈料，见到我手里有着大量用来滚蓆边的花布，每天都一段段剪裁好，放在他夫妇隔壁的作场桌台上，于是吴鑫悄悄央我拿些给他，这是件犯罪行为，被干部知道拿公物偷偷送人，双方都将加刑。当时我不敢答应，愣了一下，对他夫妇说：“这样吧，反正这布料领用时未计数量，你可以在晚间我回围里时，乘看屋的张木匠去伙房打饭，设法进屋随便取用吧。”如此即解决了这个难题，每次我发觉布

少了几块，都闷在心里，然后就看到他的后窗幔是花布，晒的被面和女内衣裤也是花布，不禁心跳怦怦，吓得不敢与他俩说话，唯恐被人发觉。由此我与他俩加深了感情。现在他夫妻俩已生了两个孩子了，被人称为小劳改。这一对真的已在白湖劳改农场扎下根了。

到了巢县，孙德丽赶紧领我到车站搭乘火车到峪溪口，由峪溪搭小轮到南京下关，才六角钱船票，真是经济实惠。火车要半夜开，只得在车站候车棚等。次日天明到峪溪，又赶着到长江航行码头买船票，小轮六时开航，预计下午二时到南京。我这个刚从原始监狱出来的人，感到处处新鲜，觉得这世界很美丽，望着滔滔长江上新建的码头，宽广的马路，高耸的楼房，颇有隔世之感。当了廿来年的井底蛙，乍入自然界，成了刘姥姥第二。小轮内的男男女女，都是我观察推敲的对象，想从这些人身上估量出这时代的真实面貌。

出监后踏入第一个城市——巢县，那里首先使我诧异的是小饭店要排队买“飞”（一张二寸见方的小纸片），上面写着食品的种类和数量，这张“飞”既要付钱又要付粮票，然后拿着“飞子”到灶前排队挨次取食物，由自己端着碗找座位坐下，如果找不到座位时，只得站在一边端着碗边吃边等。同样当你有座位在进食时，你的身后就有人站着等你的位置。这种饭店的供应方式，让人感到失去了自尊，也不尊敬别人。我联想到在劳改队一切都受监规约束，行动被铛铛的钟声所控制。如今踏入社会却被这票证所束缚，大好时光被排队和呆等白白浪费了。时光乃是生命啊！全国如此，那要白白浪费多少大好时光！

踏上下关码头，唯有我最省力，手里只有十来斤提包。我帮着孙德丽的姑妈提一大件行李，走了很长一段路。到下关车站，宽敞的候车大厅坐满了人，找了一个空位，安顿了姑妈，然后打量

大厅一番。这里还是以往那样宏伟气派，不过地面上的痰涕垃圾使这座建筑物逊色了许多！正欲坐下，见跟前有卖大包的，八分一个，不要粮票，我一口气吃了三个大包，既好吃又饱肚。那姑妈带有干粮，无须我照顾。我食毕就到售票处为姑妈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车票，我到镇江距南京仅二百里，票价一元二角，晚十点半开车。

这一切做完之后，天色尚早，就到街上去理发。出车站大厅向右一拐，街口就是大表妹家，她家以前在这街口开设一家杂货食品店，招牌是“大伟”。相隔廿多年，此处已变了样，不见那个店，却仍有那个门面。且先去理发，拣了位老年师傅，留了四个月的头发，样子实在有点邋遢。老师傅很殷勤地为我理了个偏分的发式，我乘此问了隔邻的大伟商店。老师傅答：“大伟的老太早已过世，她媳妇白毛奶奶亦过世了。现在是她儿孙住在那里，儿女成群了！”

半小时后，我走出理发店，来到大伟门前，一排装有玻璃的门板，将原来的店面隔成了客室，中间留一扇门。我敲敲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走来开门，问我找谁，我回说，来看双禄（小名），我自报了姓名（其实我是他的舅爷爷）。他打量了我一下，让我坐下，我估量他是个高干了。不待他询问，我掏出路证让他过目，他看过后问我有什么事。我说：“特来谢谢你妈对我老母的照顾。”他立即回称：“家母早已过世，对老太太并无照顾。”我接着说：“老母尚健在，我现在去镇江探望老人，就便去上海看看儿女。”他随即以肯定的语气，好像下命令地说：“看看母亲是应该的，至于去上海嘛，就不必了！儿女们都已成长，自有他们的前途，无须你关心。”我一听这种无人性的官腔，再也不说什么，这种敌意又鄙视的态度，使我周身发冷，十分后悔不该进入，立即起身告辞。

夜十时半，我乘东去的客车，咔嚓嚓的行车声将我引入沉思，嘀咕着去陈铎家的事。廿九年前我从北平回到上海探望离别八年的父母，在上海家里见到陈铎。他那时在大同大学攻读土木工程，模样很俭朴，见我是个抗战军人，很不以为然，用不屑的口吻说：“舅爷爷，既是胜利了，何必再为国民党卖命呢？”当时我听了觉得这话与他的学生身份十分不合。1951 年秋天，我从上海去南京看大表妹，一到他家，表妹悄悄告诉我：“双禄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与他说话要小心。”果然，他不顾我的老母对他奶奶和妈妈的资助及我和他童年时代的亲密交往，对来探望他的至亲划清界线。他见了我，就向当地公安局举报我。当日公安分局长就来找我问话，要我交代历史，因为陈铎在 45 年底见到我时，我是廿二师六十四团的少校团副，所以我交代到这一级别为止，隐去了剿总二处的职位。虽然仅被押了一个月就放我回上海，但 54 年的逮捕，就是由此而起。忆及以往，面对眼前，不由得悲愤交错。

从沉思中抬起头来，已是高资车站，下一站就是镇江车站，客车停下时正是凌晨一时。下了车，迷茫得像在梦中，随着人群走出检票栅门，就是候车大篷，排列着满满的长椅，稀疏地座着几个旅客，出站的人已散去，我则考虑在候车篷度夜，拣了静处的一张长椅索性躺下，以小提包当枕头。很疲倦，但又睡不着，脑子里翻腾着母亲的形象，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庞，花白的发髻垂在后脑，和我一模一样的眼睛，不知如今是什么样了？信上说不老人家已搬到老家住，好在已离她只有七、八里，天一明就可搭车到乔家门，再走二、三里就是老家了！

天尚未亮，我跨进一家小食店，未开市，于是躺在长凳上休息，等第一笼烧卖出笼，我吃了四个，喝了碗白水上路。经过尚能辨认的京畿岭、宝盖山的隧道口，就到了牌湾街巴士站。乘上大巴，一路野景已与 46 年的景象大不相同，公路两旁增了许多厂房，七

里甸已成了小集镇，转眼间车抵乔家门，看来这里已成了巨镇。我以乡音询问了去老家的路，走进山口，串过坡顶，就远远望见戴家门村子。记得童年时的山村，四面都是树丛幽径，现在所见尽是秃山光顶，荒凉一片。顺着路径直至村中，迎面见一女童，即小声向她请教：“季老太住在那里？”她望了望我，手指一条小巷：“从这块进去就是。”说不上是喜是悲，只觉得心头乱跳，喉头哽噎。穿过小巷就是百年未变的老家，探首张望，不见一人。再跨石槛进了堂屋，向幼时曾住过的老屋一望，见满头银发的老人坐在房门口补衣，我慌忙上前向她跟前一跪，喊声姆妈，哇地哭出声来。母亲双手捧住我的脸，泪花涌现，于是母子互抱大哭。分别了廿二年，老母整九十，盼了这久，儿也已花甲。这母子相会的场面，引来族人男女老少的围观，这些都属侄孙辈，彼此各不相识，但他们都洒了不少同情泪，说道：“这下好了！总算给老太太盼到了！”一些至亲，送来早茶脸水，纷杂了半天，情绪安定了，不免问长问短。他们从我的外表已觉察到我的潦倒凄楚，这与卅年前胜利归来时戎装英武的形象相去天壤。一个刚从监中出来的老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唯有母亲才真的怜惜自己，天赋的母爱，即使我成为路边饿殍，她也不会嫌弃。母亲一生克己仁慈，所以有那么多小辈对她尊敬和同情，在她困难的时刻，仍有几个孙辈为她送柴送水，他们当时格外为我母子团聚庆幸。

那天第一件事，母亲拄着拐棍陪我去大队报户口，使我能住下来，这是中共户籍制度的严格规定。那个大队书记摆着一副官架子看了我的路证，哼了一声：“知道了！”老母这才放心，和我一起走向陈家门大外甥女家去住，他们朴实敦厚的情谊，是母亲的仁慈换来的，我在分享着母亲的贤德所得到的回报。在大外甥女家与老娘住了一周，重温了母亲的慈爱，互相倾诉了廿年的苦难遭遇。母子在死亡的边缘，悲苦的尽头熬过了数十年，一旦见

面千愁百感随着烟消云散。是上帝让天下苦难者蒙恩，将梦想变为真实。

抽空我将妈妈的小屋，作了粗略的清理，主要消灭屋里多得吓人的跳蚤，只要进屋，跳蚤就会跃入裤管，顺着爬到全身。我将母亲一件贴身褂子泡在水盆清洗，见到褂子上满是跳蚤屎，点点血迹，一盆水染成了淡红色，它吸了妈妈多少血啊！不禁心疼得落泪。一张棕绷床的中间有个大窟窿，母亲卧下就陷入半个身子，起不来。我掀开床褥，见无数跳蚤乱蹦，老娘竟以瘦得可怜的躯体在喂养小动物。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已不能自理生活，屋里不见阳光，泥地潮湿易于生虫，这样的阴暗住所对老人的健康构成严重的伤害。十多年来她是如何熬过的？我一面清扫，一面哭泣，喷了消毒水，又遍撒石灰，并将那张破棕绷床搬走，换上木板，将全部寝具曝晒，把马桶拎到塘边洗干净，洒上药水，做完这一切心里才觉轻松一些。只短短住了七天，我就挥泪与母亲告别，相约明年再回来。

出狱后与儿女第一次会面

廿多年没有回上海了。当我出狱后第一次在上海北站下车改乘大巴到城皇庙时，竟在河南路下了车。我走了很长二段路才找到外甥女家。廿年的隔绝，到了上海成了乡巴佬，问了多次始问到外甥女家。上得三楼站在前楼门口，见一个十五、六岁的漂亮姑娘在拖地板，她见我走近，便问我找啥人，我回说：“宋和珍。”又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镇江来。”她呀了一声：“是公公！”于是请我入内并说妈妈就要回来，果然约廿分钟，和珍回来了。和珍已由小姑娘变为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了！从未见过的孙女长得十分出色。这番见面，回顾我一家颠沛的身世，不禁都留下泪

来。和珍说妞妞昨天还问你的消息。我潦倒的外形，和当时的政治压力，使这个当年自动投靠我的贫苦无依女孩，表露了她害怕牵连的心态。她一面招待我吃饭，一面诉说她这里不能留宿的苦衷。她是工人阶级，我是反革命，若留我宿在她家，要承担包庇反革命之嫌，她将成了没有立场的右派了。她要让我女儿来将我领走。是啊！相隔了廿多年，一切都变得不能想象，所谓的妻离子散，正是我的现状。外孙女和同屋的一位少妇，十分同情和好奇，立即分头去通知我女儿，七时许，听到楼下有叫门声。和珍说：“是妞妞来了！舅舅你坐着不要出声，看妞妞还认得你不。”跟着女儿上楼来，行至门口，凝视着我，愣了一下，就冲向我抱住我大哭起来，我激动万分，涕泪交流，父女紧抱住大哭，在场的人也陪着垂泪。离开时女儿才八岁，我正在壮年，眼前我已逾花甲，女儿已是成熟的女性，若途中相遇，定如路人，各不相识。况且彼此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羞辱和苦难，怎不勾起千万宗悲楚辛酸。泣与泪将父女的悲喜交织在一起，当时的激情，在我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待稍微平静后，女儿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们回家去吧！”这又引出我的泪雨。“家”这个如雷贯耳的字，于我太陌生了。我问女儿到哪里，她回说：“到淮海路屋里呀！”

于是向外甥女一家以及几位邻居姑娘告辞致谢。下得楼来，女儿推着自行车，由城皇庙向西走去，女儿叫我搭巴士，我不忍心让女儿骑车跟在大巴后面赶，因此还是步行。一路上父女推车并行，心中百感交集，几致语塞。望着女儿清秀文静的外表，感到难以承受的悲與喜。

女儿倾吐了凄苦悲伤的往事：

1960年公安局强行将我们一家移民到甘肃省山丹，只留下了奶奶一人。妈妈带了我们姊妹三人拜别了奶奶，大家都哭成泪人。到了那边远的穷苦小城，一切都令人恐惧而陌生。吃的是从未见

过的粗粮。我患了水土不服症，周身浮肿，只住了一个半月，再也不能住下去了。那里的公安局只准病了三个儿童回上海，留住妈妈不让走，所以我和两个弟弟又哭哭啼啼别了妈妈，乘了五天火车回到上海。同车厢的人见我们三个儿童可怜，好心人赠给一些食物，五日旅程没挨饿。到了上海见到奶奶，又相抱哭了一场。那时奶奶没有分到房，住在公寓的梯口，虽说只是阁楼底下，但总算回到了家。我姐弟三人没户口，公安局只批每月卅斤救济粮。奶奶自己有廿五斤配给粮和四两油，四人合起来的粮食只够喝稀粥，没有菜票，唯有晚上到楼下垃圾桶拾菜边黄草叶，洗净剁碎了煮稀粥吃，吃完粥奶奶叫我们睡觉，以减少消耗。挨了两年半的饥苦，始报上户口，这也是居民委员会看到奶奶带着三个孙子太可怜，向公安局请求到的。

这一段倾吐，我听得出神，不时阵阵心酸，任凭自己的脚向前迈步，方向莫辨。女儿看了手表，呀了一声：“这是走到哪里了！已是十一点啦！”女儿只顾说话，竟迷了路，赶紧向路人询问。顺着路人指的方向又走了半小时，方到达淮海路，登上小阁楼的家，已是午夜了！

整整在路上行了四个小时，是父女的一次奇特漫步，浸沉在天伦喜乐中，不知疲倦，不知夜深，也不觉腹空，几小时的团聚好似已补偿了廿年离别之苦。女儿的侃侃倾诉填补了我空旷无垠的失落感，驱散了我心灵深处的悲楚。

凑巧大儿宽文已从农场调来市区，在四川北路一家洗染店学熨烫。我一进屋就见到他，可我怎么也认不出这廿来岁的汉子就是宽文。女儿告诉他这是爸爸，他打量了寒酸土气的我，勉强地叫了一声爸爸。一家人本应有的亲情，被冷酷的客观现实冲淡稀释了，这令我痛苦而难堪。女儿告辞了，剩下我与大儿在这八平方小屋里，一宿无话。翌日清早，女儿送来早餐，小提盒里盛着煮

熟了的细麦，这是廿年来未尝过的城市风味。大儿也起床，上班前向我严肃表示：“今后我们只谈生活，不谈政治。”对此，我并不奇怪，这原是中共在青年一代中树立的革命风气，孩子们与我分别廿年，当然有了很大的距离。我当时没有去思考这大孩子的内心，并未意识到这是他发出的划清界限的信号。事后才觉察到，他感染了很深的毛毒和个人主义。

令我极为震惊的是中共统治下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生活规律，竟和监狱里一样，是从上到下统一掌控和支配的，一切紧握在党的控制中，按其需要来收控，个人没有任何独立自主的余地。这里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农村的规律一致，从前的不夜城的风光不再。白天家里不见人，夜晚街市黑暗冷清，与昔时繁华的夜景完全相反。在简陋的小阁中白白度了一日，中午到外甥女家吃饭，下午回到淮海路。晚上大儿下班回来，带我到小饭馆，化了二两粮票，两角五分钱买了碗肉丝面，食毕回屋。我暗自苦思冥想，这所谓的新社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就这样万马齐喑，毫无生气？市面上根本见不到所宣传的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影子。如今简陋匮乏的生活，远不如 54 年我在外面时的水准。一条长长的淮海路上，行人虽多，两边商店却萧条冷清，没有一家兴隆。陈列的高档商品，有价无货，即使指定要买，售货员亦冷面回答：“样品不卖！”只有低劣的货物可以买到，高档的皮鞋、羊毛织品都是装装门面的非卖品。

走在阔别了二十多年的上海街道上，不禁回忆起初入监时的一些生活细节，以及在牢房里听到的声音。提篮桥监狱的正面大门前是东长治路，其余三面邻近什么街我不知道，不过这三面街道早晚发出的声音，令我对它们有着特殊的感情。

提篮桥监狱内像鸽笼似的水泥钢骨小房间，囚着数万个密密麻麻的人，像货物似的堆挤在各间小牢房里。除了窗口偶然飞入麻

雀吱吱喳喳的叫声外，真的寂静得像墓地。除此就是每日四次开封、收封、钢锁与大钥匙相触的嘎嗒嘎嗒声，响彻整个监房。黎明时分，后街粪车夫的“嗨！拎出来！”的喊叫声，将人们唤醒。劳役犯将一盆盆洗脸水放在所有囚房的铁栅门外，众人在各自的囚房内洗漱完毕，又将舀进来的水舀出去，还给原盆，而劳役犯又利用这些盆内的脏水洗地。从窗口看对面人家屋角上的阳光移动，呆呆看它缓缓消失。它告诉囚着的人，白天过去黑夜又临，周而复始，永无尽期。火腿粽子、五香茶叶蛋，这夜半的叫卖声，刺激着枯寂的心，泛起阵阵凄楚，经常彻夜难眠。叮当叮当，盲人可以凭借手持的竹杆探索自己的路向，而囚者纵有千手万脚和明亮的眼，也不能施展什么，看到什么，仅仅凭着直觉和变得灵敏的听觉、变得迟钝的味觉和嗅觉，感觉自己的存在。

听觉告诉我，底层八监是精神病号子。一个沙哑的嗓音，成日叫喊“大晚报、新闻报、老申报要弗？”另一人高声喊着：“肚皮饿、毛泽东吃忒，周恩来吃忒...”是个中年人，每天随着开饭时间，断断续续叫喊几声。另一个凄厉的叫喊是：“报告主管，我要坦白交代，毛泽东是我父亲，我妈妈是满洲人，我也是满洲人，我没有罪，我不是神经病...”总是这几句话，从早叫到晚，每天震荡着千万颗痛苦寂寞的心。有些人最大的盼望是能出去劳动，中壮和青年汉子忍受不了这铁笼式的生活，想着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至少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这个天真的想法一直在监房感染着众人。偶然在病监遇着调出劳动又调回查案或治疗者，他们的说法就不同了。他们说宁可死在铁笼里，也不想出去受那干牛活、吃猪食的罪，干活紧张得像上火线。

一晃廿年的猪狗生活也过来了，抚摸着眼前的创伤，一个失去了一切的政治囚犯，即使等到刑满仍然陷在大牢里，飞不出来。就算有短暂的探亲假期准许到社会走一遭，还得背着反革命标签

到处受管制，没有自由谋生的可能。这行政架构和社会组织，就是无形的镣铐，将人牢牢钉死。与初入监相比，现在好似熬出来了，然而恰如看场电影，一切都可望而不可及，自己依然坐在原位，这世界与我无关。

一周的逗留中，女儿乘星期休息，陪我去看望几位曾经照顾老母和儿女的亲友，以及仍然怀念着我的工人，大家相见时莫不惊叹我死里逃生。临行的前两日，次子接到女儿的电报，由崇明农场赶来上海。他走到小阁的门口，先弯腰探身，唯恐门框碰头似地跨入，低声叫了爸爸，显出害臊的样子。我为他的高大身驱惊奇，从心里感到安慰，含着泪花，握住他的手说，你竟长得这么高啦！刹时浮现我被捕的早晨，与他逗笑的情景，那时他刚满周岁，而现在已是廿三岁，能见到他，我已于愿足矣。

就在那天，广播电台报导了台湾蒋老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不禁暗自悲切，内心一阵空虚感，又一次的失落。唯有默默祈祷，愿代表着光明的台湾，挺拔壮强，永远灿烂，上帝赐恩给执义的人，永远有争取自由的权利。

女儿与次子，送我上火车，父女挥泪而别。火车已开动了，女儿还跟着火车走了很长一段，待不见人影，我始回座位，默默悲伤，相思了廿年的骨肉聚首，仅有一周的聚缘，又告分离，我理不清这是什么世道，何来如此残忍。

火车到南京正是凌晨三点，然后改乘汽车到巢县，南京距巢县约三百里，可候车的时间却耗去了大半天。下午六时到巢县，随即到开往白湖的船码头，不料小轮要到清晨七点才起锚。身上尚剩六元，住旅店要付一元二角，睡澡塘虽只六角，但要等到十二点以后才可就寝，所以唯有在船码头的长木椅上过夜，既不花钱也无须痴等。我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睡码头不算丢人。岂知遇上一个老弟兄，也是回队，却短了路费，回不去，向我借了三元，

答允回去拿了工资就还我，我看了他的路证是十大队就业者，因此就借给了他。自己口袋里只剩下三元，买了船票还有二元二角，不愁吃不上饭。一夜无事，翌日乘小轮回到青山码头，踏上愁人路，复入樊笼。

留场就业以来生活上有了轻松的一面，每逢星期假日，可以请假到场部塘串河小集镇上逛逛，或去别的大队去访访老友，有少数老年人家庭状况宽裕，每月有一二十元汇款，自己可以用火油炉烧菜，在当时来说一二十元的补助，算得高级了！这种情形对我起了鼓舞作用，以为我的儿女都已长成，往后可以给老娘些钱，不用我担心，我的生活可以改善一下，就这样慢慢熬吧！静待时代的变革，于是才出现心安理得的感觉，觉得从畜的生活熬到了人的生活，这差别不算小啊！

在职工队，首先要添置一双雨靴，一件雨衣，因为在劳改队，可以用队里的棕蓑衣和划草蓑衣。到了职工队，公家没有雨衣后，雪天照旧要下田，拿了工资应该自备雨具，即使大雨滂沱也照常和田里干活。我是七队老弱组的成员，平时打绳，农忙时与王以詹几个老弱下田拾稻穗，比之田间的拔秧要轻松得多，虽然整日在炎日下，但肩不负重，手不使力，毕竟属于优差，比较之下能使身体不损，算是天大造化了！实在热狠了，就走向离干部较远的树荫小沟里，浸上一会儿消消暑气，称得是椿乐事。

1975年9月下旬，我接到表兄电报，说母亲病危，要我速归。因老母年已九十，队里准我奔丧。我储了半年的卅元恐怕不够花，钱的困难挡不住我奔丧的哀心。含着悲伤第二次回到老家，却见母亲安然无恙。原来母亲念儿心切，让我回去作第二次会晤。那次真的陪伴老娘，过了两周。此期间专门要女儿到镇江一见。女儿见奶奶老得不能相认，自己已是婷婷女子，可说是悲喜交集。上帝给予的恩赐，无人能阻拦，祖孙三代人，像被冲散的伤残鸟

儿，又从远处飞来老巢，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享受到了片刻的天伦之乐。

就在这甘苦交替的残缺生命中，突然透来一些密而不宣的消息，说是当局正在筹办一次赦令，对国民党的在押军政人员，凡属县团级以上的，都予释放，安置工作。这传说来自二大队一队的犯医王明华。我探亲回队后的一个假日，走访了仍在服刑的王明华，因为他是受到从宽处理的劳改干部，对他有一定的宽度，所以准我与之会晤。我们在1961年他初入监时就相识，乃父系上海宏仁医院院长，是位留美的泌尿科专家，曾为毛泽东的病作过会诊，是当时的所谓权威。王明华有如此背景，所以当上了犯医，他从场部卫生院得来的消息，因而略加透露，他知我是个黄埔毕业的中级军官，有被释的可能。

受到宽释

农场在夏收夏种之后，进入秋管之际，就业队比较轻松，直到秋收完毕才进入一年中最后的储藏冬修阶段。强劳力参加冬修，增加水利防洪设施，无非是挑土挖沟，每日同泥打交道，非挑即挖，肩上隆起了肉瘤，手上增厚了老茧，但并不紧张。假日有了串队访友的机会，因此带来许多小道消息，什么场部在盖礼堂、腾宿舍、制服装，集中厨师炊事人员，准备接待释放的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劳改犯人对于释放的消息特别敏感，这种传闻成了职工队工余闲聊的话题，大家都在估计真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曾于10月份被管教干事召去问话，征询以往经历，主要问团一级官阶，我意识到当局已在调查我的履历了！

1975年12月7日，天空飘着鹅毛大雪，除要道上有行人脚印显出一条黑色路面外，地上已是白茫茫一片。那天我们老弱组正

在工具房洗刷大型农具，突然队部来召。待我到了队部，已有三人先到，于是指导员向我等四人宣布：“你们四人现在要离开本队，有否人欠欠人的手续，立即办清，队部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给你们，下午到大队办理离队手续。明天队里派人将你们的行李送到大队，乘船到场部报到。”说完，事务长按人发给本月工资，然后指导员又给我们说了些慰勉的话，说是党中央对你们这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特人员，实行宽大释放，赦免以往罪恶，使你们回到人民怀抱，安享晚年，你们会获得较好的安排。

四人各自回到宿舍，竟被老弟兄们的羡慕眼色所包围，一片道贺声，有的围拢来问长问短，轰动了整个集中点。这件从未有过的事，一旦宣扬开来，难怪要在大监狱沸腾起来了。劳改的最大希望就是释放，这个苗头一露，引发整个劳改农场人心动荡。许多人拥来要喜糖喜烟，我被这突来的转变，弄得激动不已。中午胡乱吃了些饭菜，相约同命运的一伙一起去大队，路上遇到其他点的同路，整个大队不到十人。大队干事面带笑容进行登记，又发给一个月工资，并告诉明日集中搭船的时间地点。一下袋里竟有了卅多元，遂往供应站买了一斤糖果，一条烟，准备散给同屋同组的弟兄，这东海烟在当时算得上高档，一包烟相当于职工队的一天伙食费，所以散发一支东海烟就显得够意思了。

场部将农业试验站作为集中释放人员的接待所，安徽省拨款 50 万作为接待费，新盖了一座临时性的礼堂，可容千人的座位，购买了一批食具桌凳，召集了相等于科一级的干部来筹办管理，调来了五十人的炊事杂工班子，这在白湖劳改农场还是破天荒第一遭。75 年 12 月 8 号开始，来自各地的受释人员报到，集中在白湖农试站，尚有仍在服刑的，则集中在巢县劳改机械厂。正值严冬，这日大雪纷飞，场部船码头直通农试站的这条大道，泥泞不堪。到达宿舍时，天空忽然开朗，增添了喜色。12 月 24、25 日，人民

日报连续刊登了这个消息，省委办公室主任和高等法院院长主持了宽释仪式，宣布政策。逐个唱名颁发转业证书，记者采访录像等等，煞有介事地折腾了一番。当日还设酒宴，与会者祝贺举杯向首长回敬致谢。被禁锢几十年，大多人已老态龙钟，白发苍苍了。几十辆轿车驶到礼堂门前，从车里出来许多衣冠楚楚、体格肥胖的高级干部，后面跟着几个背录像机的记者和佩短枪的警卫，簇拥走上讲台。我们着实被这场面镇住了！以为政府真的体现宽仁的一面，说到做到，大家高兴了一阵。不料，76年元月3日送走一批去上海的卅七人之后，就改变了政策：“凡家在上海、北京、天津等三城市的一律不能回去，由省里重新安排。所谓“给予公民权，回到人民行列与家人团聚安享晚年，有工作能力者给予工作，无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足旅费，提供方便，有病给予治疗……”完全是登在报上的宣传，既不兑现，又不执行。无缘无故将百多个家在上海的被宽释者，以无家可归的名义，全数送到安徽的各县林场、牧场、果园，给养起来，每月由民政局发给十八元生活费，算是人道主义，如此而已。除了几个医务人员，有的是著名医师，给予定级拿工资外，这十八元生活费与工人的工资相比，就谈不上公民地位了！我依然被罪犯的阴影揪住不放，初到林场时受到精神封锁，林场党支书禁止干部、工人和我谈话，与工人干部做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是每天四角补贴，任凭怎样申请说理，始终未予定级，不以工人看待。文件规定与工人同工同酬，其实仍被岐视为异己分子，这个界限永远不变。而确切的事实是，我们经历了数十年的刻苦磨练，已养成了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认真负责的习惯，只要经我们办的事，无不胜过工人干部。但在当时的政治岐视下，一切的表现只有工人干部私下称赞，领导永远不会消除敌意和偏见。在共产党员看来，我们这一生不会成为伙伴，只有极个别的人被当局选为政治的装

饰品，聘为政协委员去开开会、举举手，制造多党派的民主假象，为中共壮壮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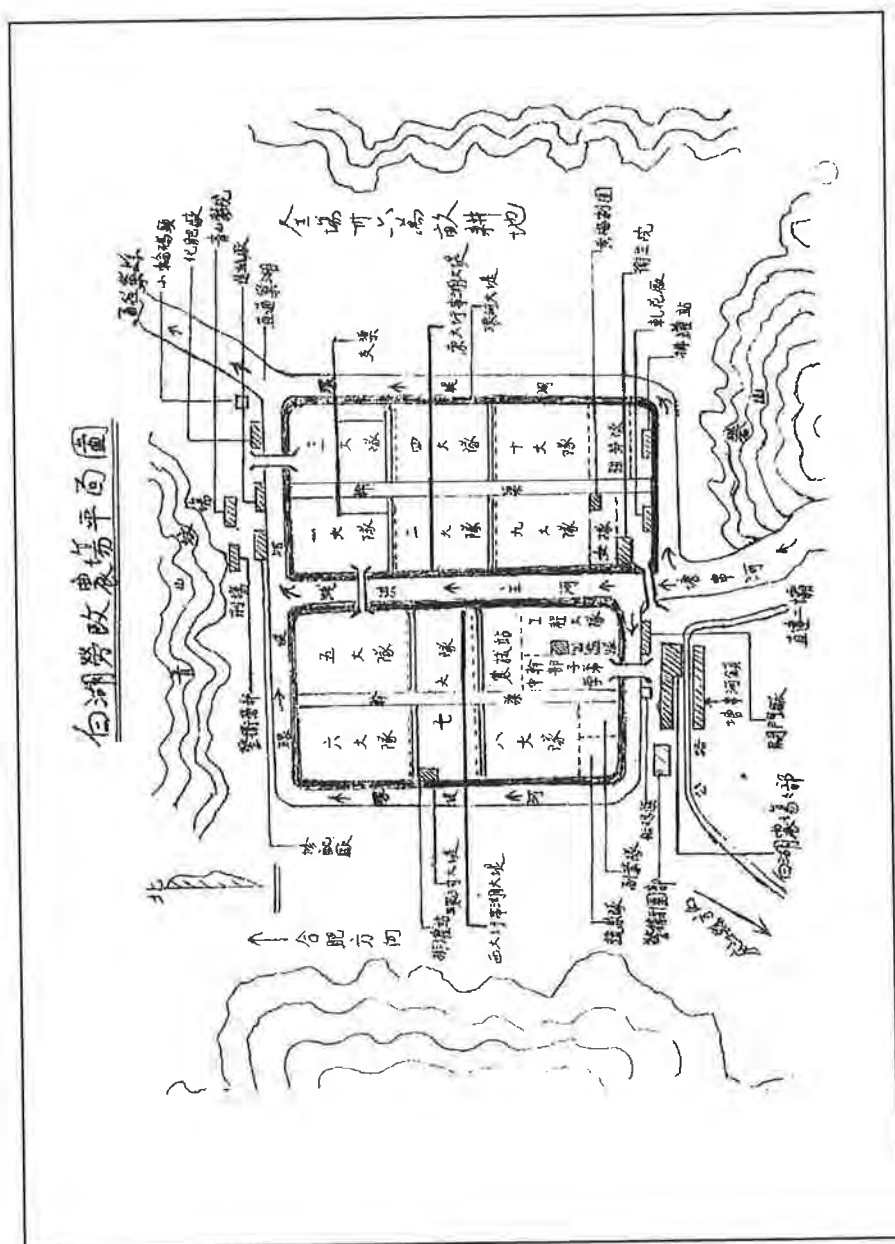
有个同时被释的江西人，他真的投靠了新主，将旧友至亲忘得一干二净。一次在巢湖地区召开的通讯会议上遇到了他，他居然变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尚未当官却摆着官架子，满嘴的马克思高调，后来他也被选进省政协。他曾是前中央日报记者，被暴政的淫威吓倒了，自己明明是个受迫害者，是暴政下的奴隶，却甘愿成为加害者的帮凶，吹捧中共的施政，为共产党贴金，充当精神杀手，为虎作伥。

在这个小县的农村，先后蹲了十年，这是个不算最穷，却也绝不富裕的山区县，耕地只有卅三万亩，人口也是卅三万，全县总收益上千万算是不错了。这个县安插了八名宽释人员，其中四名是汪精卫的军政汉奸，尚有四人中三人是军官，一人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军官中的黄经纬是军校十期生，49年初去了香港，因怀念留在上海的眷属，50年回到上海被捕，判刑十年，劳改中因过份劳苦成了驼背。宽释后的第三年病故，享年七十六岁，火化后埋在林场山脚下。随后又病故了四人，其中两人有家，另两人无家，死后埋在林场的山坡下。只有许延荪在茶场当地娶了个老伴，仍留在茶场任职。

这个林场地处众山之中，乃地区名胜所在，那里筑有环山公路，直通国道。在相连的山岭半腰，建有军用仓库，均是隧道建筑，属于战略设施，有一个团的兵力警戒，完全与民间隔绝，但不断有军政高层前往参观，也有矿产地质学者在这一带考察，而邻近的军区部队不时在这里拉练(野外训练)。

1985年我终于离开了这个山中林场，半个甲子的岁月就在中共的牢狱和形同牢狱的农场和林场中度过，此时我已是68岁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了。

白湖劳改农场平面图



附 说

- 一、 白湖，四面环山自然形成的沼泽湖。1957 年，安徽省调派了数万名劳改和劳教犯人，自塘串河到青山，在湖心筑了一条长二十里的长堤，并抽干堤东的水成为东圩垦田，四面筑了围堤，规划成一块块方田。
- 二、 1960 年又开始在串湖大堤的西面再筑一条同样的长堤，中间相隔 500 公尺。将四面的湖水引到两堤的中间成泄洪的主河，然后又筑成西大圩，因此两面合成了有三十六万亩旱涝保收的白湖劳改农场。
- 三、 所有的堤埂都有三十公尺高，堤面可以供机动车往返行驶，与场部形成斜坡。内部有蛛网般的灌溉设施。
- 四、 二大队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设有两处高墙电网，深围沟。每大队有十二个中队，每四个中队为一个点，每个劳改大队驻有一个警卫连，每个通外界的路口和桥头都有一个班的检查哨把守。
- 五、 白湖农场场部位于塘串河镇的高丘地区，在场部可以观察到全农场景物。场部有四层楼的招待所、电影院、邮电局及一所办公大楼。
- 六、 阀门厂的产品专门外销到世界各国，规范较大，它的宿舍是五层楼房，其余的各厂和劳改队职工队都是一般的瓦房土坑。
- 七、 场部有由汽车队和船队组成的运输大队，工人均是刑满释放人员，唯有阀门厂雇用家属做轻微的工作，各个厂的生产均由职工和一部分劳改犯人担任。
- 八、 劳改刑满的职工，与劳改的差别是职工队没有警卫看守，每月有十七元到三十元的工资，在职工食堂可以任意购买食

物，或向小贩随意买酒买肉，每月有两次休息，可请假到镇上逛逛。每年有一次探亲假，约 15-20 天。

九、 图中所示都是 1976 年的劳改场情况，现在已有变化，但地理位置大致不会变。

十、 交通上以巢县和芜湖对岸二坝渡口较为方便。这两处都有公共汽车直接到达场部。

十一、 场长是县级干部，组织也与县同。

失色的世界

如柳

哀伤的童年

这是一生中最哀伤和难忘的清晨——1954年6月25日，我八岁，晨起与奶奶来到店堂。我一个人在前面玩，突然见到两个大汉走进店内，一个手里拿着手枪对着爸爸，另一个抓住爸背着的双手，用明晃晃的手铐锁上爸的双手，接着这两人一左一右架着爸走出门去。起先我吓得捂住嘴不敢哭，但还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并追到门外喊爸爸。

店堂一侧站在缝纫机边的师傅们都停了活，望着爸被架走，没人吭声，只有阿福师傅将我拉了回来。坐在娃娃车里的周岁弟弟也跟着哭了，他每晨由爸推着在三角小花园溜一圈，然后回来喂乳，此刻落了空。许是他的哭声惊动了在后面灶间的奶奶和楼上的妈妈，急忙走来问什么事。师傅们回说：“老板被两个便衣警察带走了，是对面徐汇分局的公安警察，拿着逮捕证抓走的。”我扑向妈怀里，妈一面抱起弟弟一边摸着我的头叫我不要哭，她自己和奶奶却哭了起来，走向后面女工间。

奶奶与妈妈的悲泣引起男女工人们的同情，议论着老板为什么会被抓走呢。他在五反中还被评为了光荣守法户，他能犯什么法呢？有几个女工流着泪走来安慰奶奶，说老板是好人，不会怎样的。妈低声对奶奶说：“妞妞爸上个月就对我说，公安局要他重写检讨，交代历史，这次可能不会放过了！”果然，这劫数终于到了！这天的傍晚有两个公安来家搜查，抄翻了爸妈的房，取走一些信件、金

子和唱片。第二天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在店面大玻璃橱窗上贴了大字报，写着爸是前国民党华北剿总二处校级情报参谋，是潜伏的特务，已被逮捕法办。

从此我的命运随着我们的家一天天走向消沉没落。我幼小的心灵里认为爸爸绝对不是个坏人，弄清楚了一定会放出来。每天放学回来，我就搬起小板凳，坐在家对面分局门口等爸出来，妈斥责阻止，但我依然偷偷去坐等。后来还是那个门岗向我发狠说：“你爸是反革命，已经解走，这里不准坐。”我这才哭着回家。

就在这时，我家斜对面的法院墙上贴着枪决一个国民党县长的布告。淮海路国泰电影院附近好多家玻璃窗上都贴着检举揭发的大字报，也都是指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一时间显得非常紧张，使我对爸爸的事有了恐惧感，我成了黑五类分子家属，意识到又要面临一次运动。

1955年9月上海提篮桥监狱宣布准许反革命每月与家属接见一次，妈妈陪同奶奶领着我，首次按监狱指定的日期去探监。从早晨八时好不容易排队进入一道道大铁门后，方进入接见场所，那时已是下午了。我们又按划给的号数与许多家属各就各位站成一排。面对铁丝网的一堵墙，是一排铁笼似的小间。哨声响后，那边走来一队犯人，立正然后向左转，这时站在我们对面的正是爸爸，他背着双手正面对着我们，相距约四五公尺，隔着一道齐胸高的水泥墙，上面是铁丝网。一年多未见的爸已变了样，瘦削苍白的脸上显得呆板迟钝，眼里噙着泪，只是说“我很好”，他连连望着奶奶点头，也望着妈和我。我哭了，向后退了几步踮起脚尖才能看到爸爸，还未向他问好，哨声又响了。这有十分钟吗？太短促了！

那边一排人又是向左转成一路纵队向前走去，并挥手说再见，我不舍道别，抱住屋柱哭着不肯走，妈发急拖着我走，奶奶在擦眼泪。此后好多次都是这样，这种接见真叫难受。有一次接见看到爸

穿的全是带补丁的衬衣，现出一副穷途末路的憔悴形象，我好心酸。他已被判十年徒刑。

自从爸爸入监后，妈很难应对店里的生产经营。反革命犯人的家属，政治地位次人一等，虽是资方，实际上已被剥夺了主导权，一切要听从工人支配。财务收支全归会计掌握，所有运作由中百公司、人民银行、税局三方面控制，妈妈只是管本厂工艺社的接定单、购原料、按期送货的专任职员而已。原本的资方自主经营变成被动的领工资听分配一族，在精神上陷入孤单无援的苦恼。家中原来有两人工资，经济自主，生活宽裕，如今只有妈一人所得，经济上十分拮据。加之工厂在压缩开支、降低成本的理由下，将妈的工资减去一半，每月只有一百四十元，我们只得辞去乳娘和保姆，家务由七十岁的奶奶承担。当我十岁时，就接手家中洗衣煮饭的杂务了。1956年，全上海进入公私合营高潮，公方派了位经理管工艺社，他是个党员干部，妈任副经理，有名无实，仍然做原先的职务。没多久，妈与经理发生磨擦，经理多次找岔，继而指妈抽逃资金，工人检举妈偷盗布匹，妈被处分，由群众监管，革去副经理职务，调往常熟路口模范服装店任营业员，工资削为50元。这个晴天霹雳的打击，毁掉了全家的生计。我们原来的工艺社公私合营后，迁出原来淮海中路1352号住屋，搬入渝园公寓三楼24室，每月要付30元房租，这日子怎么过？

更令我们惊骇的是公安局协同居委会动员疏散上海人口，要我家迁移到甘肃落户，这个讯息吓得妈说不出话来，抱着我和弟弟失声痛哭。妈去公安局求情，一个妇女携着一老三小，突然迁往人生地不熟的遥远山区，势必无法生存，请求让我们去济南老家。公安局的答复是，你们想自找出路不会阻止，但不会出函介绍。妈妈听说 not 阻止，就决意去济南她的老家。一阵忙碌，将家中所有家具什物、箱笼统统由火车托运。除了奶奶，一行四口于1959年岁尾到

了济南姨母家。姨父母居于祖传的老宅子，姨父是化工厂总工程师，家景兴旺，育有两男两女，生活优越，他们对我们母女四人以礼相待。不料当地公安不接受外地户口，除非上海民政公安方面有介绍文件。长期报不上户口，当然也就领不到粮油等生活必需的购物票，更不可能长期享用姨家的配给，这是攸关性命的大问题。住了几天再也待不下去了，妈含泪向自己的亲妹妹要求体谅困况，留下大弟宽文在济南由姨抚养。于是我们又收拾家具行李，除了姨需要的厨柜外，又如数托运回上海。这一来一往折腾一翻，实乃难上加难的失当举措。奶奶见我们突然又回来，惊喜交集，只见小孙宽文不见了，大惊，诧异地望着妈愁苦无奈的脸，悲从中来。

未几，公安连连来催，软硬兼施。软的一招是宣称政府早有安排，甘肃山丹是新兴城市，有着良好的开创条件，气候宜人，当地政府已作好接待准备，有吃有住有工作，并且，上海发给疏散户足够的安家路费。硬的一手则是已吊销了上海户口，今后的生活票证须在迁居地方可领取。必须执行命令式，按指定日期出发。妈妈以弟弟有病在济南来拖延时间，以期放宽限期，可继续领配给票证。其实我家尚有难言隐痛，妈打从去济南后，已被辞工，回来后不仅不能复工，连户口亦被冻结，已是山穷水尽，以典卖衣物度日了！

就在这进退维谷之际，接获姨母来函，说宽文闹着要回上海。妈随即要我去接，十一岁的我从未独自出门，但现实非我莫属，壮了壮胆就担下这个责任。我小心翼翼地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熬过了拥挤的两天一夜，抵达济南站后改搭公车到纬三路姨家。一进门，见宽文弟正在厨房拉风箱，我喊了声宽文，他回头看是我，跳起身扑到我面前笑起来了。他又黄又瘦的脸使我吃了一惊：“你病啦？”这一问，弟竟被问哭了。我急忙岔开话题向姨请安问好，她呼着我的小说说：“你来得正好，宽文是想妈想病的，你来接回去就好啦！”次日，姨为我们买了车票回上海，在车上，宽文说了在姨家的委屈，

他们不让他上学，成天帮她干活，每天都吃山芋干及杂和麦，吞不下去，饿得发晕。我听了暗自纳闷，为什么姨母也这样苛待小辈？是阶级因素吗？因为爸是反革命？

迫迁甘肃

1960年的初夏，在徐汇分局取消了我家的户口，走投无路的惨景下，我们服从了疏散的命令。妈是受管制分子，根本没有反对的余地，况且全国正逢饥荒，没有户口，太可怕了。我们只得执着迁居文件，挥泪告别奶奶。当时奶奶对着这家庭突然拆散的凄凉，哭得几乎晕厥。我们万般无奈地边哭边走，奶奶送我们直到十五路巴士站。

所谓的“安家路费”，只是四张火车票和行李托运单据，如此而已。经五日五夜的车行，我们到了甘肃山丹县。这里原来是处秃山和黄土合成的落后小山城。干部将我们一家人领到一所空荡荡的大屋内，没有任何设备，除了墙就是砖地，里面住着一堆又一堆人，皆铺地而卧。妈妈就在空档放下行李，席子摊在砖地上。我们坐定后与邻近的人交谈，才知竟都是从上海来的黑五类，我们被骗了。上海公安所说的新兴城市有良好的开创条件皆属谎言，妈妈望着这偏僻荒凉的景象暗自流泪，我发着愣。小弟突然哇地哭着，手指不远处躺着的几具尸体。我转过身来不敢再瞧，妈妈搂住小弟，大家都背朝外。邻铺人见状，安慰我们不要怕，待会就有人来抬去埋，那些是饿死的本地人。

这住所是专门接纳上海移民的集中点。傍晚，当地干部来看人数并招呼开饭，妈妈拿着仅有的面盆前去，打来当地人叫“糊酪”（即杂粮粉做成的粥加上些青菜油盐葱蒜）的吃食，分在四只碗里，大弟弟最“猴急”，抢先拣一碗满的端起来就喝，一下子烫痛了，

张着嘴叫唤，引起一些当地人围观，羡慕我们吃得好，望着糊酪咽口水。其中一个年轻妇女站在我们跟前，见面盆里尚剩有糊粘粘，冲来捧起面盆舔完了还不走，指着要舔我们的碗。妈对她很同情，见她手背上有一层污垢，嫌她齜齜，不想让她舔碗，于是取出一块香皂叫她去洗手。谁知她喜得张口想吃，妈急忙阻止。一日两餐皆以糊酪充饥，我对之并不生厌而嫌其不足。水分多的糊酪，多喝了，频频小解，白天犹可，夜间总不能跑到院外老远上土厕，被那些尸体吓死。无奈妈只有将仅有的面盆当尿盆，一物四用，洗脸、洗脚、打饭、撒尿。上下不分，够荒谬了！

我和弟弟因营养不良及水土不服而浮肿，体质日益衰弱。大院外的路上不断有饿死的陈尸，使我和两个弟弟不敢外出，成天只能卷在铺上不活动。每当开饭，一些当地的妇女儿童拥来乞食的凄情令人恐惧。我们觉得这可怕的鬼地方不能再住下去。

正在这当口，妈被派在车站缝纫组工作，所称的缝纫组，不过是东站的一间房屋里放着两部老旧缝纫机，一架案板五张长凳，连妈在内共五个工人。车站的李站长命我家四口迁到站里住，食宿在一起，白天是工场，晚上作卧房。这事使我们喜出望外，现出长期以来没有的欢笑，终于有了个固定的住所了。

这里没有医院亦没学校，这东站算是新的建设，一边有公安派出所。我和弟弟有了活动空间，日夜来往的列车川流不息，新的环境使我增长了见闻，但亦令我惊骇和迷茫。1960年正值全国大饥荒的高潮，这偏僻小县显得格外黯然恐怖。东站是这小县的唯一对外交通中心，兰州来的，玉门往的都要经过山丹，逃饥荒的百姓都从这里上下车。我们经常看到列车到站时，有人将饿死的和奄奄一息的人抬下车，放在月台上。李站长是位心善的好人，常煮些稀汤去喂那尚有气息的饥民，因而救活许多人。我们也看到一些坏蛋，发死人财，他们乘抬尸体的机会将死人的衣物占为己有，然后将赤裸

的尸体拉到崖下埋掉。

李站长的小儿子很顽皮，他的足迹遍及周围山岗野地，赤条条象个野人，到了晚上才套上光壳棉袄。他虽然只有七八岁，但胆量胜过大人。有天他带小弟宽行到坡下山腰坪上去玩，吓得小弟惊叫。我顺着叫声跑去，见小弟狂奔上坡，手指坡下大声哭喊。我放眼望去也惊骇不已，坡下的草坪上李站长的小儿正在把一个骷髅头当球踢着玩。坪上尸骨狼籍，遍地皆是。我带着弟弟回来，向李站长诉说，站长立即走去叫回儿子怒斥一顿。他对我说，那里一直是埋人的乱塚地，近半年饿死的都拖到那里埋掉，引来狼和野狗都去觅食。这两年没有管也无法管，时间长了，愈积愈多，更没有力量去清理了。他说没什么，习惯了就不怕。我听得毛骨悚然，自此不敢外出。看到大院列车站一批又一批的尸体，我惊恐万分，日夜难安，常常由梦中惊醒，感到周遭阴森恐怖。每餐吃不饱，引起严重的浮肿及神经恍惚症。妈每月收入仅有廿元上下，不够一家四口的口粮，生活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我们变卖了带来的衣物，也只能救一时之急。渐渐地我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绝望中投奔老祖母

在绝望之中，妈妈向公安局申请，将我和两个弟弟送回上海。申请得到批准，孩子可以回上海，妈妈被扣留下来不准离开甘肃。好心的李站长帮了很大忙，弄到三张半票，并且特意向乘务员招呼要照顾我们姊弟。就这样，由十一岁的我带领饿得歪歪倒倒八岁的宽文、五岁的宽行，开始了五日夜的长途旅行。临上车，妈给了五元钱、一条被和一个小包袱，里面是换洗的衣服。李站长将我们送上车，车厢里已无插足之地，那位受托的乘务员将我三个领到乘务员室，总算有了坐位。乘务员还给了一大串山薯干，使我们一路没

有捱饿。每到一站人潮汹涌，与山丹车站一样，站台附近有尸体，站站如此，有的甚至多得叠在一起，靠近铁道路轨的看得很清楚，有的仰着睁眼张口，有的扑着，半边脸和嘴尽是泥土，形状恐怖，惨不忍睹。五岁的小弟在站上根本不敢向窗外瞧。

列车到了兰州终点，统统下车，要换车到上海。那位和善的乘务员将我们领到站台，告诉我开往上海的列车从这儿出发，到时站里会招呼上车，说完他拍拍我的肩就走了。我望了望四周边，下车的人群渐渐散去，现出大站的规模。再望望进出口的两边，有几个汉子在剥死人衣服，连被子捆起拿走。这大站的尸体多得吓人，怎么没人管？这比山丹更怪，我不敢看，与两个弟弟闭上眼睛相抱在一起。约有个来钟头，列车进站了，站口的人群蜂拥而入，站上的喇叭响了，叫东去的旅客上车。待我们随着滚滚人流上得车厢，已是没了坐位，只得侧身挤在厕所前坐下，被子权作坐垫。车厢内水泄不通，我们没有乘务员的照顾，挤了三天三夜，不能动弹。也不知经过多少站头，到了什么地方，饿了吃山薯干，渴了买开水喝，捱到了终点上海北站。我的腿肿得似一段木头，迈不了步，要宽文扶着我走，酸痛得掉眼泪。一拐一踉走出长长的月台站道，又慢慢蹀到十五路大巴站，在淮海路下车奔向自己的家。

到了渝园公寓，遇上住在汽车间的“荣庆娘”，方知我们已没有家。自从我们去了甘肃，住房就被警卫封闭了，奶奶现栖身于大楼梯下。这里是我们生长的地方，一到就有无比的亲切感，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和我们一起长大，是我家的标志，这宽广的弄内走道是我骑车嬉戏的所在，怎么这一切都永远离我而去了吗？这时，见奶奶弓着腰背米回来，我不顾疼痛趋前抱住奶奶大哭起来。奶奶从肩上卸下小包，上半身弯曲，还未看见弟弟们，她垂泪挽着我问：“你怎么来的，好乖乖？”两个弟弟也迎上来拖住奶奶哇哇哭着。祖孙抱在一起，万分激动。奶奶随即领我们到公寓大梯下她老人家的栖

身之所，我们从荣庆娘门前经过，她高声说：“老奶奶你的难题来了，你这么大年纪怎么带三个孙孙呢？”奶奶没有出声。我环顾这楼梯下，无门无窗也无遮掩，十分简单，但比起山丹的大院和车站的那些尸体堆不知要温暖安全多少。我将那些从未见过的惊恐景象说给奶奶听，她连连摇头叹息。看见我一双鼓胀的水肿腿，心疼得直喊可怜。她将箱柜作木板铺，叫我躺下休息，又忙着给我们洗脸洗脚，煮粥。

公寓的驻卫警逼得奶奶无处安身，像流浪人似的栖于大楼梯下，度着凄苦的生活，现在又添了我姊弟三口，这日子怎么过呢？我拿出妈妈给我的五元钱，望着十多斤米，思忖这能维持多久呢？奶奶安慰我说，明天就去报户口。这是 1960 年的初冬，尚不算冷，妈妈说会寄钱来，可是粮食怎么办呢？我和奶奶一同去派出所，公安人员回称迁出的户口不可以迁入。如果孩子有病回来，政策上规定可以借粮，不过没有其他配给。奶奶的配给是 25 斤粮、四两油，每天有三两菜。而我和大弟可以每月借 42 斤粮，小弟 16 斤。其他一概没有，并且规定每半月批借一次。这配量不能喂饱我们这几个“饥民”，所以我们很少煮干饭，只煮稀粥灌满肚子。奶奶总是煮菜粥，配给的三两菜只能买一棵青菜，当然不够，于是我们就在夜晚在垃圾箱拾黄叶菜根补充，也去捡报纸和字纸卖，它们的价值太微了，字纸每斤一分钱。这种丢人的事奶奶不让我做，她总是和宽文一起趁黑去。她的理由是小姑娘不可抛头露面被人瞧不起。我们喝完稀粥就睡觉，怕多耗体力，会加重营养不良症。

和奶奶一起的辛酸生活延续了两年多，也荒废了学业。直到 1963 年，经奶奶不断向居民委员会哀求，以生长在上海，不服甘肃的水土为由为我们申请户口，最终被公安局批准。我们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十多年。此期间还经历了妈妈与在监的爸爸离婚他嫁的苦楚，妈妈这样才得以返回上海，帮助我们入学，以致能读到初中毕

业。1965年，奶奶因分配到的小阁楼房小梯陡，上下不便而移居老家镇江农村。我姊弟三人就在这小阁楼上度过了童年，直到文革宽文下放奉贤农场，宽行下放崇明农场，姊弟始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文革中的磨练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这时正值初中毕业，在这个大风暴中，我属于老三届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无缘参加红卫兵，但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是第二女中的学生，同学们都派在上海郊区的闵行公社。这里是受红小将们清洗的地方，村里的老坟都被红卫兵翻了个身，棺材板被农民收了回去，我们正好赶上。第一天晚上，贫农老大娘安排我们在用棺材板搭的铺上睡觉，铺挨铺摆成一排。我先是感到奇怪，怎么都是一律的厚厚旧木板，俯身仔细一瞧，原来尽是棺材板，结果引起大伙儿的惊恐，喊叫着转身就跑。第一天贫农大娘给了个下马威，吓得姑娘们个个伸舌头。此后虽说只有一周的锻炼，可是烈日下、汗水中，镰刀锄头的滋味样样都尝遍。脸晒红了，手磨破了，腰酸脚疼。二九之龄的我，若无甘肃噩梦似的经历，定会忍受不了这再教育的历练。这风暴使我两个弟弟也先后下乡，被锻炼了整整四个年头，成了道地的庄稼汉。每月领十八元的收入，刚够自食其力。若非邓小平当政，他俩回不了上海，当不上工人阶级。

从课堂进入工厂

三年的初中教育，学了一些基本知识。当时的必读课文是“老三篇”、解放军叔叔的英雄事迹、毛泽东的生平等。其实这些读物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不断地有介绍。带着这些知识，背着反革命

爸爸的十字架，我步出学校进入工厂。有两个弟弟下乡，我这个女孩子就可留在城市，被分配在第 33 织布厂当徒工，每月廿六元报酬。

工厂的活太紧张，累得面黄肌瘦。我每天八小时不停地奔忙在布机前，棉纱的绒絮飞入呼吸道，引发肺气管变异，这种职业病一经缠上就很难摆脱掉。厂书记布置的竞赛任务日日新，要超时超产完成。争红旗、争先进、争模范的广播喇叭，不断报道各组的成绩，令人神经紧绷，顾不到饥渴。这种铺天盖地的鼓动方式，往往令人颠狂，追赶满堂红、日日红。如果一个月不缺勤，可得七元奖金。为了奖金，为了集体红旗，即使身体不适也强忍着上班。

从徒工到转正要经过班组评比，书记把关，将考核报劳动局批准。这道关是正式工人的必由之路，要付出辛苦的代价。转正后的工资每月卅六元。欲提高级别须在技术上突破，一般人竭尽所能也只是三四级工，再往上就很难，更谈不上当模范了。婚姻也同样很压抑，黑五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贱民相仿，与无产阶级之间有条鸿沟难以逾越。内心深处怀有深度的自卑感，现实环境中诱惑、逼迫和压抑是并存的，我感到恐惧却无能力改变现实，只得逆来顺受，隐约之中觉得社会对我家比别的家庭有着更过份的苛求。我无父无母，弟弟在乡下，孑然一身，我的居处称不上家，没有温暖和安全感，更没有欢乐。

拥抱阔别廿年的父亲

1975 年的 4 月，我盼望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以为爸刑满该回来了，却杳无音讯。忍不住写了封信给父亲，说即使不挂着儿女，总该想到九十高龄的奶奶吧，她老人家日盼夜盼痴望了廿多年，望穿了眼，流干了泪，你为什么不来看看她呢？

信发出后的不久，一天下班后，晚饭毕，突然间姨女毛头跑来告之：“公公来了，在我家呢！”我立即跨上自行车向老城隍庙福民路驶去。到了表姊家楼下，急匆匆登上三楼，见一老人端坐在临窗的椅上。我急步向前哭着叫爸，父女紧紧抱住在一起，痛哭失声。我悲喜交集打量爸爸，虽然依稀还有我记忆中的轮廓，但二十载的隔绝，他已是形容枯槁，老态龙钟的老人了。爸再三端详我，执住我的手说：“若没有你的信打动管教干部，我得再等一年方可请假探亲呢。重刑反革命犯刑满须留置一年，始准假探亲半月，路费自备。此次本来只能到老家看望奶奶，不能来上海看你，多亏你这封情感感人的信。”说着又垂泪哽咽一阵。爸要看两个弟弟，又说：“这里的居委会不许我留宿，今晚我宿在那里？”我说：“我们回家吧！”我推着车，父女俩向淮海路走去。走了四个小时，腿酸不支，原来过于兴奋走岔了方向，竟然连家都不认识了！第二天我电话告知四川路洗衣店的宽文，又电报给崇明的宽行，他俩先后来到淮海中路 1329 号的小阁楼与爸相聚。

宽行那天到达，低着头弯腰进门，他很高大，比爸高一头。毕竟是男儿汉，相见时没有过分的悲情。期间，有天晚上广播说台湾的蒋介石去世，爸听到后黯然长叹，良久无语。

转眼间过了一周，爸的假满，临行前嘱咐，奶奶在乡下很清苦，每月由表伯给六元生活费，但至少要有十六元方能稍加改善。爸说他出五元，我出三元，要宽文出二元，可是宽文不答。我知道爸每月工资只 18 元，他 1974 年刑满过期六个月未放，劳改农场补发了每月六元的工资，共 36 元，才凑足路费来上海的。我发现他穿的短袜没有底，末了知道他的罩衫和头上的解放帽都是借来的，一件衬衣领子是破的，我心酸了好一阵，但又无力资助，只买了件衬衣给他聊表心意。走的那天，我和小弟送他到北站，在月台上挥泪而别。列车开动，爸从窗口探出头来，我随车跟行了一段，挥手直到

不见人影，我见爸又哭了。

1975 年 12 月下旬，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中央决策，将宽释一批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1976 年元月，接获爸自安徽来信，并附来 50 元，大意说“有幸被中央列为县团级军人，受到宽释成为公民。与家人团聚，给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发给衣被及 100 元零花钱。他把 50 元给我们姊弟，30 元给奶奶。”接着公安局户籍警来访问，告知爸即将回上海落户，问我是否接受。这一连串讯息，使我欣喜万状，并告诉两个弟弟。小弟尚未上调转正，月工资仅 18 元，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卡其青年装。

原以为隔了半年爸能跳出劳改队，奶奶似死后复生一般高兴。然而等了几个月还是没回来的消息，直到四月中旬始知，周总理病故后，上海市长张春桥改变决策，不接受家在上海的宽释人员，因此爸爸已被安置在苍山林场养起来，竟空欢喜一场。

他老人家作为“留场人员”在那儿又待了九年，直到 1985 年才真正的脱离苦海。整整三十载的光阴都虚度在地狱一般的劳改营、农场、林场中。

新的生命篇章

如柳

祖母病逝

正凝聚视线在检查疵点，办公室人事干部走来，比划手势叫我关上电掣，跟着递给我一份急电，上面是“祖母病危速来镇江”，下面注着表伯的名。对着这行字一阵心酸，几乎哭出来，即刻到办公室请了假，并在厂里电话通知两个弟弟，约在北站乘当夜一点的火车去镇江。匆匆如约和两个弟进入开往南京的列车，摇动喧闹的车驰声使我忆起十六年前，妈妈和我们姐弟三人被逼泣别奶奶，移民甘肃的情景，那些炙心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

当我们姐弟三人受不了甘肃的饥饿而被送返上海时，是奶奶把我们收留了下来，虽然她自己 also 过着如乞丐一般的生活，她住在楼梯梯阶下，在那块三尺见方之地接纳了我们三个孤儿。在那饥饿的年代，奶奶是我们掉在水中，手里仅剩的一根稻草，生命中的一星微光。

我们长大了，每人的生活也依然窘困万分，对奶奶无以回报。现在她老人家倒下了，我心酸中带着愧疚。

五小时的行程，浑浑然到了镇江站，下车后急忙赶往老家的村子。童年在奶奶的牵领下，曾来这里探望爷爷，住上十天半月才返回上海，爷爷白发银鬓的龙钟老态犹依稀在念。三里行程，在快步中迅速迈过，匆匆跨进老家的大门，屋内寂然无声，奶奶的房门敞着，恰好表婶端着面盆出来。她高兴地向我们招呼，回头又喊：“姑太太这可好了，孙子孙女都来了！”我急忙走近床前，见老人家堆

满绉纹的苍白脸上泪痕斑斑，此时她露出笑容。我轻声叫奶奶，她张口要说什么，但声音低得听不清。表婶说：“老太太已四、五天没吃东西了，只能喝点米汤和滚水，看看不中了。所以才打电报给你们。”族里的哥嫂们给我们预备了食宿，我姊弟三人哀哀地守着奶奶。

隔了一天，爸亦从安徽赶来，见我们先到，露出难以描绘的悦色，随即走向奶奶床前，垂泪哽咽。奶奶移动着手，爸急忙握住，泪流满面，说不上话来，这是祖孙三代人，二十多年中第一次团聚。爸爸入狱时我才八岁，大弟四岁，小弟刚满周岁，如今奶奶病危，我们相聚，爸爸已成了老人，妈妈他嫁，我们都已二十多岁。我记得八岁之前，家中热闹兴旺，经济情况优越，爸爸厂内的员工和家里的佣工对我们十分宠爱呵护，那些欢乐盛况都因爸爸被囚，顷刻烟消云散，我们沦落得温饱都无着落。

守着奶奶的第三天正逢中秋佳节，她老人家已经不省人事了。族里的大哥们抬来早已预备的寿材，搁在堂屋中央。大嫂们取来热水为奶奶净身，我也跟着为老人家梳头洗脚，里外换上干净的衣服和鞋袜。见到奶奶干瘪的身体，忍不住的泪水打湿了奶奶的衣裳。两位大哥从内房抱出奶奶，安放在堂屋的寿材盖上。也许经一番移动，奶奶到了堂屋清醒许多，突然望着爸示意，爸将耳朵靠近奶奶的嘴，奶奶说：“中秋节呀难得一家团圆，你带三个孩子去吃蟹黄包，孩子们没有尝过啊。”说完又摆手，示意快去。爸含着泪对奶奶说：“能一家团聚守着奶奶过中秋，比吃包子高兴多哩！”

多么慈祥的奶奶啊！危在旦夕的时刻仍在关心着儿孙。此时有个老年的嫂嫂悄悄对我说：“看样子老太太要挨过中秋节才肯走哩！”真的，那天爸爸守夜，安祥地度过了明亮的中秋夜。次晨爸喂滚水给奶奶饮后就去睡了，由我守着。中午爸起身吃了午饭又去睡。下午三时过后，我见奶奶原是仰卧，忽然间头向右一歪，脚伸

了伸，眼就闭了。我急忙走近握住奶奶的手，呼叫奶奶，已没有回应，赶紧叫醒爸爸。

这时恰巧堂屋的喇叭响，低沉的声音报道毛泽东的死讯，接着响起了哀乐，好像普天下都为我们慈祥的奶奶哀悼。爸爸和我们都哭了！这是 1976 年 9 月 9 日下午三时半，祖母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哭声惊动了族人，都拥来围着奶奶哭泣，大家都说着老人一生克己，慈爱待人。族内哥嫂提出按乡里习俗，先让祖母落材，然后才向奶奶娘家人报丧。我奉给爸爸五十元作为安葬费用，由他主持后事。爸命我抱奶奶头，两个弟弟抱脚，爸爸抚在中间，大哥们帮助将奶奶挪到寿材里面。我们为奶奶的遗体盖上朦面纸，又在脚头点燃长明灯和供品。这一夜由我们父子四人轮流守着祖母遗体。翌日，祖母娘家的侄孙辈从七里甸赶来吊祭，瞻仰了遗容，合上棺盖封了口。请来八位乡里的壮汉抬起棺柩，爸爸率领我们三个孙儿，尊礼成服，随后送上村前的山坡，由爸爸选了方位将亲爱的祖母落葬。

在这简单的仪式中，族中老少纷纷传言，老太太和老爷子在以往的年代是西乡远近驰名的财人，经过两次战争，晚年受了大苦。如今子孙都赶来送葬，称得上高寿有福了！然而这草率的葬礼，让我们一家深深意识到我们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贱民，是黑五类。姐弟三人受教育的权利受到限制，我只准读到初中就被分配到工厂当徒工，每月二十六元工资。两个弟弟被下放到农场放牛，每月得十八元。我是反革命的女儿，到处背着这黑五类的牌子，生活和婚姻受到深重的影响，永无出头之日。我不甘心生命白白消耗掉，想到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更是心寒。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没有我家自由生存的余地，除非跳出这魔网。

澳门的打工妹

1979年，上海许多人出境，前往香港、澳门这两个自由港口，到澳门尤其容易。据说在澳门打工比上海优厚得多，而且只须澳门有亲戚来信，即可向公安局申请，很易批准。这讯息点燃了我的希望。恰好有位表姨自台湾到澳门办事，来了封信，于是抓住这机会向公安局申请。公安局规定必须取得工作单位的同意方可批发出境证，因此费了许多口舌，向工厂的领导陈情疏通，以身体虚弱不适应离职、澳门的亲戚需要我陪伴为理由，厂书记终于批准了，还发了一笔离职金。接着公安局批给了通行证，我于1980年10月抵达澳门，达成了奔向自由的心愿。

到了澳门，我并未得到亲戚的照顾，靠自己的退职金换成港币，在贫民区租了一个床位，与三个打工妹合住一间房，每月付150元租金。初到自由社会处处都陌生，也经常受气。当地人瞧不起大陆妹，我唯有逆来顺受。我很快找到了工作，每天工资17元，我边做边学。一天所得比上海强得多，而且生活由自己支配，没有粮食定量的压力，也没有油票、肉票、鱼票、菜票的约束。每天早晨吃两只面包一角钱，中午买一份盒饭两元钱，晚餐经常吃公仔面，合起来花不了三元钱。生活简单，但还是比在上海吃得好。见到西瓜很馋，但不舍得花钱，只好忍住。这种自律自俭的生活，觉得自由自在，轻松愉快。

定居澳门，政治的束缚和阶级斗争的恐惧已不存在，又摆脱了物质上奴隶般的生活，感到了人生的乐趣。半年过去，逐渐熟悉了环境，也改善了居住条件。迁到中心区，和女友两人合租一房，每月付300元租金，而工资每日可得30元。女友领我到基督教堂听道，使我心灵得到无上的安慰。81年受洗，我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每当主日，必去教会崇拜、祈祷、读经、唱诗。当我生活日益丰富

的时候，想到蹲了二十多年监狱的老爸尚在他乡孤独生活，我一边寄了些衣服食品给他，一边写了封信去，说我已积得七千元，待凑足一万元可买间木屋居住，自己尚是独身，申请老父来澳门父女团聚。1984年，我为父亲来澳门提出了正式的申请。

82年，任教于东亚大学的牧师夫人生了个男婴，聘我做保姆并料理家务。我辞去工厂和公司的两份工，全力投入，育婴、炊事、清洁一手担当，受到主客的嘉许。我在牧师家工作三年后始辞职他就。其间有美国洛杉矶华人教会的牧师伉丽来牧师家做客，我细心待客。临别，客人对我悄语“愿作月老，代觅美籍郎。”一月后即邮来吕姓男士照片和书信，并索小影。

父亲来到自由世界

离开牧师家后，我转到教会的数间教堂联合组成的联会任干事，作全责侍奉。月薪一千五且供住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在一旁还加紧学英文、会计、打字。我与那位吕姓男士通了半年的信，1985年5月初，吕郎从美国来到澳门，当面表达爱慕诚意又经本堂牧师撮合，完成了终身大事，按照宗教仪式结为夫妻，同时又由夫婿携婚证在美国领事馆申请我移民美利坚。5月下旬，我从澳门回到上海，又与小弟去探望幽居在农村的爸爸。不料刚到农村就被公安局跟踪，赶来调查。也许我在服饰上被识别出是国外来人，他们怀疑我携带的行李中有违禁书籍和资产阶级的污染物品。盘问了我，又单独同爸爸谈话，责备他不即时向组织报告国外女儿返国。其实那时我带了一本《灵粮》，纯系宗教内容的福音辅导刊物。爸警觉高，先时已收藏，一场虚惊。我离大陆方五载，对此十分紧张，在自由的澳门从未被查问生活和行动，突然遭此，觉得非常可怕，唯恐又落陷井。以往居上海时尚未体会到监控制度的严酷。

紧接着，父亲在 6 月就被允许出境，来到澳门定居。我了却了一桩心愿，父亲的数十年苦难总算有了尽期。这是上帝的恩惠，我们才得以父女团聚。

洛杉矶 - 我的新家园

1986 年的 5 月 30 日，我在老爸和教会诸多兄妹的深情送别中离开澳门，随夫婿经港赴美，老父挂着热泪在港口望着我登上飞翼船，依依送别。我抹泪挥手道别，实是放心不下老父单独在这尚陌生的小岛上生活。爸爸说：“放心远航吧！我已是飞出樊笼的鸟，可以自由翱翔了！”。听了这话，我心稍释。到了夫婿的洛杉矶家中，惊异万分，这屋里除了他外，全是“王老五”。四壁空空的屋中只有一张床垫，这就是新房了。房外及厅里的地板上厚厚的一层黑色污垢，厨房里蚂蚁成群，蟑螂排队。想不到这外观雅致的住屋，里面竟如此邋遢。

本来与夫婿通信时已知道他是个打工汉，重其一技在身，不计较是否富有，可是他的辛勤所得都被两个光棍弟兄分光，自己仍然两手空空。这俩光棍弟弟生活不规律，除了在小工场间干活外，屋里的一切家务、清洁、炊事都没人做，里里外外一团糟。两个弟弟完全依赖大哥，每天只做二三小时就消闲去了！吃了饭连碗筷都不肯拾，别说洗啦。自我来了，这一切家务都由我一人担当，成了没有报酬的女佣。我精神与肢体的负担十分沉重，恰巧我又怀孕，挺了个大肚，服侍这些单身汉，还得腾出时间帮夫婿做工艺活，直到我的孩子出生。

有了孩子，必须成立一个不受外来牵制的家。我的主张得到夫婿的支持，于是我们另行租屋，首次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一面理家务，抚育孩子，一面跟夫婿学手艺，参加生产行列。我体会到，

现在的环境虽苦，我却能任意发挥，真正领略到自由的可贵。

通常每日工作到午夜十二时，逢节期繁忙时要深夜二时方可休息，还请了帮手才能供求平衡。经过两年的努力，打下了初步基础，购买新居，换上新车，增添了生产部件。我们这首饰行业恰似手表业，不能全自动生产，必须以手工逐个装配、车花、焊接、倒筒，若无大笔资金断难发展。所谓小本经营，能够常年生产，熬过全国经济衰退期间就算不错了。无奈又有了二胎，生了个女儿，加重了家庭的负荷。这时，上海的母亲要来美国探亲，表示得情殷意切，诉以年近古稀，如再蹉跎将遗恨一生。1989年4月，我接来久别的老娘，报以亲恩，老人亦为我分劳，照管幼小的女儿。

这时正逢本业忙季，得以竭力工作，以供市销。不幸夫婿在一次送货时遭劫，损失巨大，数年来辛勤所得毁于一旦，令我们痛心万分。回溯我夫妇同为天涯沦落人，十多年前，吕郎在南越矢志逃避越共统治，倾其所有，以廿两黄金买通关卡，兄弟三人乘木船冒死漂海投奔自由。骇浪滔天中，惊险近月，抵达台湾港口。同船三十余人已饿毙近半。得当地政府全面救援，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有了立足之地，白手起家。婚后状况方有起色，即遭劫数。我夫妇坚志未减，又振作信心继续努力。直至1992年方恢复元气，并租房设铺面，直接销售。

1991年申报入籍，经考试及入籍宣誓成为公民。随即向移民局申请我父亲移民来美国团聚。不料好事多磨，父亲因狱中艰辛，引起心脏病，卧病澳门镜湖医院。好转后又去大陆办理移民证件。由于经办部门腐败，对涉外文件故意刁难，贪图额外报酬，延迟了一年半，多花了十倍钱，才拿到三份所需证件。相形之下，美领馆办理移民签证，不仅按期依序，准时签发，而且除了规定的七十元签证费外，无须多花一文。

1992年5月初，我带着大儿和怀着的第三胎由洛杉矶飞抵上海

接父亲。幸好父亲持着葡国护照和澳门良民证，所以还算顺利。然而大关无阻，却遭小兵硬卡。我祖孙三人从上海登机，广州落地后，随即雇车去澳门。我们推着大堆行李，在机场出口处左等右等，竟然雇不到肯拉远程的的士。大热天我们一家人跑得满身汗水，引颈张望，就是没有远程车。只得公安警察求助，请他代雇，他满口答应，十分友善，立刻命一辆车驶近。司机开口要价 300 元，并且要求立即收费。我们才上得的士，车才开到路口，司机即取出 50 元给了公安警，原来是得抽成的。司机实得 250 元人民币。1992 年 5 月 30 日，一行老少三人从澳门过海到香港启德机场，搭机直飞洛杉矶。爸爸这个被折磨到末路的反动分子一步登天，到了最民主的超级强国定居，得以安享天年。天下的事真是难以预料，似乎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

附录

作者简历

“八一三”日军侵华，沪战爆发，五日后我即随军流入后方，参加救亡，转辗至安徽阜阳之后随胡宗南十七军团抵陕西凤翔，以高中学历入中央军校十五期，编在二总队受训。

1938年4月于西安王曲毕业典礼上接受校长蒋中正检阅。然后被分派在陆军第一师服役，任参谋处二科少尉见习参谋。1939年11月调回王曲七分校任十七期九总队中尉区队长。翌年5月调任军官教育队军士连中尉排长，10月兼任将校训练，到刘安中队任中尉教育副官。

1941年奉第三预备师师长陈鞠旅之召往韩城，在该师任上尉待从参谋，兼人事科长，是年11月派任该师骑兵连上尉连长。1942年9月调升第十六军人事科少校参谋。

1943年11月派任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少校团副驻邻县朝邑担任河防。1945年8月9日，六十四团奉命于平民县渡口夜渡黄河，向河东永济城日军进袭，激战三日夜未能攻克永济，而8月13日凌晨得师部电告，日本投降，继而本团奉命为光头部队北上进驻北平丰台镇。

1946年6月奉调任北平夏令营中队少校队副，负责大学生军训。10月调升热河省防空副司令部中校参谋，47年4月调十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任少校参谋。7月，战区长官部更名保定绥靖公署，任二处二科特情参谋。1947年12月，署撤销，与傅作义长官合并成立华北剿匪总部，遂被编入剿总二处二科，仍任特情参谋直至傅总降于共。1949年1月3日，共军进入北平并接收总部。乘共军初入之际，托友人聂有为觅得中大学生刘世煜返回青岛路证，化装为

学生潜离北平，经天津、济南抵达青岛，复由海上回到上海。

1949年3月于上海龙华镇谒见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周雨寰少将，不料接见的当夜该师海运去台湾，隔日接该师董光曙参谋函云“响行仓促不及通知。”遂失赴台良机。加之父母老迈，不忍再次分离。

5月26日，共军占领大上海，难以出境，即投身商界，在上海淮海中路1352号开设儿童服装社。1951年被共产党员亲戚陈铎告发，被迫向当地公安局反动党团登记处交代历史。

1954年6月25日被上海常熟区公安分局逮捕，密审后解送提篮桥监狱囚禁，按惩治反革命条例七条三款判刑十年。1956年5月送解安徽合肥新生厂劳改。57年10月被同犯王介生告密，捏造罪名谓“组织反革命小集团，散播谣言污蔑领袖。”经多次批斗，被推入牢中之牢羁押，经受饥刑一年四个月，复押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加判死刑。1959年4月押送省公安厅看守所，镣铐加身，关进重刑囚室。饥饿与刑具加上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我罪行中有一条是指苏联赫鲁晓夫为战争贩子，被列为主要罪行。59年7月中苏分歧公开化，因此对我重新量刑。1959年10月11日宣布我加刑十年，合并为廿年，解送白湖农场劳改。在白湖十六年后的1974年6月25日应该刑满释放，但当局不予宣布，延期半年始送出监狱。接着被留场就业，转到就业劳动队劳动。

1975年12月7日，农场宣布“中央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实行宽释”。然而宽而不释，仍被留放在安徽国营林场，度过了十年的农村管制生活。1985年6月经澳门女儿的申请乃得出境，在澳门定居。92年5月经女儿在洛杉矶申请，始得移民美国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相逢何必相识

胡美玉

说来有点像电影中的情节，或类似小说的故事，但都不是：我既没有丰富的想像力，也没有杜撰故事的本领。所写的仅凭记忆叙述过去所遇到的一些真人其事。

我于 1958 年因天主教圣母军被判刑十五年，1960 年送往安徽省白湖农场劳改。1962 年秋我被分配在农场医院担任护士，此医院的病人是由农场各中队送来的。1962 年我被分配到肺结核病区工作，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犯人们根本吃不饱，加上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所以患肺结核者比比皆是，他们个个面色苍白、骨瘦如柴，送到医院时已气息奄奄。

这些人绝大多数处于活动期的 TB，每口痰排菌数万，传染性极强。我当时在垂危病房工作，送病人临终是主要的任务。也许人们的宗教意识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容易滋长，所以也是传教的最佳时候。绝大多数病人说，我们来这里等死了，还有什么别的希望？我说：“不是等死而是求活，你们来这里不是得到疾病的治愈，就是认识真理求得永生，永远活于天国。”

那时我们大约有十位教友都在医院工作，我们不怕脏不怕累，病人身上的虱子爬进了衣服，也总不说一句怨言，再脏再臭的病人也要弯下身去清洗去按摩，难友们个个称我们是“下凡的天使”。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有位难友姓王名雄，上海人，入院时他不但衣衫褴褛，且一头乱发，全身牛皮癣。进院后曾数次大咯血，一口口鲜血直喷而出，抢救时鲜血还吐满了我的白衣。数分钟后待他吐血停止了，他喘了一口气，泣不成声地说：“我因国民党之故

被判七年，说穿了，就因我是陈立夫的表弟。事实上，我从未与表兄见过一面。然而你知道，在中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攀上一点亲，就要株连全族。如今唯一能安慰我的，就是在这儿见到你们这天使般的护士。你们那么爱人，怎么也会被捕入狱？”我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他立即接答：“相逢何必曾相识。”

在他临终前几天，我为他讲了天主教要理，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成为一名临终受洗的教友。为了使他离开这世界无遗憾之事，我问他有否需要我做的事，他伸出干巴巴的手和我紧握，说：“我有个女儿长得和你非常相像，当然她不能来为我送终，我要求你在我断气时脱下口罩，让我看看你清秀的容貌，安息主怀；第二，请你写封信给告诉我太太、女儿我平安逝世的情况；第三，他日你如有机会和陈立夫表哥联络，请告诉他表弟王雄临终无怨无尤，人的命运难以自己掌握，但能死得平安，也是一大幸事。”

他的要求我一一照办，在他吐出最后一口气时，我毫不顾忌临终的 TB 病人会带来多大传染的威胁，毅然脱下口罩，在他病床旁侍立，像一个女儿送别自己的父亲一样。见他十分平安地闭上双目与世告别，我为他换了一身衣服，一卷草席，送他上山埋葬。至于第三件事，我于 89 年来美，待安家后，于 1991 年知悉陈立夫居住台湾，就试着写封信给他，感谢陈先生不弃，赐予回函，今附原函复印件，供大家参考。

附陈立夫复函

美玉女士，去年 11 月 28 日手术转辗递到美国。我因内子病逝，刺激太大，两手颤抖，两足乏力，来美休养，已将三月，病渐好转，故可作复如次：

敝族在吴兴为一大族，我十二岁时即离家去上海就学，故亲戚

关系如王姓者有之，但王雄之表弟关系，已难以记忆，且年事已高（93 岁），更易健忘，王雄之言，想不至有误耳。

女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殊足钦敬，故敢以实情奉告，手复，并颂年安！

陈立夫八八、一、十八

（转载自世界日报 9/29/1999）

凄风苦雨四十年

黑色文库 第三集

作者/ 成中和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廖天琪 古原

封面设计/ 蓝飞 古原

华盛顿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 作者 成中和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和转载文字和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Forty Years in China's Inferno

By Cheng Zhonghe

Black Series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ww.laogai.org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2

ISBN 1-931550-23-9

Printed in New York

定价: U.S. \$ 15.00

二十世纪中国奴隶的众生相

凄风苦雨四十年

成中和 著

作者简介

成中和生于1917年，1937年投身黄埔军校，随国民党军队参加抗口及国内战争。49年后在上海开厂经商。54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十年，送往安徽监狱接受劳动改造。57年“反右”期间被人诬告组织反革命集团，诬蔑苏联，改判死刑。59年中苏关系恶化，重新量刑，复改为廿年，解送安徽白湖劳改农场。74年刑满后继续留场劳动，后被转往安徽林场作为留场就业人员，在那儿又度过十载春秋。成中和被捕入狱后，妻离了散，家破人亡。他在狱中历经了饥饿、酷刑、奴工的摧残。85年劫后余生的他被女儿接到澳门定居，92年迁居美国至今。

黑色文库 第三集
劳改基金会

Forty Years of China's Inferno
By Cheng Zhonghe

Black Series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23-9
Printed in New York

